

后现代交锋丛书

Freud
False Memory
Syndrome



弗洛伊德使我们注意到表面的确定性和真实性之下的那些不可捉摸的东西。因此，与其将弗洛伊德看作是“恢复记忆狂热”之父，还不如看作是后现代主义之父。

[英] 菲尔·莫伦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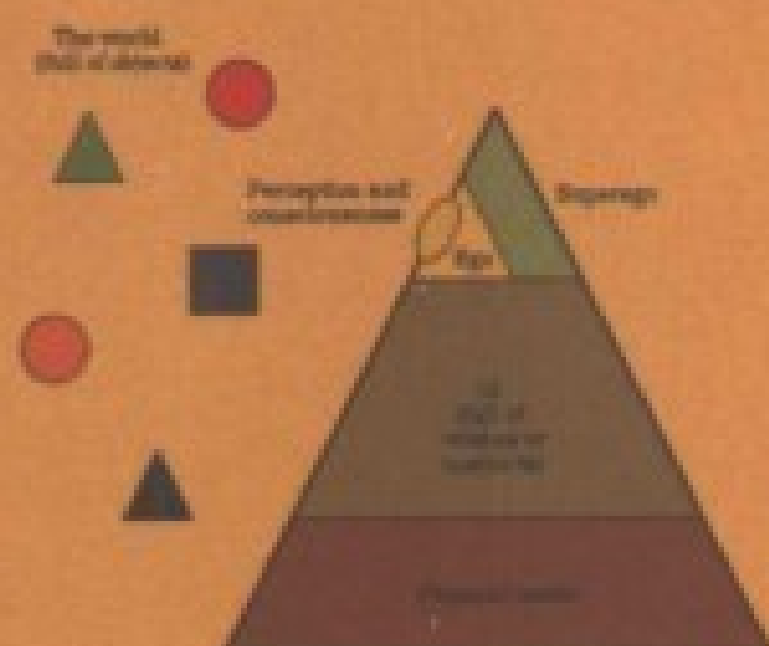
弗洛伊德与虚假记忆综合症

Freud and False Memory Syndrom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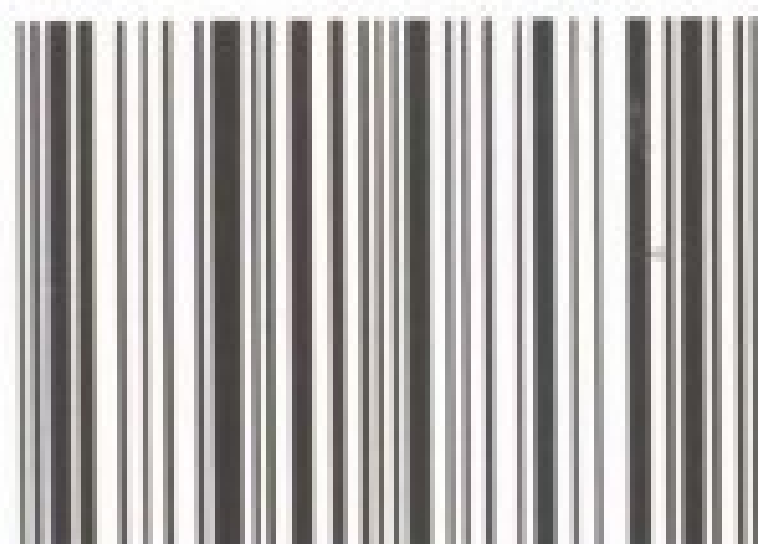
弗洛伊德与虚假记忆综合症



约从1992年开始，出现了一种异常激烈的争论。这个涉及科学、专业和法律的争论围绕这样一个论点，即，有时候是心理治疗师造就了童年曾遭受性虐待的虚假记忆。有些人因此责怪弗洛伊德在百年前种下了“虚假记忆综合症”的种子。其中一些批评指责弗洛伊德由于专业上的怯懦，放弃了性虐待在病人中普遍存在的原本认识，取而代之以童年性行为 and 俄狄浦斯情结理论；另外一些批评则指责他在病人心里虚构并宣扬了虚假记忆。

弗洛伊德真的是使社会怀上了误导性的理念，并在一个世纪之后生下“虚假记忆综合症”这个怪胎的坏父亲吗？抑或他是一个惊世骇俗的天才，其有关记忆的深奥理解远远超出了他所在的时代？我们对弗洛伊德指责过多，而真正研读其著作过少。弗洛伊德依然与当今心理学和社会所高度关注的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ISBN 7-301-08480-3



9 787301 084809 >

ISBN 7-301-08480-3/G · 1371

定价：12.80元

后现代交锋丛书

postmodern encounters



弗洛伊德与虚假记忆综合症

Freud and False Memory Syndrome

[英] 菲尔·莫伦 / 著

申雷海 / 译

王文华 / 校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4-292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弗洛伊德与虚假记忆综合症/(英)菲尔·莫伦著;申雷海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

(后现代交锋丛书)

ISBN 7-301-08480-3

I. 弗… II. ①莫… ②申… III. 弗洛伊德, S. (1856~1939)—思想评论 IV. B84-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5814 号

Freud and False Memory Syndrome

Text copyright © 2000 Phil Mollon

The author has asserted his moral rights.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书 名：弗洛伊德与虚假记忆综合症

著作责任者：[英]菲尔·莫伦 著 申雷海 译

责任编辑：刘 军

标准书号：ISBN 7-301-08480-3/G·1371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zyl@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6

排 版 者：兴盛达打字服务社 82715400

印 刷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32 开本 5.625 印张 70 千字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12.8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后
现
代
交
锋



金 吾 伦 序

金吾伦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当北京大学出版社周雁翎博士仿佛以命令式的口吻,要我为这套丛书写一篇序言时,我的确感受到了一种挑战,一种“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向“现代性”(modernity)的挑战。出于对这套丛书的偏爱,我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放下了手头的其他工作,认真地读了丛书的每本小册子,难舍地花去我一个多月的时间,以表明我向后现代主义思潮臣服的心声。

这套丛书的总题目是“后现代交锋”(postmodern encounters)。“交锋”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现代性的挑战;二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内部各种观点之间的冲撞:质疑与回应、批判与反诘、解构与重组,当然,还包括现代性对后现代挑战的回应与反击。丛书虽小,但内容的涵盖面却相当广泛。从历史的跨度上看,丛书所论的人物既有19世纪的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达尔文(Charles Darwin),也有活跃在当代学术舞台上的德里达(Jacques Derrida)、霍金(Stephen Hawking),甚至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从涉及的广度而言,它涵盖西方近十多年来在知识文化界中所产生的许多重要的争论。丛书中有近半数涉及科学与科学家的学术思想及社会影响,如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霍金、道金斯



(Richard Dawkins)、达尔文、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等科学家和与科学技术直接相关的库恩(Thomas Kuhn)、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以及基因改良食品、自私基因等,但议题都是人文议题。令人惊讶不已的是,丛书中有几本将当代科技发展的重大发明,如因特网、移动电话,乃至全球化,与直观上毫无关系的哲学家、思想家、语言学家联系起来,真令人有豁然开朗之感!

对于丛书所包含的各种观念应如何作出评价,这完全超出我的能力之外。我相信读者能自己作出判断。在此我将重点谈谈我所关心的几个问题,即后现代性、终结论、思维方式以及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关系,来与读者交流与共享。

后现代性

本丛书的主要意图是介绍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当代科学及人文诸领域中引发的论争和挑战,通过诸多聚讼纷纭的当代思想文化热点来阐明后现代性是该丛书的主题。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后现代性或后现代主义作一简要阐述。本丛书中《尼采与后现代主义》一书的作者罗宾逊指出,尼采的许多观点看起来都很后现代,因此,尼采经常被视为当前后现代的祖师爷。也有人评论说:“尼采哲学以其对现代西方文明的批判而被认为是现代向后现代

的转折点，并被认为是后现代思潮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①

海德格尔也是从后现代的方向反思现代性的先驱者之一。他被誉为 20 世纪（乃至 21 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其思想所散发的巨大影响力，“遍及哲学、文学、艺术学、神学、心理分析，乃至建筑学。单就哲学而言，从存在主义、美国新实用主义、诠释学、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到当前引领风骚的后现代主义等思潮的重要人物，大概都可以在海德格尔‘思想族谱’中占有一席之地”。^②

后现代是指对文化现代主义和社会经济现代性所作的批判和否定。现代性的本质是力图综合和控制一切，迷恋秩序和权利，强调理性、逻辑、真理、基础和本质，后现代主义则对现代性的本质特征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乃至无情的质疑与批判。后现代主义倡导多元性、开放性、创造性，强调突出主体性、透明性、和谐性（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

本丛书还提出了许多后现代主义的概念，其中如，用发明代替发现，用建构代替实在，不存在进步的目标，价值的破坏，启蒙价值的消逝，超越线性历史，以及激进主义方法论，想象科学，后女性主义，等

① 王治河主编《后现代主义辞典》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473

② 见本丛书杰夫·科林斯著《海德格尔与纳粹》。



等。更有甚者,是对科学偶像的质疑,像对爱因斯坦与霍金这样的科学家,指出他们提出的深奥理论在科学家中间也只有少数一些人才能理解^①,为什么他们能成为流行的图腾、全球崇拜的偶像?仅仅是媒体的炒作吗?《爱因斯坦与大科学的诞生》一书的作者在该书结尾时总结性地说了这样一段话:

许多现代科学家本身正在和真理做危险的游戏,他们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片面地推向媒体,以便在获取稀缺的研究经费份额的残酷争斗中分一杯羹。这样做可能会有短期的利益,例如得到某些实惠和在电视上露脸,但是从长期看,对科学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影响只能更糟。公众对爱因斯坦的反应是绝对的钦佩,但是大科学后来却把核武器给予世界。像牧师一样的被歪曲的科学家形象只可能导致异化,进一步失去公众的尊敬。科学不是宗教,也不应该佯装是宗教。^②

① 2004年7月22日英国《卫报》报道:霍金承认他的黑洞理论错了,输给了他与之打赌的对手、加州理工学院的约翰·普雷斯基尔教授。普雷斯基尔教授在接受了一套特意空运到都柏林的棒球百科全书后表示,能够赢得这次打赌让他感到非常高兴。他还补充说:“老实说,我还没有听懂这次演讲。”他说他盼着仔细阅读霍金教授拟于下个月发表的论文。霍金教授在剑桥大学的同事、天体物理学家格里·吉尔摩说:“目前大家都没有发表评论,但斯蒂芬并不常常发表这样的见解,因此极有可能他在考虑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可能会过于深奥,不是专家会不太明白,但他并不是在对非专家谈话。”

② 见本丛书彼得·科尔斯著《爱因斯坦与大科学的诞生》。

弗洛伊德与左派记忆综合症

Freud and Leftist Memory Syndrome

至于达尔文的进化论所受到的挑战就更加凶猛、更加厉害了。早在 1925 年,美国的斯科普斯因教授达尔文的进化论而受审;1999 年 8 月,美国堪萨斯州教育委员会投票通过决议,将进化论从国民教育课程中删除,而提出这种议案的,美国有 13 个州。有的还建议同时教授“创世论”(即上帝创造世界说)。由此可见,科学与宗教的争论还在继续着。至于科学知识是科学家们的发现还是一个社会建构过程,持论对立的双方形成一场不大不小的“科学战争”。这在《库恩与科学战》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如此等等,足以勾画出后现代性与现代性之间的战斗和纷争。这类战斗和纷争可以说未有穷期。

终 结 论

近几十年来,各式各样的“终结论”(endism)纷纷出笼。“政治终结论”、“社会终结论”、“现代性终结论”、“历史终结论”、“意识形态终结论”、“科学终结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其中最著名的是由美国政治理论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 1992 年的著作《历史的终结与末人》中提出的“历史终结论”。福山说,随着共产主义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柏林墙的倒塌为标志在欧洲垮台,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已经战胜了共产主义,也战胜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冲突已成明日黄花,历史也就随之结束,这被称



作“历史终结论”。

正如斯图亚特·西姆(Stuart Sim)在《德里达与历史的终结》一书中所说：“福山不是唯一一个宣称历史终结的人。近些年来，许多其他思想家，譬如法国后现代思想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和让-弗朗西斯·利奥塔尔(Jean-Francois Lyotard)，也加入了这场争论，而且其本身就构成了在“终结论”(endism)名目下更大争论的一部分。我们屡被告知，我们现在生活在后现代文化之中，而在这一嬗变之中，终结论常常被看成是后现代文化最重要的特征。”^①

尽管种种“终结论”纷纷出笼被认为是一种后现代文化现象，其实又绝非是一种新现象。许多宗教都曾预言过世界的终结，而且通常预言多次，每当新的千禧年来临之际，终结论就翻出新花样蛊惑人心。当代的终结论与以往的终结论的不同之处，是重在强调现代性的终结——抛弃那种“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s)，摧毁那些旧有的思想模式和行事模式，承认世界和事物的多样性与差异性。

德里达强烈地抨击了福山的观点，指出历史不会终结，“历史终结论”只是意识形态的狂妄把戏，“马克思不会这样安静走开的”，马克思的诸多幽灵仍将在欧洲上空，乃至世界各地游荡。我们“除了将历史连同必然相随的幽灵政治学延展开去直至不可

^① 见本丛书斯图亚特·西姆著《德里达与历史的终结》。

测的未来以外,我们别无选择。”^①

当代科学的发展正在宣告“终结论”的破产。“历史终结论”之所以错误,是因为福山等人把历史看作是线性的和还原论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混沌论和复杂性科学的兴起和发展,逐渐揭示出世界的演变不是线性的,而是非线性的,不是还原论的,而常常伴随着新事物的突现和生成。“终结论”给我们双重启示:第一,合规律性不可漠视人的参与,违背人民意愿的政治是不能长久的。第二,世界和历史的演变,除了有渐变过程,还有突现和分叉,具有不确定性和随机性。事件的发展进程不是线性的,历史是可以再生的。关键的问题在于人们作出正确的选择。

思维方式

后现代主义,在我看来,最先肇始于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旨在抛弃传统的思维方式。有了一种看待世界和看待人生的新思维方式,才可能有新的理论和新的行动。

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人关于秩序和权利迷恋的一种挑战,现代人“把握自然秩序的希望将导致对自然行使权利。当它被转移到社会领域,变成通过利用社会秩序对人进行驱使时,这一希望便变得很危险。

^① 见本丛书斯图亚特·西姆著《德里达与历史的终结》。



而后现代的感悟则对现代人关于‘纯粹理性’的渴望抱持一种怀疑论的态度。它怀疑所谓的理性的纯粹性,事实上掩盖了奸诈的权利关系”。^①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力图撕碎那种现代人精心编织而成的理性网络,给出一幅多元的、全景式的超越旧有思想的图像。后现代主义者不再把一切送上理性的审判台上去审视,而是把它们放进历史实践和经验活动中去考察。

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特征,也许就是文化相对主义。库恩把社会文化、心理因素引入科学,使“科学揭示真理”的传统受到挑战。拉康则带头反对把“身份、认同”(identity)简化为生理性决定的说法,强调了“身份、认同”中的“协议”(transaction)因素,这种协议因素是非生理性的,也即是与社会文化因素相关联的。这是不是主体性的相对化呢?

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者的鲍德里亚提出“以想象性的解决问题的科学”来代替传统的科学。随着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与复杂性理论的发展,产生了一套符号系统,不断从大众媒体、政治运作、基因工程和数码科技的模型或符码中制造真实,而不只是掩藏真实。这也是麦克卢汉所揭示的“虚拟性”(virtuality),是一种“虚拟实在”(virtual reality),也即“虚

^① D.C.霍伊.后现代主义辞典序.见:王治河主编.后现代主义辞典.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弗洛伊德与虚假记忆综合症

Freud and Falso - Memory Syndrome

拟真实”。它不再像现代科学经由公理演绎来推出真理,而是用模型的方法来创造真实。按《鲍德里亚和千禧年》一书的作者所说:“这个通过模仿模本而得出的现实模本运用不同的相似形式 (forms of semblance) 取代了过去的‘拟象体系’(orders of simulacra): 第一种相似形式是,以保障现实这个原件的真实性为目标的文艺复兴‘副本’;第二种相似形式是工业化‘系列产品’,在这个工业化系列里,批量生产出来的产品并不指向某一个具体的原件或者所指对象,它们只有在与其他同类产品的关系中才具有意义。随着通讯系统、自动化、晚期资本(late capital, 通过形象和意义流通而非通过简单的产品流通)的出现,事先就已经被指定标明了的‘现实’现在已经出现,这种现实是按照模式和符码以自我指涉的方式生产出来的,这样的现实就是‘超现实’(hyperreality),即,现在的现实比真实还要真实。”^① 这就是我们所称的“虚拟实在”。^②

这表明了科学认识方法的巨大变迁。董光壁教授曾提出,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科学思想有三大转向,即从物质论转向信息论,从构成论转向生成论和从公理论转向模型论。^③ 这种科学思

① 见本丛书克里斯托夫·霍洛克斯著《鲍德里亚与千禧年》。

② 迈克尔·海姆著.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111-132

③ 王博主编.中国哲学与易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20-323



想的深刻转向，我们不妨也可用“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向”来标志它，这似乎显得更具概括性和深刻性，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个阐明演变的思想脉络。

作为后现代主义的祖师爷的尼采曾使用“阿波罗式”(Apollonian)和“狄奥尼索斯式”(Dionysian)来描述两种截然相反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阿波罗式思维方式源自古希腊太阳神阿波罗，意指井然有序、平衡和谐和有纪律；而狄奥尼索斯式的思维方式则源自古希腊酒神狄奥尼索斯，他常给人狂喜、热情和强健勇敢的精神。尼采批评现代人过度高估了阿波罗式的本质，而丧失了狄奥尼索斯式的本质。尼采所持的观点是，阿波罗精神和狄奥尼索斯精神虽然都是人类心理的重要本能，但是人们却往往只强调阿波罗式的、充满纪律的知识性。尼采主张，发挥狄奥尼索斯精神才能使人强健勇猛，接受生命本身所能赐给我们的最粗暴无理的苦难，同时在人生终结时，能愉悦、情溢辞表、疯狂而又欢快地肯定生命。

高估和只重视阿波罗式本质的是现代人。那么将两者结合，同时兼具阿波罗精神和狄奥尼索斯精神，把这种思维方式称作后现代人的思维方式以示区别，我认为是言之成理的。

杂种世界：从麦克卢汉到哈拉维

麦克卢汉将我们带入了一个与以往真实世界不同的虚拟世界，那是各种媒介的混种杂交。在这样的世界里，肉身的人可以与非肉身的人对话和互动。而后女性主义者堂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则通过她著名的《赛博格宣言》(A Manifesto for Cyborgs)，又把我们带进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杂种世界”，这个世界的大门前飘着一面大旗，上面写着一行大字：欢迎来到杂种世界来！

进入这个杂种世界，我们首先碰到的是琳琅满目的杂种产品：“转基因西红柿”，这种西红柿由鲈鱼的基因转植，它不再像自然模本那样会快速腐烂，被称为保鲜西红柿；“蛾基因的土豆”，转基因玉米，大豆烟草；由保鲜西红柿和蛾转基因土豆、防烂南瓜等制成的各种各样的食品。

这里是把动物转移到了植物中，植物与动物的界限不再分明了；那边笼子里关着致癌鼠，放养的是克隆羊、克隆牛、克隆猪……

屋里呆着的、街上走着的人中夹杂着“女性男人”(Female Man)，还有那些类似“外星人”的人。

生产这些杂种产品的是“杂种组织”：跨国企业、新世界秩序公司、信息与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其中最重要的是大学和商业公司的杂合：尼摩尔的杜



邦和德拉凡的威明顿共同组成的生命科技公司，剑桥麻省基地的千禧年研究者和瑞士基地的霍夫曼拉罗合作，同时与其他药厂实验室和实验中心共同寻找接受基因……

这种结合所创造的混杂世界，没有学术中心的起点，也没有商业机构的终点。这个混杂的世界生产了各种混杂的产品。究竟是混杂的世界创造了混杂的产品，还是混杂的产品创造了混杂的世界，并没有清楚的答案。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我们已处于一个差异场域下的多重空间，一个认同和边界跨越的复杂关系网络中。这是一个不同于以前时代的新时代，即“后现代”。

潜存于这个复杂关系网络时代背景下的是各种观念。它们正在冲击、荡涤我们称作“现代性”的观念，如“自然”与“文化”的观念，人类与非人类的观念，男性与女性的观念，甚至于超越了善与恶，超越一切古老范畴的界限。这的确确实是一个各种观点相互冲撞的杂种世界的后现代。

对于后现代主义目前有着许多争论。有人认为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已经无法无视和拒绝，也有人对“后现代”的提法表示困惑。不少科学家甚至坚决反击后现代科学思潮，认为它会对正在现代化的国家造成灾难性的破坏，指责它是对科学精神、科学理性和科学真理的致命威胁。我们应该支持这种反击后现代主义的批评和争论。但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就

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前工业社会经由工业社会而正在进入“知识社会”,即后工业社会。前工业社会的特征是“劳力密集”,工业社会的特征是“资本密集”,后工业社会的特征是“知识密集”,而知识只有在互动中生成发展。为此,我们应该鼓励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交流与争论,后现代主义者的主张同样必须得到支持。只有这样才会有利于学术思想的活跃、学术事业的繁荣和知识的快速成长与应用。

这套“后现代交锋”系列丛书中的每一本因为篇幅短小,内容新颖丰富,涉及面又广,一定会吸引很多的读者,使他们在繁忙紧张的工作之余,在饭桌上,或在自己的汽车内,或在就寝前阅读和议论。

总之,欢迎您到后现代世界来!

2004年8月




汉 译 前 言

王 浩 河

(中国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作为当代西方最重要的一股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已经遍及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它的声势之浩大,波澜之壮阔,立意之尖新,分析之犀利,触角之多元,内涵之丰富,理论之复杂是当代任何一个思潮所无法比肩的。也正因此之故,任何一个研究后现代的学者无不跃跃欲试,试图把它说清楚。即使不能擒获全豹,至少也要获得一个关于后现代的明晰概念。这些努力都是值得欣赏的。然而如同任何一个美丽的诱惑后面都有一个丑陋的陷阱在等待一样,把后现代主义说清楚的背后所隐藏的危险就是:将后现代主义简单化,进而妖魔化。看一看下面这些对后现代主义的评价,就知我所言非虚。

妖魔化后现代

有学者在国家级哲学刊物上撰文,说后现代主义“视人本主义为大敌”,反对“理性主义”、“理想主义”,以混淆黑白、颠倒是非为乐事。其结论是:“后现代主义的实质是学术商业主义。”也有人称今天社会发生的一切丑陋现象为“后现代乱象”。据说后现代世界是一个虚无的世界,没有意义,“凡生于意义者,已死于意义”。还有哲学界老硕学接着鲍德里亚讲:在后现代世界里,理论已经穷尽了自身,世界已经摧毁了自身,剩下的只有碎片,而“玩弄碎片,就是后现代”。



一些人据此对后现代大加讨伐，似乎后现代带给人们的除了“虚无主义”，就是“无政府主义”，除了“玩世不恭”，就是“绝望”。更有台湾地区作者将“后现代”与“癌症”连在一起，发明了“后现代癌症”一词。其对后现代之憎恨，之厌恶，由此可见一斑。

这种简单化的态度显然无助于对后现代作认真的学术研究，其背后浓郁的“大批判”色彩也令人忧虑。

简单化对于解说一般事物固然存在着某种便利。但对于阐释后现代主义这样一种异常复杂、深刻的思想运动，简单化则是研究者应该极力抵制的一种诱惑，因为它会将我们引入歧途。建国后发生在实用主义和存在主义身上的悲剧，足够惨痛，希望不要在后现代主义身上重演。

因此之故，写这篇前言的此刻，我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虽说这十多年来自己一直从事后现代研究，来美读书后研究方向依然是后现代，所师从的又是美国当代著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柯布(John B. Cobb, Jr.)和格里芬(David R. Griffin)，但对有些后现代思想家如勒维纳斯和德勒兹的原著所读不多。没读原著，心里便不免发虚。此外，由于浸淫后现代研究这些年，对这些后现代思想大家不免多少有一种感情上的偏爱，我很怕由于一己之好恶影响了读者的判断。因此我更愿意读者把这篇前言看作我一己学习心得之分享，看作一个邀请，邀请读者与我一起深化对后现代思潮的研究，邀请读者贡献出自己的视角。对于后现代思想家来说，一个人能够获得的观察事物的视角越多，他(她)的解释就越丰富、深刻。

后现代的故事还没完

尽管后现代主义特别是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存在着不少有待克服的理论困难,但我不同意“后现代已经终结”的说法,更不同意把后现代主义当作“死狗”来处理。这方面我比较倾向于这样一个说法:虽然后现代主义不可能解决我们所面临的所有问题,“但公平地说它值得一听,它内涵着许多值得深思的教训”。结论是:“后现代的故事还没有完。”^①

后现代的故事没有完不是因为讲故事的人赖着不愿退场,而是因为后现代思想家所提出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因为现代性依然很强势,现代世界观或现代思维方式依然占统治地位。作为对现代性的全线抵抗,后现代自然就还有话要说。

如同后现代一样,现代性也是一个充满歧义的概念,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界定。按照格里芬的理解,现代社会中存在的“个人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父权制、机械主义、经济主义、消费主义、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都是现代性的重要理论内容。而我更愿意把现代性界定为以二元对立思维为特征的现代思维方式。个体与群体,精神与肉体,人类与自然,男性与女性,科学与精神,理性与价值,理性与情感的分离与对立,都是现代性的表现。

后现代主义所要超越的,后现代思想家所要抵抗的,就是这种现代性。按照著名生态哲学家盖尔的

^① 参见《国际宗教哲学杂志》Vol.50(2001),p.26。



界定：“后现代主义应该被理解为一种传统，这种传统与现代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传统相对立，试图追问现代性的各种假定，在此基础上发展一种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①一般说来，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侧重前者，即侧重“追问现代性的各种假定”，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则侧重后者，即侧重“发展一种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可惜的是，或许由于地域所限，这套丛书的编者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鲜有论及，希望后来者在编辑一套新的《后现代交锋丛书》时能弥补这一缺憾。

现代性的典型态度是“霸道”

现代性的典型态度是什么呢？概言之就是“霸道”。求道，闻道，得道都是值得称许的事。唯独这“霸道”，让人难以接受。顾名思义，霸道者之所以霸道，是因为自以为自己是道，也就是真理的唯一拥有者。也就是说，由于霸占着道，所以霸道。

这种霸道的一个核心表现就是“唯我独尊”，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是剥削自然，表现在男女关系上是压迫妇女，表现在理性和感性关系上是蔑视感性，表现在科学与非科学的关系上是科学沙文主义，表现在人我关系上就是容不得不同意见，表现在国家关系上就是霸权主义。

从一种多元宽容的立场出发，后现代向形形色

^① Keller, Catherine and Anne Daniell ed. *Process and Difference: Between Cosmological and Poststructuralist Postmodernis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2, p.32.

色的现代性霸权进行了挑战。

以挑战科学的霸权为例。面对世人数百年来对科学的顶礼膜拜，后现代思想家和科学家向我们证实：“西方科学在许多至关重要的方面出了错。”^① 爱因斯坦说：“我们切莫忘记，单凭科学与技巧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伽达默尔说：“中国人今天不能没有数学、物理学和化学这些发端于希腊的科学而存在于世界。但是这个根源的承载力在今天已枯萎了。科学今后将从其他根源寻找养料，特别是从远东寻找养料。”^②

对科学霸权的反思不仅发达国家的有识之士在做，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也在做。印度出版的《科学、霸权和暴力：现代性的挽歌》一书就谴责后殖民国家对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的过度推崇。作者质问道：“有谁能对邪恶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跨国公司滥用现代科学不痛心流泪，进而不去审视现代科学的哲学和主流文化呢？难道暴力的根源就不能在科学的本性里找找吗？现代科学是否有某种东西使其成为一项向权力和金钱开放的人类事业？”^③ 捷克总统哈维尔在题为《现代时期的终结》的演讲中也指出，现代科学由于“不能与现实最固有的本性和人类经验最固有的本性联系在一起”，而正在被后现代科学所超越。读者通过本丛中彼得·科尔斯的《霍金与上帝的心智》、《爱因斯坦和大科学的诞生》和蔡汀·沙达

① 斯普瑞特奈克. 真实之复兴.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24

② 洪汉鼎. 百岁西哲寄望东方. 中华读书报, 2001-07-25

③ 斯普瑞特奈克. 真实之复兴.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75



的《库恩与科学战》可以体认后现代对科学局限性的揭示与超越。正是库恩埋葬了许多科学流行的旧观念,为人们提供了许多新概念,如范式、不可通约性、科学共同体、常规科学、收敛式思维、发散式思维,等等(见本丛书蔡汀·沙达著《库恩与科学战》)。

不难看出,后现代思想家实际上帮助我们捅破了“科学万能”的气球。他们并非像一些批评家指责的那样,是“科学的谋杀者”。后现代主义既不反对科学,也不反对理性,它所反对的是对科学的迷信,是科学沙文主义。这种科学沙文主义把科学看作认识他人和世界的唯一可靠模式,同时否定一切不能实证的人类价值及精神活动。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科学沙文主义倘若存在一天,中医就一天没有出头之日。

如同科技狂欢时代的守夜者,后现代思想家对科学万能的挑战,使我们避免在科学的颂歌中彻底迷失,对此我们应该心存感激。

从一种复杂性思维出发,后现代挑战了现代“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挑战了现代简单化思维。这套丛书虽然只选取了若干后现代思想家的思想,但其对现代思维的挑战是一目了然的。哈拉维的“赛博格”概念不但隐喻着范畴的模糊化,而且也隐喻着各种过去在现代思维模式下鲜明对立两极的模糊(见本丛书乔治·迈尔逊著《哈拉维与基因改良食品》)。鲍德里亚的“超现实”概念则挑战了我们传统的“现实”概念,以及建立在物质/精神,主体/客体两分思维基础上的镜式反映论(见本丛书克里斯托夫·霍洛克斯著《鲍德里亚与千禧年》)。尼采的系谱学则有助于克服人类理性主义的“自鸣得意”(complacency),它并非要摧毁

理性,而是旨在提醒我们:笛卡尔以来的现代理性关于自己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的假定可能是一个幻觉,因为它忽略了理性在过去的历史形态,在现在的不确定性以及在未来的脆弱性(见本丛书戴维·罗宾逊著《尼采与后现代主义》)。与此同时,弗洛伊德“使人们注意到表面的确定性和真实性之下的那些不可捉摸的流沙般的东西”(见本丛书菲尔·莫伦著《弗洛伊德与虚假记忆综合症》)。维特根斯坦则通过做梦和口误提醒我们,我们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是很神秘的(见本丛书约翰·希顿著《维特根斯坦与心理分析》)。企图一劳永逸地把握某种真理是一种需要治疗的“独断症”。

后现代对他者持一种开放的心态

与党同伐异、态度霸道的现代思维方式的闭锁相比,后现代主义持一种对他者开放的心态。这里讲的“他者”不仅包括其他人、其他文化、其他民族,而且包括女性与自然。这也就是为什么女性主义运动和生态运动在后现代主义这里找到了理论支持。用柯布博士的话说就是,“后现代主义者使差异拥有了立足之地”。^①

事实上,几乎所有后现代思想家对他者和差异都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德里达对“分延”、“不在场”和“踪迹”的强调事实上是对他者的开放。用他自己的话说,“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首先是对他者(the other)

^① John B Cobb, Jr., *Postmodernism and Public Polic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2, p.50.



的追求”。^①德里达之所以如此推重他者,是因为在他看来,“对他者的尊重”是“唯一可能的伦理律令”。^②其实,德里达的后现代解构主义之所以要颠覆形形色色的现代霸权和现代占统治地位的二元对立思维,其目的是为差异,为他者,为弱小争取生存的空间。德里达个人的生活经历无疑深刻地影响着他的这种尊重他者的哲学立场。德里达曾经坦承,童年时代作为一名犹太儿童,在犹太人遭受迫害和种族暴力(包括犹太儿童被驱逐出学校)时所感受到的极端孤立感。^③虽然日后成为后现代大家的德里达强调他童年的经历与他的哲学没有因果关系,但是这段经历对他思想形成的深刻影响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他者”在后现代另一个掌旗人罗蒂那里也被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罗蒂促请人们提升对不熟悉之人群的关注,以避免将他们边缘化。对维特根斯坦的治疗方法来说差异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见本丛书约翰·希顿著《维特根斯坦与心理分析》)。

不难看出,推重开放构成后现代思维的一个重要特征。所谓“开放”,按照海德格尔的理解,意味着“不阻塞”,也就是“不设界”。^④它让存在物无碍地“相互依

① Derrida, “Back from Moscow, in the USSR”, in *A Derrida Reader: Between the Blinds*, Peggy Kamuf, e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② Derrida, *Writing and Difference* (1978), pp.95-96

③ Le nouvel observateur, “An Interview with Derrida” in *Derrida and Difference*, ed. David Wood and Robert Bernasconi,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75.

④ Heidegger, *Poetry, Language and Thought*, trans. A Hofstadter,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1, p.106

靠,相互团结”。这种后现代的开放态度是对现代闭锁心态的否弃。诺斯若波写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一段话清晰地表达了部分先觉的西方知识分子对这样一种态度的呼唤:“我们必须使自己的直觉、想象力甚至灵魂向与我们自己的视野、信仰和价值观不同的视野、信仰和价值观开放。我们必须使学术界将世界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从与整体的关系的角度看待区域性问题的。”^①著名过程思想家苏哈克则将“开放”界定为“存在向新价值的取向”。^②

对于向他者开放的后现代转折,柯布有着明确的理论自觉:“今天,由于欧洲文化优越论不再统治我们,我们更做好准备向其他文化学习。”^③在柯布看来,“后现代思想的一个主要原则是包容,是让不同的社群和团体发出声音”。^④事实上,“设身处地”和“换位思考”一直是所有后现代思想家所推崇的原则。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与多元主义走到了一起。用柯布的话说,“成为后现代的,也就是成为多元论的”。

后现代与虚无主义无缘

后现代思想家在挑战现代性的霸权中或许有激

① F.S.C. Northrop, *The Meeting of East and West*,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66, p.10

② Suchocki, Marjorie. “Openness and Mutuality in Feminism and Process Thought and Feminist Action”. in *Feminism and Process Thought*. Ed. Sheila Greeve Davaney. New York: Edwin Mellen Press, 1981, p.63.

③ John B Cobb, Jr., *Transforming Christianity and the World*, p.31

④ John B Cobb, Jr., *Postmodernism and Public Policy*, p.190.



进、偏颇之处^①，但他们绝对不是一群唯恐天下不乱的造反派，更不是一群虚无主义者，因为他们始终“怀有乌托邦的梦想”，始终坚持着某种价值，守护着某种理想。在2004年8月《世界日报》发表的生前最后一篇访谈中，德里达强调他的解构主义是站在“肯定生命的一边的”。这使我想起不久前金惠敏先生在《中华读书报》发表的《“后现代帝国”的扩张》一文中介绍的罗蒂与德里达的对话。按照罗蒂的说法，德里达是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本主义者”。这话我相信。尽管德里达一生大多数时光是在形而上的思想王国里翱翔，但他并未将自己囚禁在学术的象牙塔中。“为人类操心”依然是他的宿命。他曾为捍卫法国阿尔及利亚裔移民的权利挺身而出，也曾为反对种族隔离政策进行过顽强的斗争。“9·11”事件后，他也曾写了《9月11日的概念》和《流氓》两篇评论文章。他也十分关心中国的命运。^②他曾大声疾呼：“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

也正是这个“很难对一致性感到激动”的德里达与美国著名后现代哲学家罗蒂和欧洲其他五位思想家哈贝马斯、艾柯、瓦提莫、穆希格、萨瓦特一道于

① 我在《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1996,1998)中对此有所分析。

② 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后现代思想家(不管是解构性的还是建构性的),都对中国的天然亲近。我在《后现代主义与中国》(载于《求是学刊》)一文中对这一现象有专门的讨论。

2003年5月31日发出反战强音《战争之后：欧洲的重生》，制造了“当代欧洲思想界的轰动之举”。众所周知，德里达和哈贝马斯是理论宿敌，两人有长达几十年的恩怨。德里达在解释他和哈贝马斯的不计前嫌的联合行动时说，不管他和哈贝马斯之间在理论上有多大分歧，“现在都是共同发出声音的时候了”。因为他们都担忧世界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①显然，这样的后现代思想家与反理性主义、反理想主义、反伦理主义无缘。用霍伊的话说，后现代并非“无方向感”，它不仅与“什么都行”(anything goes)的无政府主义无缘，而且也与“一切都无意义”(nothing matters)的虚无主义无缘。^②

尽管用一个共同认可的概念来界定后现代很难，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几乎所有后现代思想家都有一双饱含忧郁的眼睛，骨子里都对人类的命运和前途有着浓重的忧患意识。

简单化是后现代研究上的误区，因此而导致的妖魔化不仅不利于学术的发展，而且不利于吸收养分，实在是误人误己的双输局面。即使以反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为旗帜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也对它的对手采取了极其慎重的分析态度。如著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柯布就曾充分肯定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的长处，认为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对人类社会内

① 夏榆.德里达：我很难对一致性感到激动.南方周末,2004-10-21

② David Hoy, *Critical Resistance: From Poststructuralism to Post-Critiqu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4, p.231.



在的假定的解构“有助于揭露和克服给人类带来众多灾难的根深蒂固的‘同化癖’(homophobia)”^①

抵抗“齐一性思维”

看一看现代“同一性思维”，“齐一化”概念，“同质思维”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猖獗，例如现代非持续的经济模式的横行，消费主义、拜金主义在华夏大地的肆行无忌，掠夺性的全球化的“压路机”，以一元吞并多元，对多元文化、本土文化、边缘文化的疯狂碾压，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后现代的抵抗心存钦佩。德里达对福山所欢呼的自由资本主义大合唱和“全新的世界秩序”的拒斥就是这一抵抗的一部分（见本丛书斯图亚特·西姆著《德里达与历史的终结》）。

按照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奠基人怀特海的分析，“划一的福音(uniformity of gospel)”是“危险的”。^②后现代提醒我们不向“齐一化”的霸权屈服。这使我们怀想起 2000 多年前的庄子，因为正是庄子“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万物之上，从不人为地强求千篇一律，万人一面。他非常反对这种违背天下的常然，违背万物的性命之情的做法”。^③或许因此之故，庄子的哲学被后现代思想家引为同道。

① Cobb, John. B., Jr. "Responses to Relativism." in *Soundings* (Winter 1990), p.73

② Whitehead, *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7, p.206.

③ 樊美筠. 中国传统美学的当代阐释.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76

也正是通过对现代“齐一性”思维方式的全面抵抗，后现代思想家捍卫了人类的自由。按照霍伊的分析，抵抗与自由是天然地联系在一起，抵抗的动力来自“争取自由”。^①与“辞职”不同，抵抗并未抛弃可能性，它导向希望，也就是导致向无限的可能性开放。关于为什么要抵抗，朱迪丝·巴特勒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心理学区解释：人们之所以要抵抗，不仅仅因为自己受到了限制，而且因为自己体认到自己成为这些限制的一部分，自己已经与这些限制自由的东西同流合污。

针对资本主义对人的麻醉化、机械化，后现代思想家德勒兹和夸塔里强调与那些要求僵硬的中心性、权威、稳定性的偏执狂和顺从性人格（也就是霸道之人）进行对抗的重要性。因为这种人格不能容忍别人与他的不同之处，而且很容易成为法西斯运动的一分子。在为德勒兹和夸塔里的名著《反俄狄浦斯》英译本所写的序言中，福柯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何在反抗的时候不成为你所憎恨的体制的翻版？如何抗击我们自己身上的法西斯主义？这种法西斯就深藏在我们所思所想和日常行为中，它“使我们迷恋权力，对那些支配我们、剥削我们的东西反而充满了欲望”。^②在德里达看来，尽管海德格尔是后现代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但海德格尔身上“仍然存留着形而上学的残余”。或许正是这些残余导致他对纳粹主义的青睐（见本丛书杰夫·科林斯著《海德格尔与纳

^① David Hoy, *Critical Resistance: From Poststructuralism to Post-Critiqu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4, 231.

^② 米歇尔·福柯.反法西斯主义的生活艺术.天涯,2000(1)



粹》),从而铸成千古之恨。所谓“形而上学”在后现代的辞典里系指对“同一”的迷恋。

后现代主义是一剂 不可多得的“药石”

抵抗孕育着希望。作为一股健康的力量,后现代主义对于疗救现代病,是一剂不可多得的“药石”。后现代对“齐一性思维”的抵抗,对人的自由的捍卫有助于把我们从“非人”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使我们免做各式各样的机器和动物,如“生产机器”、“欲望机器”、“经济动物”和“消费动物”。当我们打好行囊准备跟着感觉走的时候,当我们孤注一掷意欲与邻居拼消费的时候,后现代提醒我们三思而后行。

作为一个国家,面对列强的霸权,中国敢于说“不”;作为一个人,面对消费主义的猖獗,面对横流的物欲,你是否敢于说“不”?是否敢于依然坚守浪漫?这是后现代主义向我们提出的另一个挑战。

后现代主义者虽然不完全等同于浪漫主义者,但他(她)身上显然流淌着浪漫主义的基因,因为它坚信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价值,都是唯一的和不可替代的。一味仿效他人在浪漫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是件可笑复可悲之事。这就是为什么浪漫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不仅一直拒绝参加风靡全球的现代经济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以及进军自然的大合唱,而且大唱反调。他们看重精神生活,主张过一种崇尚自然的简朴生活,懂得欣赏大自然抒情而生动的意蕴。因此他(她)们是天然的生态主义者。他们相信梭

罗在瓦尔登湖畔悟出的真谛：“一个人的富有与其能够做的顺应自然的事情的多少成正比。”^①这，也是一种抵抗，一种高贵的抵抗，因为它需要过人的胆识。

后现代对现代性的抵抗是否能成功，在多大程度上能成功，尚是个未知数，但它捍卫自由的卓绝努力，它对生命的奇异与丰盈的守望，对浪漫的坚持，是永远令人钦佩的。

展望未来，后现代的一些纯属刻意标新立异的东西注定会随风而逝，然而它的许多富有生命力的思考毫无疑问将会化为经典，作为一种“别思”、“别眼”，在未来的岁月里“启发我们去思，去想，去发明，去创造”。^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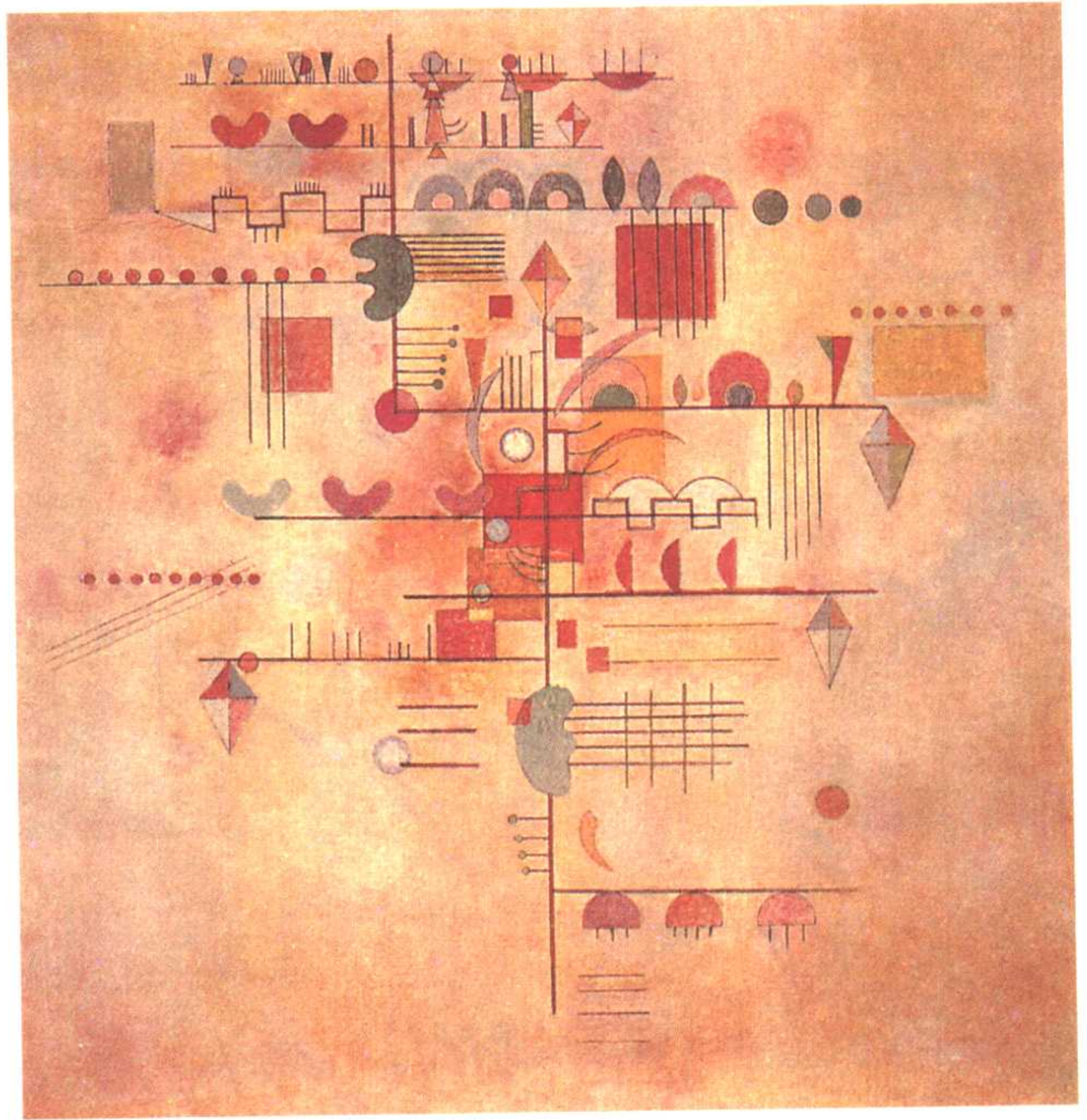
后现代主义或许有一万条不足，但在倡导“尊重他人，倾听他人”这一点上它绝对值得引起我们的深思。如果我们在尊重他人上多一点诚意，许多悲剧可以消除；如果我们在倾听他人上多一点耐心，许多空疏的批判和误解可以避免，我们的灵性与思维也可以因此得到滋养。这实在是个利人利己的双赢结局。

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套《后现代交锋丛书》就提供了这样一个倾听他人的机会。相信有心人自会惜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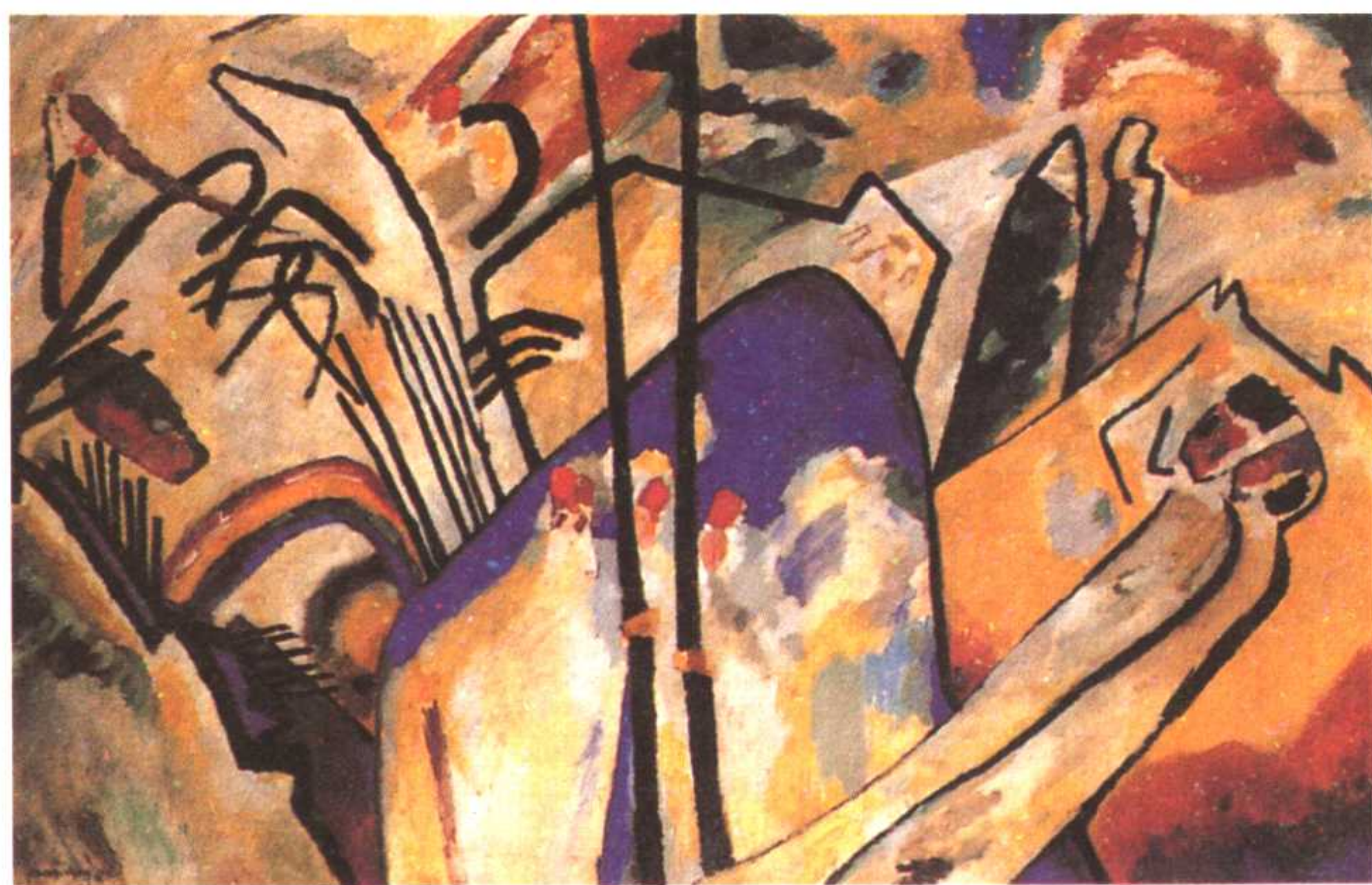
2004年圣诞夜于小城克莱蒙

① 艾伦·杜宁.多少算够.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13

② 王治河主编.后现代主义辞典.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3



康定斯基·小重音



康定斯基·构成第四号



《后现代交锋丛书》文字浅显，领域广泛，知识新颖，话题众多，几乎收罗了西方现代和后现代思想家的主要论述，触及到当代世界性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热点问题。这些有趣而新颖的后现代“时期”的话题，丰富和拓展了后现代多元文化论域，具体化了后现代多维理论层面，使读者能够开拓文化视野，深化问题意识，获得阅读广度，进而有可能在全球化问题框架中思考新世纪的中国立场和文化身份问题。

——王岳川（北京大学教授）

后现代主义在倡导“尊重他人，倾听他人”这一点上值得引起我们的深思。如果我们在尊重他人上多一点诚意，许多悲剧可以消除；如果我们在倾听他人上多一点耐心，许多空疏的批判和误解可以避免，我们的灵性与思维也可以因此得到滋养。

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套《后现代交锋丛书》就提供了这样一个倾听他人的机会。相信有心人自会惜缘。

——王治河（中国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后现代交锋丛书》是一套题材和角度罕见的作品。

“后现代”可以说是人文社科界和科学界等领域的时髦用语。不过与学术和科学有关的后现代话题往往意味着学术的前沿领域和古奥的词汇，而这套丛书则大胆尝试将前沿学术与大众生活结合，是对前沿学术与科学的普及化，是可读、时尚、前沿的完美结合。

——刘兵（清华大学教授）

《后现代交锋丛书》篇幅精练，但内容的涵盖面却相当广大，涉及西方近十多年来在知识文化界中所产生的许多重大争论。令人惊讶的是，丛书中有几种将当代科技发展的重大发明，如因特网、移动电话，乃至全球化，与直观上毫无关系的哲学家、思想家、语言学家联系了起来，真令人有豁然开朗之感！

这套丛书一定会吸引很多读者，使他们在繁忙紧张的工作之余，在饭桌上，或在自己的汽车内，或在就寝前阅读和议论。

总之，欢迎您到后现代世界来！

——金吾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后现代交锋丛书

译审委员会

· 主 任 靳希平 金吾伦 王文华

·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于奇智 王文华 王岳川 王治河 丛 中

刘 钢 刘 军 李建会 李醒民 张祥龙

尚 杰 金吾伦 靳希平

· 丛书主持 周雁翎

· 责任编辑 刘 军

· 绘 图 王恩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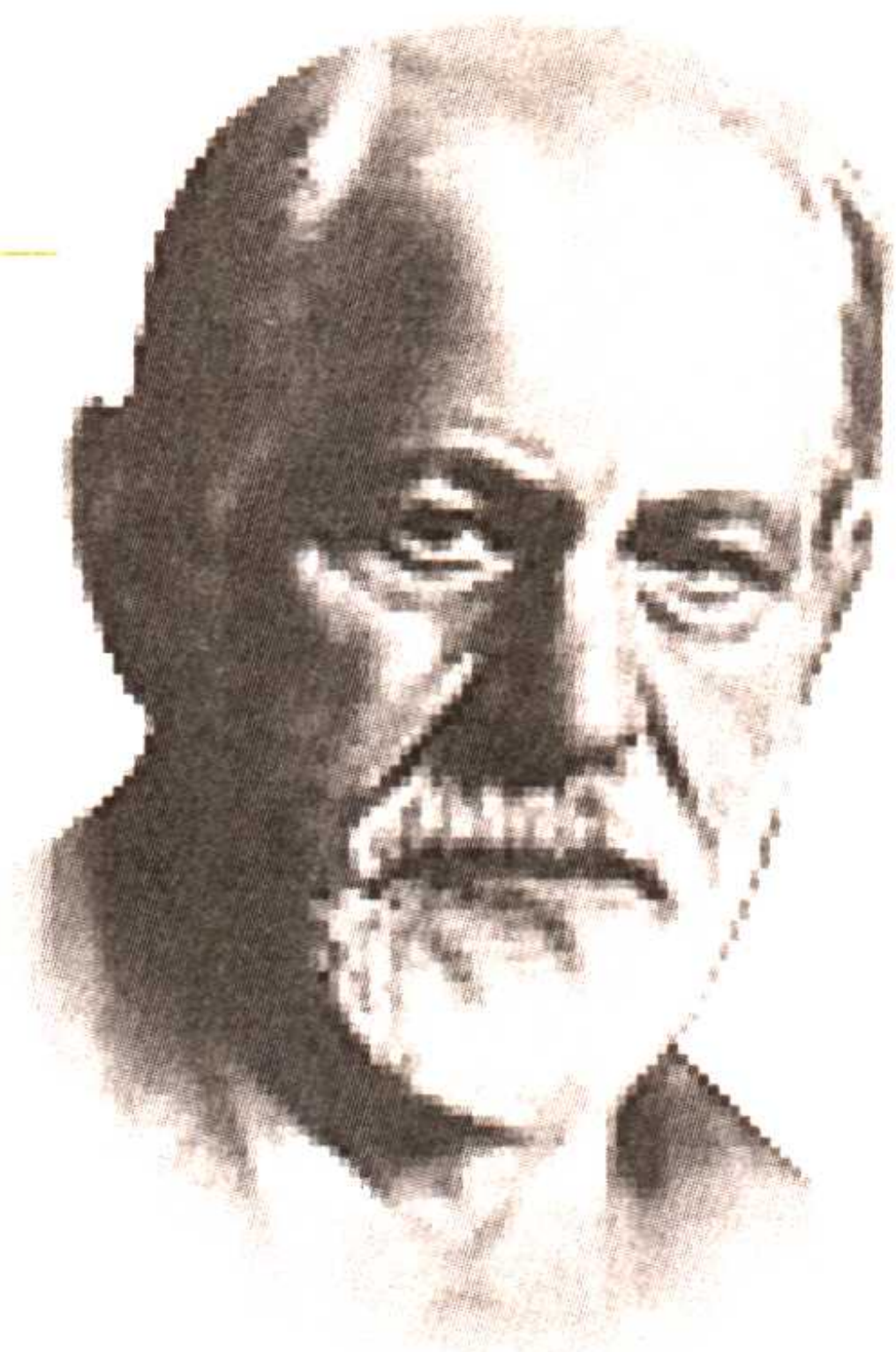
目 录

- 金吾伦序 / 1
- 汉译前言 / 15
- 导读 弗洛伊德的世界 / 1
- 虚假记忆综合症 / 29
- 这该怪弗洛伊德吗? / 35
- 弗洛伊德关于精神病理学的观点 / 39
- 癔病研究 / 43
- 弗洛伊德精神病理学中的性虐待理论 / 53
- 癔病病因 / 67
- 弗洛伊德对“性引诱理论”的否弃 / 83
- 弗洛伊德关于记忆的观点 / 93
- 弗洛伊德论心理分析中的重构 / 103
- 弗洛伊德的压抑概念 / 109
- 结论：弗洛伊德论记忆和虐待 / 115
- 弗洛伊德之后的心理分析 / 121
- 心理分析的现状如何? / 125

■ 有关虚假记忆的一个警示 / 1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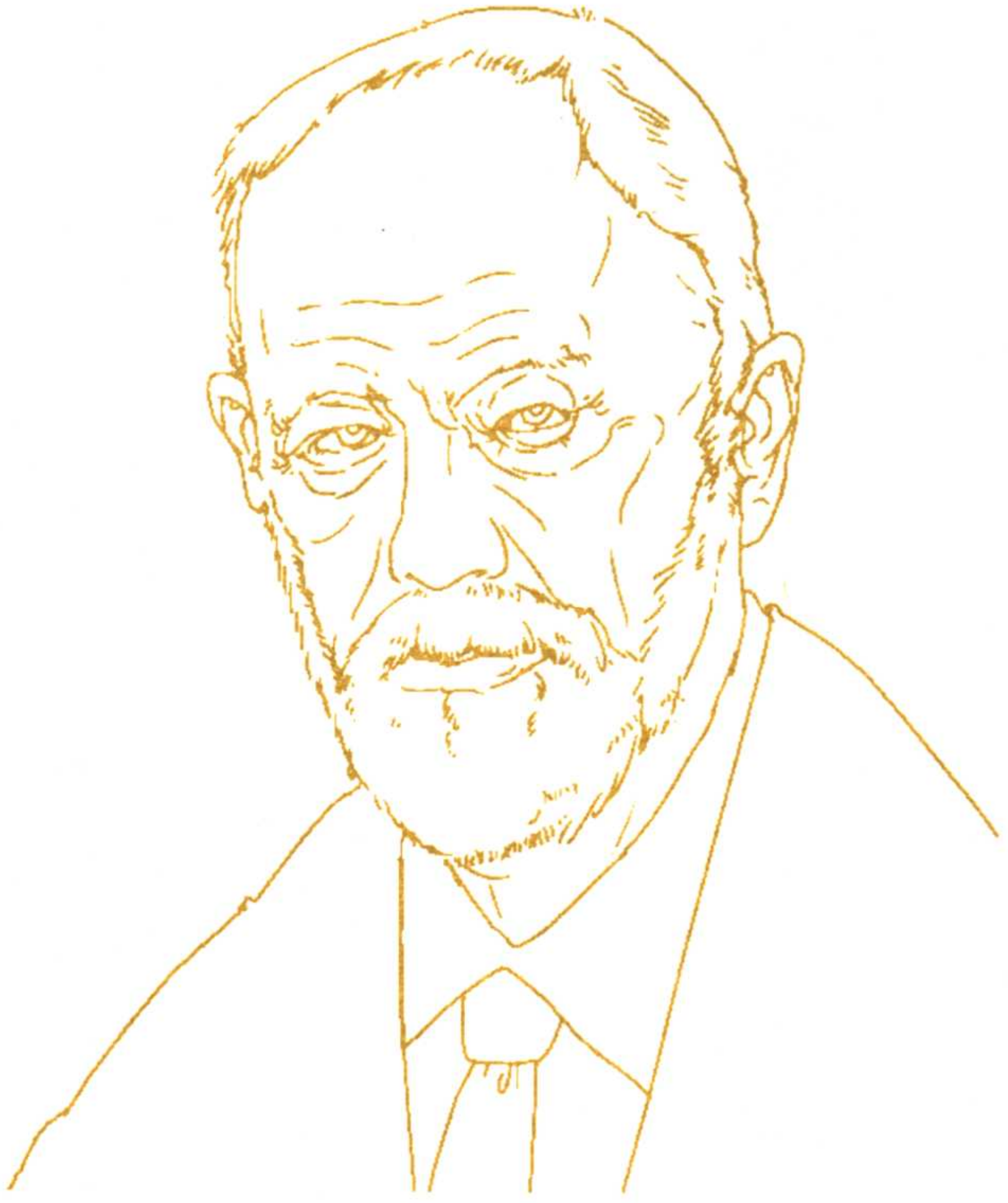
■ 注释 / 133

■ 参考书目 / 138



现在我越来越相信，弗洛伊德是伟大的，他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的理论是否正确无误，而在于他严肃、认真且大胆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问题，极大地激发了后人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和探索。精神分析理论给我们指出了一条通向真理、逼近人性的道路。在精神分析理论创建一百多年后的今天，重新回顾他的理论与学说，无论我们是否接纳、是否赞成，我相信他的理论依然会鼓舞我们对人性、对人类心灵世界进行无尽的探索！

导读 弗洛伊德的世界



弗洛伊德(1856 —1939),伟大的心理学家,精神分析的创始人。



导读 弗洛伊德的世界

丛 中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教授)

一般认为,人的自尊已受到了三次沉重打击。第一次打击来自哥白尼,他论证了地球并非人们妄自尊大地认为的那样是宇宙的中心。第二次打击来自达尔文的研究结果,他论证了人类不是“造物主”的创造,而是由所谓的“低等动物”不断进化而来的。好在动物是由本能所驱使,人与动物不同的是,人是有理智的动物。使人的自尊受到第三次打击的正是弗洛伊德,他论证了人的行为主要是由本能和潜意识机制所激发。换句话说,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人绝不是有理性的动物。无论人们是否同意弗洛伊德的理论,但很清楚,他的观点已完全改变了我们对待人类本性的看法。与马克思、爱因斯坦齐名,弗洛伊德被认为是对20世纪人类思想影响最大的三个犹太人之一。

弗洛伊德生平及主要贡献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Freud)于1856年5月6日出生在奥地利弗赖堡的一个犹太人家庭,4岁时,全家迁居到了维也纳。在那里他一直住到1938年,直到由于受纳粹迫害而不得不避难伦敦为止。弗洛伊德的母亲是他父亲的第二个妻子,在弗洛伊德出生时,父亲已经41岁了,母亲才21岁。父亲与第一个妻子有过两个儿子,在弗洛伊德出生的那一年,父亲同时也做了祖父,而母亲则正好与父亲前妻的次子同岁。这样的家庭结构,加上弗洛伊德又是他母亲所生的六个孩子中的长子,深得母亲宠爱,这使得弗洛伊德和母亲之间建立起一种相当深厚的强有力的依恋关系。这可能是后来弗洛伊德提出恋母情节的个人心理基础,因为心理学家研究的焦点及所提出的理论经常是他个人生活经历的反映。

弗洛伊德一直是一个成绩优秀的学生,并以第一名的成绩完成了他的中学学业。17岁时进入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可是他却花了八年的时间才学完四年的医学课程。他从没对医学真正感兴趣,而只是把



学医作为从事科学研究的一种手段。弗洛伊德曾希望成为一名解剖学教授，在这方面曾经发表过一些受到高度评价的论文。可他不久就发现，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说，在学术级别晋升上是尤其缓慢的。这个认识和经济上的拮据促使他在1881年开始私人开业，成了一名临床神经内科医生。

弗洛伊德与马莎·伯莱斯在1882年订了婚，但直到1886年他们才最后完婚。他们白头偕老，生有三男三女。女儿安娜后来成为伦敦著名的儿童精神病学家。

从1880年开始，弗洛伊德与乔瑟夫·布洛依尔 (Josef Breuer, 1842—1925) 合作，对癔症病人进行了催眠暗示治疗，这使得弗洛伊德发现，在人的内心深处存在着一种心理活动，这些心理活动在清醒的时候是不被病人所觉察的，而只有在催眠时才能回忆起来。这一发现使得弗洛伊德提出了他的潜意识学说。后来他发现，即使在清醒的时候，鼓励病人把自己所想到的事情，无论是否合理、是否符合逻辑，甚至无论有多么荒诞可笑，都可以通通说出来。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在清醒的时候，病人也能够慢慢说出原

本只有在催眠中才能回忆起来的生活经历，这些生活经历又多是一些痛苦的事情。病人把这些心理痛苦的事件讲出来的时候，伴随着强烈的情绪宣泄。之后，病人的临床症状就奇迹般地消除了。这就是所谓的自由联想的治疗技术，被当时的病人称作是“谈话疗法”。1895年，布洛伊尔与弗洛伊德合作出版了《癔病研究》一书，此书通常被认为是精神分析的开端。

弗洛伊德还经常独自进行自由联想，包括对自己所做的梦也进行自由联想和分析，这样就使得弗洛伊德对梦的心理意义和工作原理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这一研究结果使他在1900年出版了《梦的解析》一书，该书被许多人推崇为弗洛伊德最伟大的著作。一百多年来，此书已在全世界广泛流传，成为精神分析学说创立的标志。

《梦的解析》出版之后，精神分析运动才得以逐步发展。当弗洛伊德和他的几个亲密的追随者在1909年应邀到美国克拉克大学举办系列讲座时，他们终于赢得了国际上的承认。虽然弗洛伊德不很看重美国，而且后来再也没有去美国，但他认为克拉克大学一行对于精神分析运动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



义。1923年,弗洛伊德患了口腔癌,这与他每天抽20支雪茄的习惯有关,但即使在癌症被发现后他也没有改变这一习惯。自1923年到他逝世的1939年间,他接受了33次手术。虽然非常痛苦,但由于他拒绝用止痛药,他的头脑依然十分清醒,并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933年纳粹执政,他们在柏林公开烧毁弗洛伊德的著作,一个纳粹发言人叫喊:“反对夸张性生活来毁灭灵魂!为了人类灵魂的高尚,我建议把弗洛伊德的著作化为灰烬。”弗洛伊德在1938年维也纳被占领后仍不愿离开维也纳。最后,由于他女儿安娜被捕,他的房屋屡遭纳粹匪徒抢劫,弗洛伊德才同意去伦敦。后来他的四个妹妹都在奥地利遭纳粹分子杀害。弗洛伊德于1939年12月23日在伦敦逝世。

弗洛伊德发表的主要著作有:《癔病研究》(1895),《梦的解析》(1900),《性欲三论》(1905),《论无意识》(1915),《自我与本我》(1923),《焦虑问题》(1926),《自我和防御机制》(1936)。

虚假记忆综合症:真实的还是虚假的?

精神分析疗法是由弗洛伊德首创的一种心理治

疗方法。精神分析治疗是在精神分析理论指导下的一项临床实践活动。精神分析理论则是弗洛伊德根据他的临床工作，对病人的潜意识活动及其与临床症状之间的关系所进行的观察、描述、总结及推测。这些理论学说构成了弗洛伊德对精神医学和心理治疗的巨大贡献，并在此后一百多年的心理治疗临床实践中得到了后人的反复检验和证实，也得到了后人的丰富、修正和发展。弗洛伊德的观点不仅在精神病学，也在艺术创造、教育及政治活动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弗洛伊德因论证了潜意识动力的重要性而震撼世界。由于他倾向于把人看作是具有生物本能的人，并把获得快乐看作是人的一种本能，认为人在出生后，主要是通过吸吮动作来获得快乐的，而后来则又发展为通过排便来获得快乐，并在现实环境的限制和道德的约束下，经过一系列的心理发展过程，最终发展为以成年人的性行为方式作为获得快乐的重要来源。这就是他提出来的“心理性欲发展阶段学说”。他还指出，儿童由于受快乐本能的驱使，如果没有受到现实环境的限制，羞耻感、道德感等的压抑，儿童



期幼稚的性行为方式,如窥阴、露阴行为等,就会持续至成年,构成成年人的性变态。相反,如果儿童期的性欲望被压抑得过分厉害,这些本能冲动不会因为压抑而消逝,却会通过某些其他的方式或手段表现出来,这在成年人身上就表现为强迫症等神经症。心理治疗师通过回忆、解释等谈话治疗的方法,如果能够让病人领悟到他的潜意识欲望,并把潜意识的欲望意识化,病人的症状就会得到缓解甚至是彻底消除。

1895年,弗洛伊德与他的同事乔瑟夫·布洛依尔合作出版了《癔病研究》,报告了他通过催眠术和自由联想的方法对癔症病人所进行的谈话疗法。与当时冯特所进行的心理学实验研究方法有所不同,弗洛伊德没有采用实验室心理测查、群体统计的研究方法,而是采用了临床个案深入访谈的方法,即所谓“个案法”,对病人进行了心理治疗干预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的精神分析理论。个案法至今仍然是公认的心理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

在临床实践中,弗洛伊德发现,很多病人在潜意识中存在着大量被压抑的性的欲望,这些欲望不能

以直白的方式表达出来,而是经过修饰、化装、转换、变形后,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心理症状。如果这些潜意识的欲望一直被压抑,病人的心理冲突就会持久而激烈地存在下去,同时又不能被病人所觉察,而使病人备受心理疾患之苦。弗洛伊德当时作为一名神经内科医生,首先关心的是病人的临床疗效。他发现,当病人回忆童年生活经历的时候,会想起他所经历过的各种心理创伤事件,其中一部分病人回忆说他们在幼年的时候曾经受到过他人的性侵害,特别是女病人会回忆起幼年曾经受到过父亲的性侵害。由于在让病人进行自由联想的时候,弗洛伊德经常是坐在病人的背后,一声不吭地倾听病人诉说,而不像催眠那样强力地暗示病人,这使弗洛伊德相信,病人的回忆是客观真实的。这样的临床实践活动,大大激发了弗洛伊德的研究热情,他在此基础上大胆地首次提出了潜意识学说、人格结构学说,以及性心理发展阶段等学说。他的学说一经提出,无论是热烈的追捧者还是激烈的批评者,都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现在虽然不再像当初那样轰轰烈烈、备受重视,但是它作为心理治疗的理论



基础，已经融入了后来发展起来的众多心理治疗理论和方法之中，如认知行为疗法、咨客中心疗法、家庭疗法等。

“虚假记忆综合症”是说，心理治疗师在心理治疗过程中，相信病人所回忆的心理创伤事件是曾经真实发生过的。的确，这样的心理创伤事件，首先在病人的内心是非常逼真的，几乎就是一种“客观现实”。

那么，病人所回忆起来的幼年的心理创伤事件，是否一定是真实呢？首先，我们尽管可以怀疑，但是不应武断地认为这是病人在编造谎言来欺骗心理治疗师。其次，我们可以找病人幼年的养育人进行调查，看病人所说的心理创伤事件能否被他的养育人所证实。如果养育人证实了病人的回忆是当时真正发生过的事情，似乎表明那就是一种客观现实了。可问题是：如果养育人不能够证实病人的回忆，那么，我们是否就能得出结论，病人的回忆就一定不是真实的呢？

有位医生曾经接待过一个强迫症患者，在心理分析过程中，病人回忆起她幼年曾经受到母亲严厉的指责，医生经过分析得出结论，她的幼年缺乏母

爱的。结果病人回家后与母亲大吵大闹，指责母亲没有给她足够的母爱。可是她没有想到，母亲非常气愤地说：“如果我当初不爱你，就不会那么辛苦地给你做饭、洗衣服了；假如我不爱你的话，当初你得了病，如果我不及时带你去医院看病的话，你早就活不到现在了。”后来病人回到诊室，困惑地问医生：“究竟你分析的是真实的呢，还是我妈妈说的是真实的，还是我的感受是真实的呢？”

我们生活在一个物理世界中，我们看到了蓝天白云，绿树红花；我们同时还生活在人与人之间所建立起来的感情世界中，生活在我们自己的感受中，生活在我们自己所建立起来的内心世界之中。对于物理世界中存在的东西，比如，我们看到了一只苹果，我们会想：这只苹果是真实存在的吗？会不会是幻觉？当我们有疑问的时候，我们当然可以通过别人的眼睛来证实苹果的存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手去触摸它来验证它的存在，或者我们采用科学仪器设备来进行检验、测定，证明它的存在。可是，对于我们心理世界中的感受，比如，“我感到自己很可爱”，这种感受如何能够被客观检验的方法证实呢？目前还没



有什么科学仪器设备能够直接检验出人们的心理感受,尽管别人可以认为我这个人很是讨厌,可是只要我自己觉得我很可爱,这就够了。别人对我的看法如何,是否会喜欢我这个人,那是别人的事情,它属于别人,而不能由此来证明我的感受是否正确、是否存在,更不能替代我的感受。“我感到自己很可爱”,这样的感受既无法被他人检验,也没有必要被检验,对我个人来讲,它是确实地存在于我的内心世界的,这就是一种千真万确的“真实”,只不过这是一种不同于客观世界的真实,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心理的现实”。

这样的心理现实不可否认地存在着,它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存在于整个人类的心中。

人,活在当下吗?

人类是历史的人,通过文化和人际交流而发展、延续着。每个人也是历史中的个体,每个人在继承人类文化的同时,也承载着自己的生活经历,我们此时此刻的各种心理感受,都无法离开我们既往的生活经验而独立存在。比如,“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些都表明,我们现在

的心理状态跟我们既往的生活经历有着无法割舍的联系。个体既往的生活经历正在影响着我们现在的认知、情感和行为。

然而，当我们回忆过去的生活经历的时候，又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现在的生活情景的影响。我们经常是触景生情的。比如当我们参加新婚喜宴的时候，当听到祝新娘新郎白头偕老时，我们也会不由自主地回忆起自己当初结婚时的情景。当看到路边的乞丐惨兮兮坐在地上拉二胡时，我们也会顿生怜悯之心，慷慨解囊，投币相助。虽然我们自己并没有真的做过乞丐，表面上看来我们与他们很不相同，可是当我们看到他们的时候，却勾起了我们自己所经历的很多痛苦无助事件的情感记忆。这样的一些内心感受在平时我们似乎根本感觉不到它，但它的确存在于我们心中。只有在遇到乞丐的时候，我们的这些情感才得以展现。在心理治疗会谈中，在具有安全感并得到接纳和尊重的治疗情境中，在治疗师面前，来访者就会放下自己平时貌似坚强的面具，会把压在心底的苦恼一股脑儿地倾倒出来。当治疗结束后，他又重新戴上面具，坚强地走出治疗室，走在大街上，他看上



去完全是一个心理很坚强的人。由此看来,心理治疗师并没有凭空制造出来访者的这些痛苦,这些痛苦本来就存在于来访者内心,治疗师只不过是来访者创造了一个表达这些情感的情境而已。如果来访者内心没有这些痛苦的话,治疗师是无论如何都无法让来访者出现这样的情感的。实际上,每个来访者都有其各自不同的心理创伤经历,有着各自不同的心理感受。同一个治疗师,在同一个治疗房间里,接待不同的来访者,看到他们流出的是各自不同的伤心泪。

童年性创伤,谁是“主犯”?

在病人的回忆中,性的创伤经历占有很大的比重。比如来访者回忆起来,在她七八岁的时候与童年小伙伴曾经模仿大人的样子,进行过性游戏。当时她并不能完全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没有任何羞耻感,她能愉快地玩着过家家的游戏。可是等她到了青春期,她的性欲望日益增强,自我压抑的力量也日益增强,对自己的要求也日益严厉,因为她从父母老师的言谈话语中感受到,性是肮脏的东西,女孩子一定要文静,女孩儿不能说脏话,女孩子如果有性的

欲望或念头那是多么多么的肮脏！这时，女孩子受社会文化中女性角色价值评判的影响，她就会不由得想起自己幼年曾经玩过的性游戏，就会在内心对自己进行价值评判，认为自己做过女孩子不应该做的事情，内心矛盾冲突就会变得异常激烈。甚至会想起来父亲曾经给她洗过屁股，睡眠中她曾经被父亲的手弄醒……她会认为自己曾经受到过性的伤害。

我们在临床工作中，经常看到一些因怕脏而反复洗手的强迫症女病人。如果问她们为什么这样反复洗手，她们会说：手上有脏东西。你再问她们：脏东西是指什么？她们回答说：就是“细菌”、“病毒”或者“血液”什么的吧。这时候我们一定会继续问下去：究竟是什么东西让你感到脏，如果是细菌、病毒之类的东西，肯定你没有必要这样反复洗手，看你都把手上的皮肤洗破了！这时，女病人看我们在认真地追问，她会补充说：其实，我知道我怕的那种“脏”并不真的是细菌或者病毒，其实我也知道我没有必要这样反复地洗手，可是，如果不洗手，我就会感到有一种强烈的不安，会感到我自己是多么的“肮脏”，我是通过用洗手这样一个具体的动作，来洗去我心灵上的“肮



脏”，具体说来是一种“厌恶感”。我们再问：这些脏东西是通过什么途径进入你体内的呢？病人说：可以通过我的手，吃饭的时候，会进入到口中，进入体内。医生继续追问：还有别的途径吗？病人会说：……还有就是我上厕所的时候，我的手会碰到“下身”，把“下身”弄脏了，然后脏东西就通过“下身”进入体内了。这样的女病人一般不直接说会阴部，而经常是指代为“下身”。其实正常的女孩子也是这样来指代的。最终我们会问：你认为你的下身是干净的还是脏的？你所说的脏和厌恶感是什么意思？病人不得不承认：自己也感到自己的下身是脏的。她所谓的“脏”，在心理上通常是指那些与性有关的内容，比如性欲望，性器官，外阴部的分泌物，月经血，男女之间的性行为，等等。当我们知道了这些之后，我们会明白，病人的强迫洗手，只不过是她摆脱内心“性欲”的一种象征性的仪式动作。因为她从骨子里相信女人的性器官是丑陋的，性是“肮脏”的东西，她厌恶性，也厌恶她自己，她要让自己变得纯洁高尚，她就要开始反复洗手。可是，女人毕竟也是血肉之躯啊，女人的性欲是不会通过洗手而彻底消除的，相反会因为洗手而不

断地得到强化,使性能量在洗手的动作中悄然释放。所以我们会看到强迫怕脏的女病人,她们能够整上午地在水龙头前反复洗手,时间长了,手洗破了,人洗累了,可她们还是难以让自己停下来。这样的女病人让我们感到十分同情和可怜。如果她们结婚了,我们还会发现,她们不仅存在怕脏洗手的强迫症状,还经常伴有对性生活的厌恶感。曾有一位患有强迫症的女病人跟我说:她一般都是尽量躲着丈夫,不与丈夫过性生活的,因为她从小所受的教育,使她感到性是肮脏的,即使发生在夫妻之间。当实在躲不过去的时候,她也能让丈夫“操作”一次,而她手里会拿着一本杂志,边躺着看书边让自己的丈夫在自己身上操作,并不断地问丈夫:你快完了吗?还没完?然后她再翻一页杂志……这位女病人除了存在强迫症之外,还存在性厌恶和性功能障碍,因为她在性生活中完全没有身体的愉快感,更没有出现性高潮反应。在临床工作中,强迫症状是病人比较容易说出口的,也是比较容易被临床医生发现的,可性厌恶和性功能障碍,一般病人是很少主动诉说的,临床医生也是很少主动问及的,因而经常导致漏诊。



这样的强迫症女病人，或许存在幼年性创伤事件，也许没有经历过性的创伤。但是，无论怎样，她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认为性是肮脏的。弗洛伊德当年也看到了这样的心理现象，他在心理会谈的过程中，比较重视了解儿童在性心理发展过程中的创伤事件对人的心理发展的影响，同时他也看到了当时社会文化对性的压抑。因此他提出了神经症（包括癔症在内）的性心理压抑的病理心理学说。他认为，人类性欲望压抑之后会表现出一些像神经症这样的精神障碍，这些压抑经常是潜意识的。被病人压抑的性欲并没有因压抑而消逝，而是通过其他方式，如强迫症的反复洗手症状，表现出来。应该说，弗洛伊德对人的性欲给予了最大程度的尊重。性与吃饭一样，是人类最本能的生理活动。对性欲的尊重，如同对食欲的尊重一样，都是对人性的最大程度的接纳和尊重。弗洛伊德的本能学说因此成为后来人本主义心理学发展的基础。

儿童性游戏本身就是儿童性心理发展的一种表现，它也激发了儿童性心理的发展。实际上，单纯的儿童性游戏本身不构成心理创伤，而在成长过程中，

特别是儿童后来所受的教育,让儿童逐渐形成了“性等于肮脏”的价值观念,对照这种观念,回忆自己的过去,成年后的性态度加上儿童时的性经历,在内心反复斗争、冲突,导致内心痛苦,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性心理创伤体验。实际上,病人回忆中所谓的“性创伤”经历,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生活经历,更反映出了在后来的成长过程中所受的性教育,反映出人类在诸多时代对性的压抑。

现在我们可以这么说,没有对性的压抑,就没有人类的文明!人类文明进化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对性的压抑的过程。神经症是人类文明进化的产物,是人类为文明所付出的代价。当然,在压抑本能欲望的过程中,人们同时又通过所谓“现代文明”的方式和手段,为人们的性欲满足提供着各种所谓“现代文明”的环境和条件。

人的心理是由生物本能决定的吗?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虽然通篇没有一个生物学术语,但是,由于弗洛伊德本人是一位医学院毕业生,他所受的医学教育使他更倾向于把人看作



是生物的人,具有生物本能的人,所以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他倾向于挖掘人的内心世界,向着个体心理深处——潜意识——一直走下去,重视人的本能和欲望。到目前为止,在潜意识的研究方面,除了荣格可以与弗洛伊德相媲美,还没有任何一个人在潜意识的研究方面能够超过弗洛伊德当年的研究深度。这样的研究方向,既成就了弗洛伊德对心理学的巨大贡献,也导致了他的理论学说先天存在很多不足。比如,他是以病人为研究对象的,所以他的理论——心理冲突模型、性心理发展模型,对于解释神经症病人的症状形成,对于帮助病人摆脱症状,是很有启发和帮助的。但是,如果把他的这些理论照搬到健康人身上,我们会发现,健康人与病人在心理活动的基本方式方面虽然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但同时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不仅是量上的差异,而且也存在着许多质的不同。由于弗洛伊德着重研究的是人内心深处的欲望和动机,所以他比较不太重视社会环境对人的心理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人类从树上下下来,在地上行走,开始集体捕猎,群体合作,在劳动中创造了语言,在群体活动中建立

了情感联系,发展出了人类特有的高级心理功能。而个体在出生后,虽然他会吸吮动作,但究竟是吃母乳还是吃牛奶,是由母亲喂奶还是由姥姥喂奶,即使是母乳喂养,母亲在给小孩喂奶的时候,如果边喂奶边笑着、拍着、呵护着,这样,小孩不仅是通过吃奶填饱了肚子,还通过母亲的呵护,发展出了对母亲的信任、依恋,并感到自己是可爱的,有能力的,因为只要自己一哭,就会有母亲来喂奶或换尿布。哭、吸吮动作等这样一些本能的生理活动,在妈妈的喂养呵护中被赋予了心理意义、社会价值。小孩在母亲的呵护中逐渐发展形成他日益丰富的社会情感,学会了与他人进行交往的人类语言,他认同于母亲,模仿人类的行为,把自己当人,最终把自己从生物体变成了具有人类心理活动的人类个体。如果小孩在出生后,跟着“狼妈妈”长大,如印度狼孩,他肯定不会形成这么复杂的高级情感。现在的计算机技术发达了,我们可以试想,在小孩出生后,给他胃里插一根胃管,由计算机程序定量给小孩通过这根胃管输送水和食物,虽然这样能够保证小孩的营养和身体发育,但是这小孩绝对无法形成他对人类的社会情感。最多他会



向计算机认同,觉得自己也是一台计算机,而不是把自己当人。

人是具有生物性和社会性双重属性的动物。人的社会性,是人的生物性的衍生物,受到人的生物性的推动;同时人的社会性又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心理功能和感受。比如,一个人自己单独吃饭,没有人聊天,他虽然可以吃饱喝足,但是他不会有更多的感受和快乐。如果两个人在一起吃饭,还是那些饭菜,他们边吃边聊,不仅吃饱了肚子,还增加了情感交流所带来的快乐。人的很多心理活动,比如自尊、权利意识、自我实现等,都是在人的群体活动中产生的,而不是由人的生物本能所决定的。所以,在心理治疗的理论和研究中,在上个世纪后半叶的发展中,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得到了更多精神分析学家的补充和发展,如安娜·弗洛伊德创建的“自我(ego)心理学”、克莱因等创建的“客体关系理论”、科胡特创建的“自体(self)心理学”、鲍尔比创建的“依恋关系理论”等。后来的许多精神分析学家都意识到,职业、个人成就、物质条件等比起我们所爱的人总是排在第二位,他们都承认,人存在着潜意识的生理欲望,但

是，人之所以成为人，不仅受生物本能欲望的推动，其幼年的母婴关系、成年后的人际关系也都是人发展形成其心理功能的重要动因。

人，生活在物质世界中还是心理世界中？

人从很小的年龄开始，就对外界刺激具有感应性，并进一步发展形成他的意识特征。在儿童的心理上，特别是在很小的时候，他们很难准确区分外部客观现实与内在主观想象，甚至会把二者混淆在一起，比如，儿童抱着玩具娃娃，学妈妈的样子跟娃娃说话，给娃娃喂饭、打针、吃药，就跟真的似的。后来随着儿童自我意识的逐步形成，孩子渐渐能够区分自我与他人，能够把自己的心理世界和外部物质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区分开来。可是，即使是成年人，我们的心理活动仍然存在着二者的混合。比如，去庙里烧香拜佛的时候，明明知道神像本是一尊泥胎，可还是要虔诚地跪拜下去，此时求神者把心中的佛和泥胎的佛混在一起了。另如在盖房子的时候，人们在头脑中提前形成了房子的“图纸”，盖房子的过程只不过是把头脑中的“图纸”变成物理世界的房子的过程而



已。一些考古学家,他们非常敬业,他们总是特别仔细地寻找着各种历史古迹,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的线索和证据,例如,考古学家能够根据一些线索推测出秦始皇当年的生活习惯、个人长相、身体健康状况等。但是,这样的考古结论,也只能是推测而已,因为在推测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掺杂了现代考古学家的思维和情感。即使没有这样的掺杂,即使考古学家得出的结论是完全客观的,当时的历史的确就是这样发生的,就算其考古结论百分之百地符合历史真相,那么,这样的考古结论又会有什么用呢?“以古喻今”、“古为今用”,在应用这些考古学结论的时候,仍然难以摆脱现代人在面对、使用这些考古学结论时的情感,包括他们是如何依据自己现在的感情需要来取舍这些“历史真实”的。

从时间上来说,无论是对历史的考察,还是对未来的幻想,都是现代人此时此刻的心理活动,人类只能生活在当今的世界里,特别是在当今的心理世界中。同理,无论来访者(包括病人)对他的既往生活经历做怎样的回忆,不管这样的回忆是多么的真实或者虚假,这都是来访者现在正在进行着的心理活动,

正是这些心理活动让他感受到了难以摆脱的内心痛苦。心理治疗师不是考古学家,他最关心的是来访者现在的痛苦是什么,回忆过去的创伤经历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治疗师只是想通过这样的手段,来帮助眼前的这个来访者释放被压抑的情感,使他从既往的创伤事件的阴影中走出来。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包含着与来访者一起设想未来,此时头脑中想象出来的“未来情景”,更是虚无缥缈的、非客观真实的、无法被客观检验和证明的,但是这些对未来的憧憬和想象,也同样有力地吸引着来访者从情绪低谷中走出来。由此可以看出,在心理治疗临床实践中,我们没有太多必要去过多重视客观世界的真实性,而应强调尊重来访者内心世界的真实性。心理治疗只是在来访者的心理现实世界里进行工作。历史是不可改变的。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事情都是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心理治疗师根本无力改变历史,却能帮助来访者“篡改”其心中的“历史”,改变他对既往经历的感受和看法,并帮助他对所经历过的事情进行新的理解和解释。

心理治疗是在心理学理论指导下的一项临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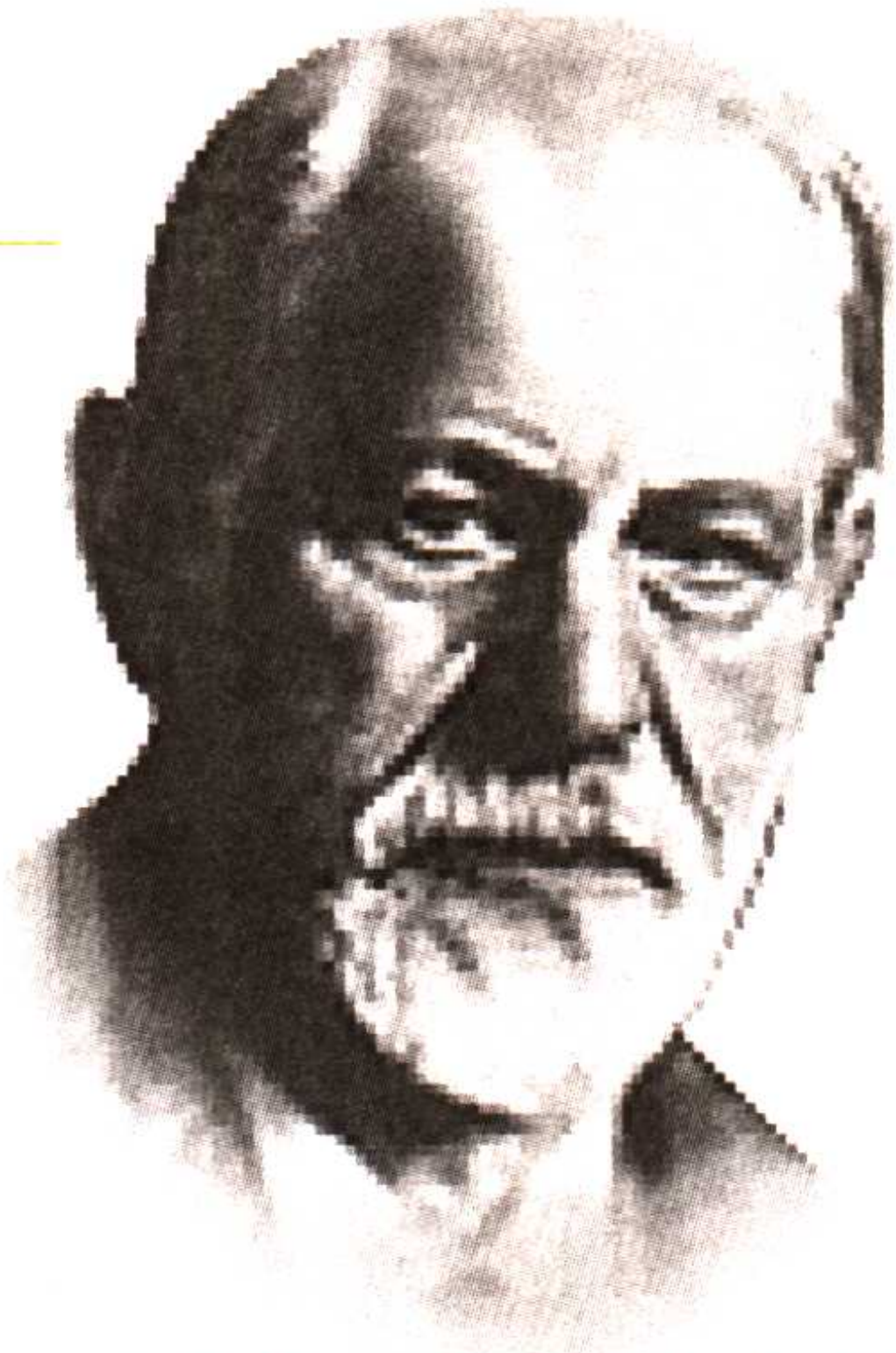


实践活动。尽管心理治疗有科学理论的指导,但是在具体操作中它更像是一项艺术创作活动。而心理治疗理论,则是要弄清楚人的健康心理是如何形成的,心理疾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心理治疗是如何发挥治疗作用的,哪些因素影响了心理治疗的临床疗效,其因果机制如何,等等。这就要求任何心理治疗的理论一定要综合客观世界和心理世界两个方面来考虑,缺一不可。其实精神分析的后期理论,如客体关系理论、自体心理学理论等,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进行了弥补和修正。《弗洛伊德与虚假记忆综合症》这本书的作者菲尔·莫伦在综述弗洛伊德理论的同时,又重新把这个问题摆到了我们面前。

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努力学习精神分析理论与疗法。我的体会是,在刚开始的时候我对精神分析特别有兴趣,甚至可以说是热衷,几乎随便见到一个人,我都会对他分析一番,特别得意。同时,我也对自己进行一些分析,特别希望精神分析能够给自己带来某些好处,对自己的心理成长最好有直接的帮助,尤其希望精神分析能够是我们现代人的一根救命稻

草,似乎只要我们抓住了精神分析这根救命草,一切问题就全解决了。后来却发现,精神分析根本无法完全兑现我们对它的期望,无法让我们过上当初我们所期望的幸福快乐的日子。我也曾一度对精神分析特别地失望,但是最终我听到了一种说法,让我感到十分安慰:“精神分析理论本身不是真理,但它可以是通向真理、逼近人性本来面貌的一种方法和途径。”

现在我越来越相信,弗洛伊德是伟大的,他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的理论是否正确无误,而在于他严肃、认真且大胆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问题,极大地激发了后人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和探索,精神分析理论给我们指出了一条通向真理、逼近人性的道路。在精神分析理论创建一百多年后的今天,重新回顾他的理论与学说,无论我们是否接纳、是否赞成,我相信他的理论依然会鼓舞我们对人性、对人类心灵世界进行无尽的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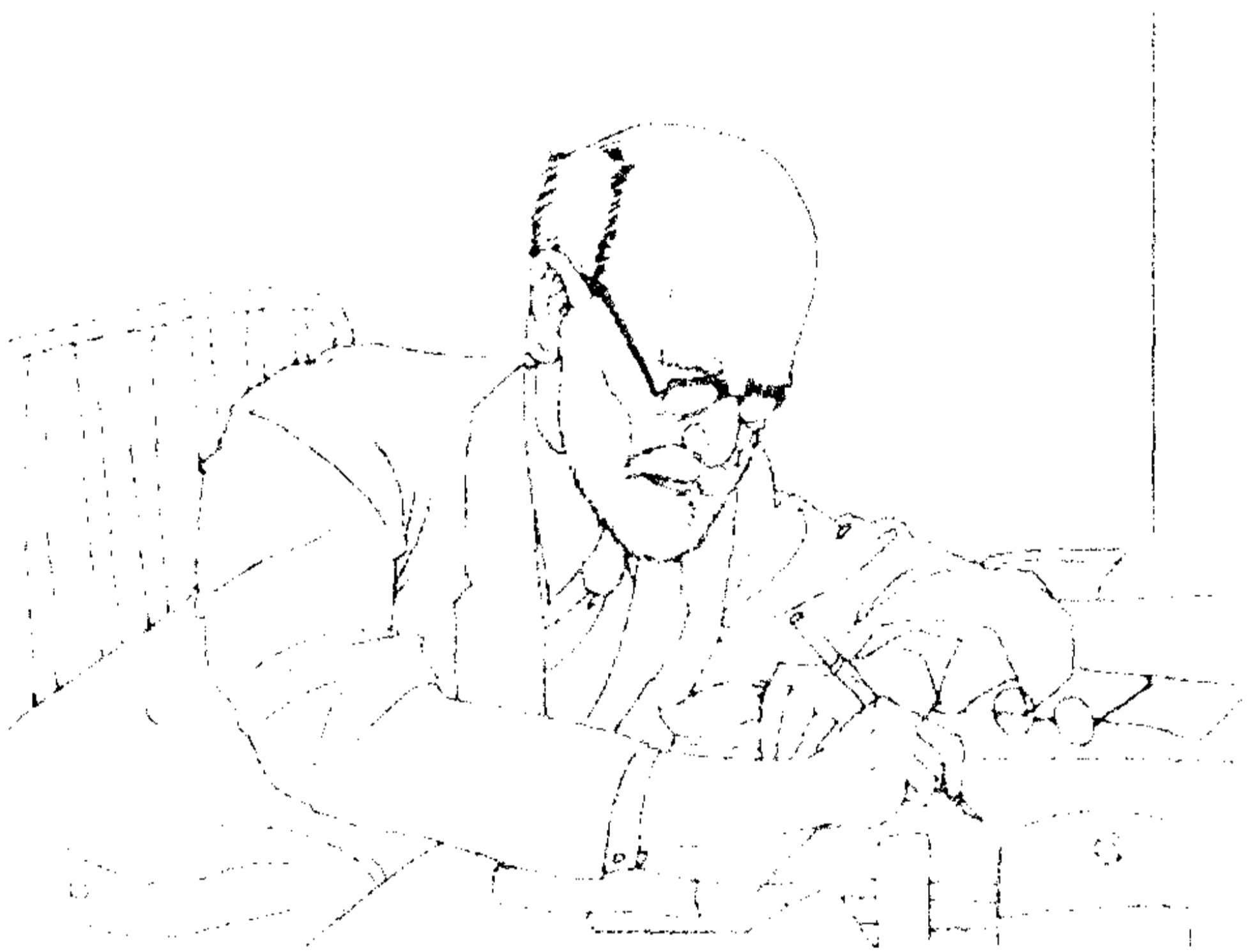


弗洛伊德与虚假记忆综合症

关于性虐待经历的虚假信念和虚假指控会导致巨大的情感损害和痛苦。我们现在关于记忆的知识表明,记忆可能存在各种各样的扭曲。记忆就像是讲述一个故事,是一种重建,而不是对于某个事件精确记录的读取过程。

虚假记忆综合症

*F*alse Memory Syndrome



弗洛伊德意志坚强,工作勤奋。自 1923 年他被检查出患有口腔癌,到他 1939 年去世,其间接受了 33 次手术。为了保持头脑清醒,他一直拒绝使用止痛药,并工作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虚假记忆综合症

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了一种新的精神疾病报告——虚假记忆综合症。患有这种疾病的人在接受心理治疗或咨询后“回忆”起了在童年曾经历过的伤害,而实际上,这种伤害从未发生过。据说这种症状是由于治疗师的治疗而引起的,即因为有害的药物或治疗方式而引起的。

被指控造成这一症状的罪魁祸首是心理治疗师,他们采用了一种“记忆恢复治疗法”,这种治疗方法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成人的许多种苦恼和心理问题可能是由童年时期经受的,而又被遗忘或“压抑了的”性虐待经历引起的。

据说,有时这些心理治疗师会借助包括催眠在

内的特殊技巧,鼓励病人搜索被压抑的记忆。^[1]在他们的说服下,病人可能将那些实际上是想象出来的事件信以为真,为此可能不惜与他们的家庭一刀两断,甚至试图起诉那些所谓的施虐者(例如在美国)——被起诉者通常是父亲。而宣称自己无辜或困惑的言辞在起诉者看来则是被指控者抵赖或意识不到其罪行的证明。在这种状况下,由于这种误导性,不仅病人,而且他的家人都陷入不必要的痛苦中。

当人们意识到对于性虐待的指控呈愈演愈烈之势,游说集团就着手为那些受到指控的人提供支持,力图使人们意识到记忆是不确定的,并宣传有关“虚假记忆综合症”的信息。

尽管这种游说组织存在的目的是代表那些深受“虚假记忆综合症”之苦的受害者的利益,但令人惊讶的是,虽然这个问题在专业杂志上和大众媒体上被广泛讨论,但很难找到这种病症的明确定义,也没有在精神病学教科书、正式记载的精神病名单或其他地方出现过。然而,一位认知治疗的心理学者——约翰·科尔斯多姆(John Kihlstrom,同时他也是美国虚假记忆综合症基金会的顾问)给出了如下定义:



虚假记忆综合症是这样一种状态：一个人的认同和人际关系以一种创伤经历的记忆为中心，这种记忆在客观上是虚假的，但病人对此却深信不疑。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综合症并不以这样的虚假记忆为特征……而是这种记忆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主导了他的整体人格和生活方式，进而打断了他原有的各种适应行为，此时他会不懈地避免任何挑战记忆的证据。这时候，就可以确诊患上了“虚假记忆综合症”。^[2]

这意味着这种综合症并没有被确证，既没有被列入正式的诊断书中，也没有任何描述这种综合症特征的临床病理研究发表在医学或科学杂志上，同时也没有任何精神治疗师为自己冠上“记忆恢复治疗师”的头衔。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议和矛盾之深、之烈再怎么夸大都不过分，最近一篇评论这样描述这种现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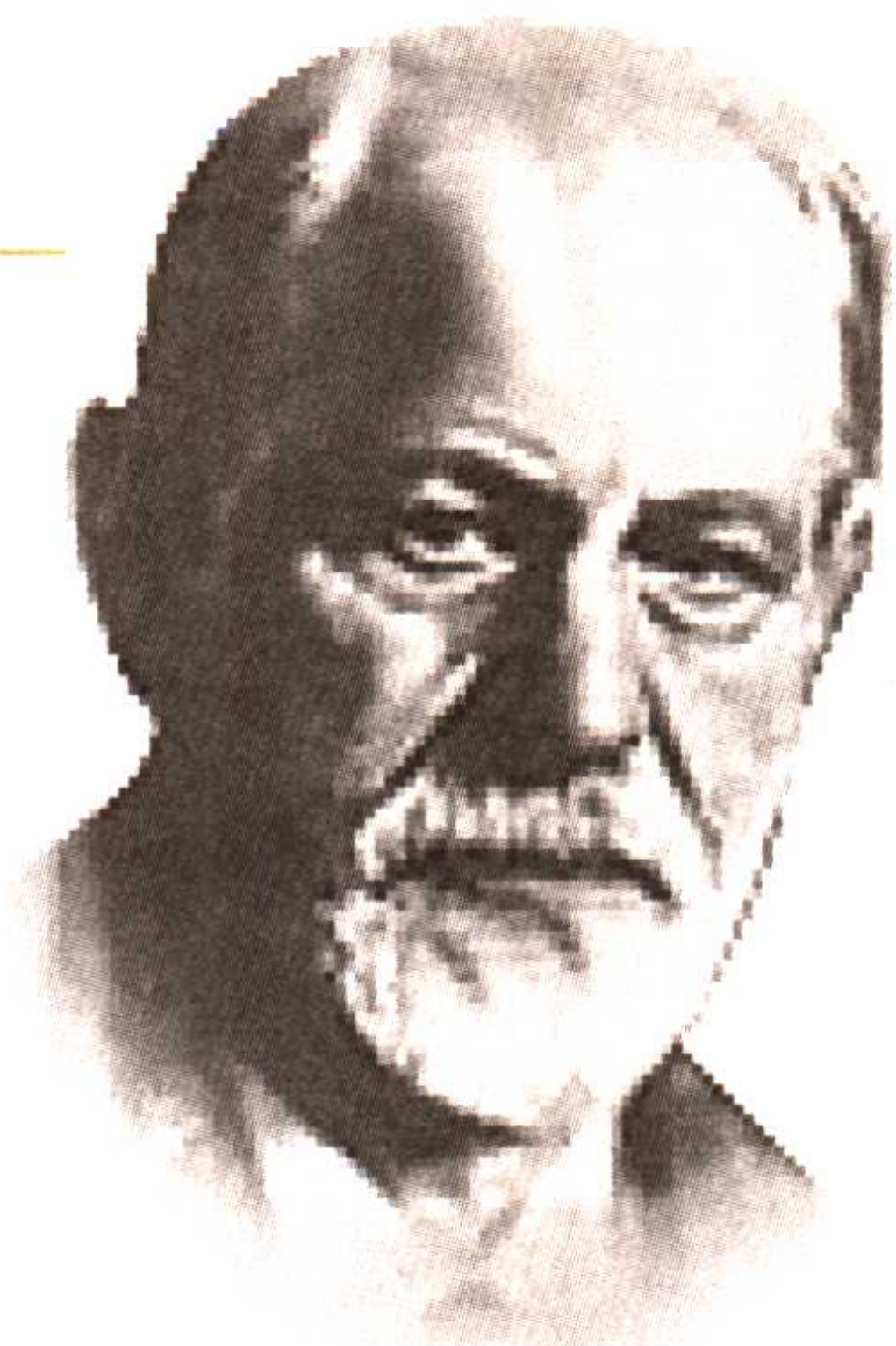
一开始，这种争论的恶劣程度是当代科学争论中所罕见的。由于极端狂热，这门研究已经基本上算不上是一门科学了。其间充满了疯狂和胡言乱语，或者说是“嘴尖舌巧的把戏”。这根

本不是什么科学，而毋宁说是相互之间情绪化的言辞攻击，而报道这个问题的又是一群易受蒙蔽的媒体。^[3]

尽管如此，人们仍然担忧——这是很有道理的——第一，童年记忆是否可信；第二，有些误导性的猜测可能会颠覆精神治疗师的工作。^[4]

关于性虐待经历的虚假信念和虚假指控会导致巨大的情感损害和痛苦。我们现在关于记忆的知识表明，记忆可能存在各种各样的扭曲。记忆就像是讲述一个故事，是一种重建，而不是对于某个事件精确记录的读取过程。事实上，在实践中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即某种“治疗”方式或问诊风格可能含有某种暗示，鼓励人们去回忆、产生群体压力，或者是病人连同治疗师同时放弃了具有批判性和反思性的观点，而任由可塑性极强、充满谬误的记忆导致对童年的错误叙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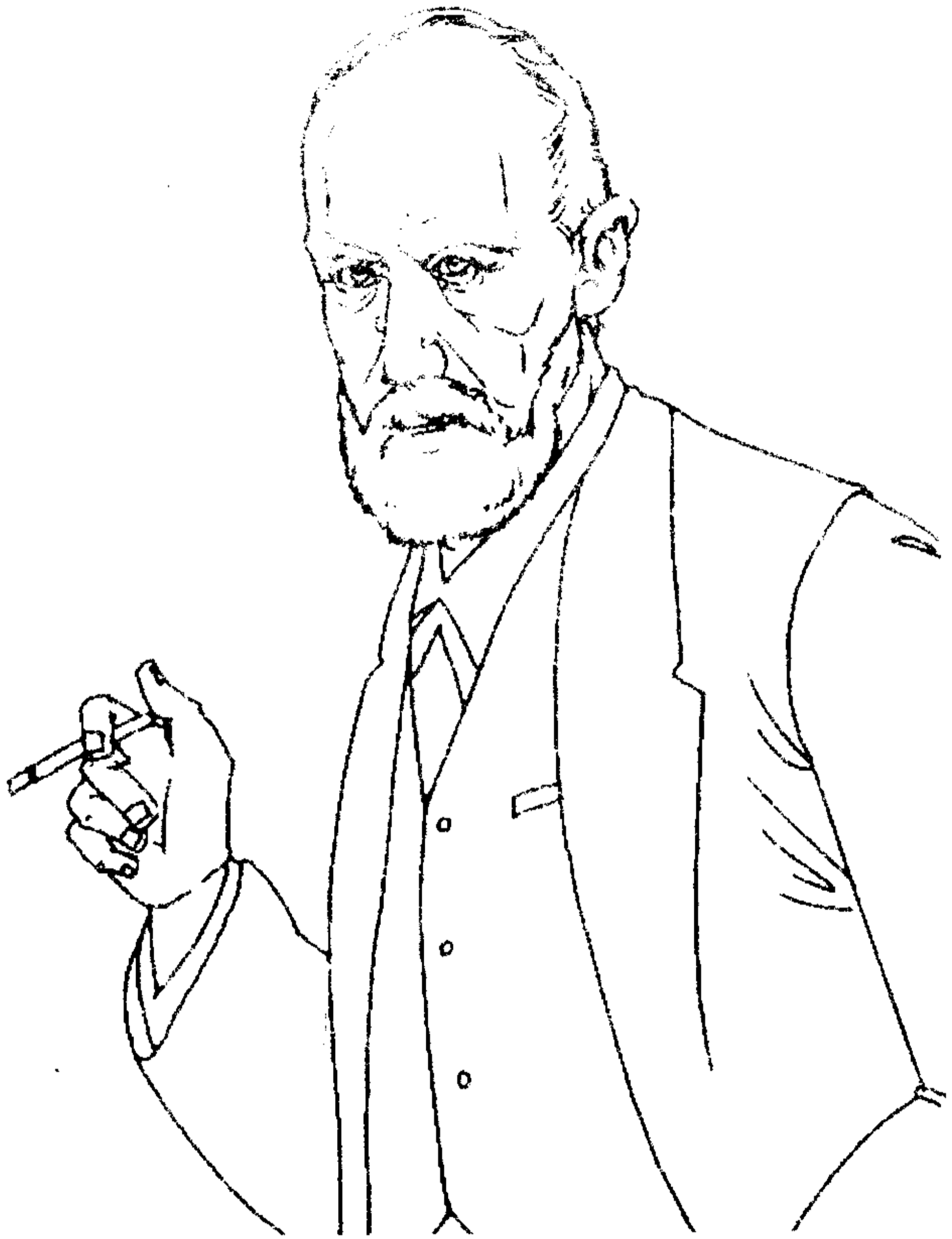
然而，这些过程是复杂的，童年创伤的记忆和遗忘中到底包含什么，精神治疗活动的本质是什么，其影响会有多大，关于这些问题的争论一直在继续。



难道弗洛伊德就是这样一个坏父亲，利用自己不合逻辑的荒诞想法使社会受孕，在百年之后又生下虚假记忆综合症这个怪物？难道弗洛伊德就是记忆恢复治疗师这一现代版本的始作俑者吗？或者，上述说法如此颠倒是非，完全没有事实根据，以致它本身也需要进行一下心理分析了？

这该怪弗洛伊德吗？

Is Freud to Blame?



弗洛伊德酷爱雪茄，保持着每天抽 20 支雪茄的习惯，在查出患有口腔癌后也没有改变这一习惯。

这该怪弗洛伊德吗？

那些认为存在虚假记忆的社会群体指出，虚假记忆综合症的传播是由于许多因素造成的。这其中包括女权主义，反男性、反家庭的态度，以及一种日益壮大的“受害者文化”(culture of victimhood)——一旦他们的生活中出现问题，就会找一个替罪羊出来，指责他毁了自己的生活——甚至还会起诉他。更确切地说，他们认为，精神治疗师特有的亚文化采用了非科学的信念和技术——而要负最终责任的人就是弗洛伊德。因此，社会学家奥夫舍(Ofshe)和瓦特斯(Watters)评论道：

总而言之，正是弗洛伊德塑造了记忆恢复治疗师的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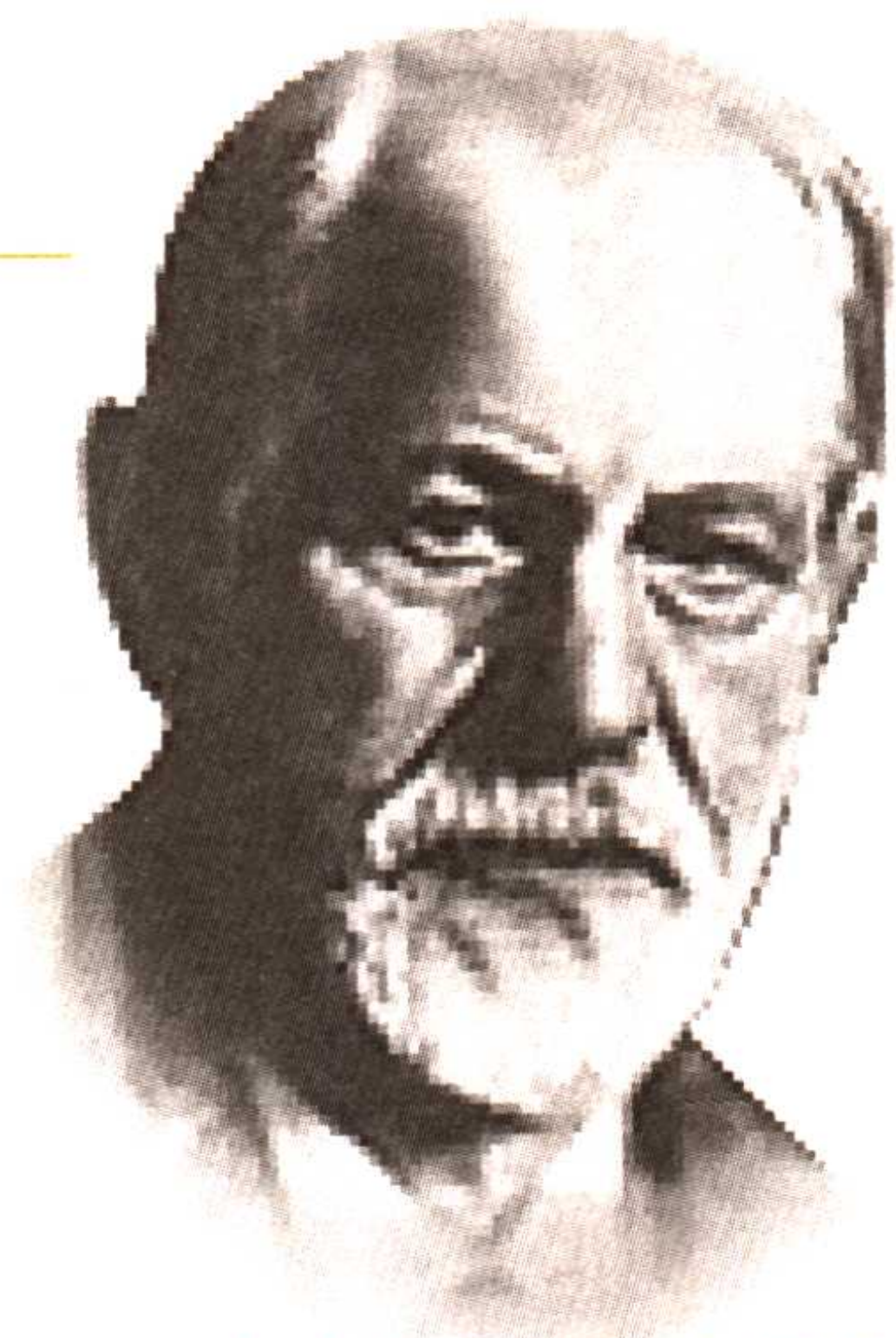
而且

弗洛伊德被证明是‘记忆恢复’狂热之父。^[5]

同样的，文学教授弗雷德·克鲁斯(Fred Crews)认为，弗洛伊德是记忆恢复疗法的创始人，他还说，

精神分析学是我们这个时代伪科学的典型范例。^[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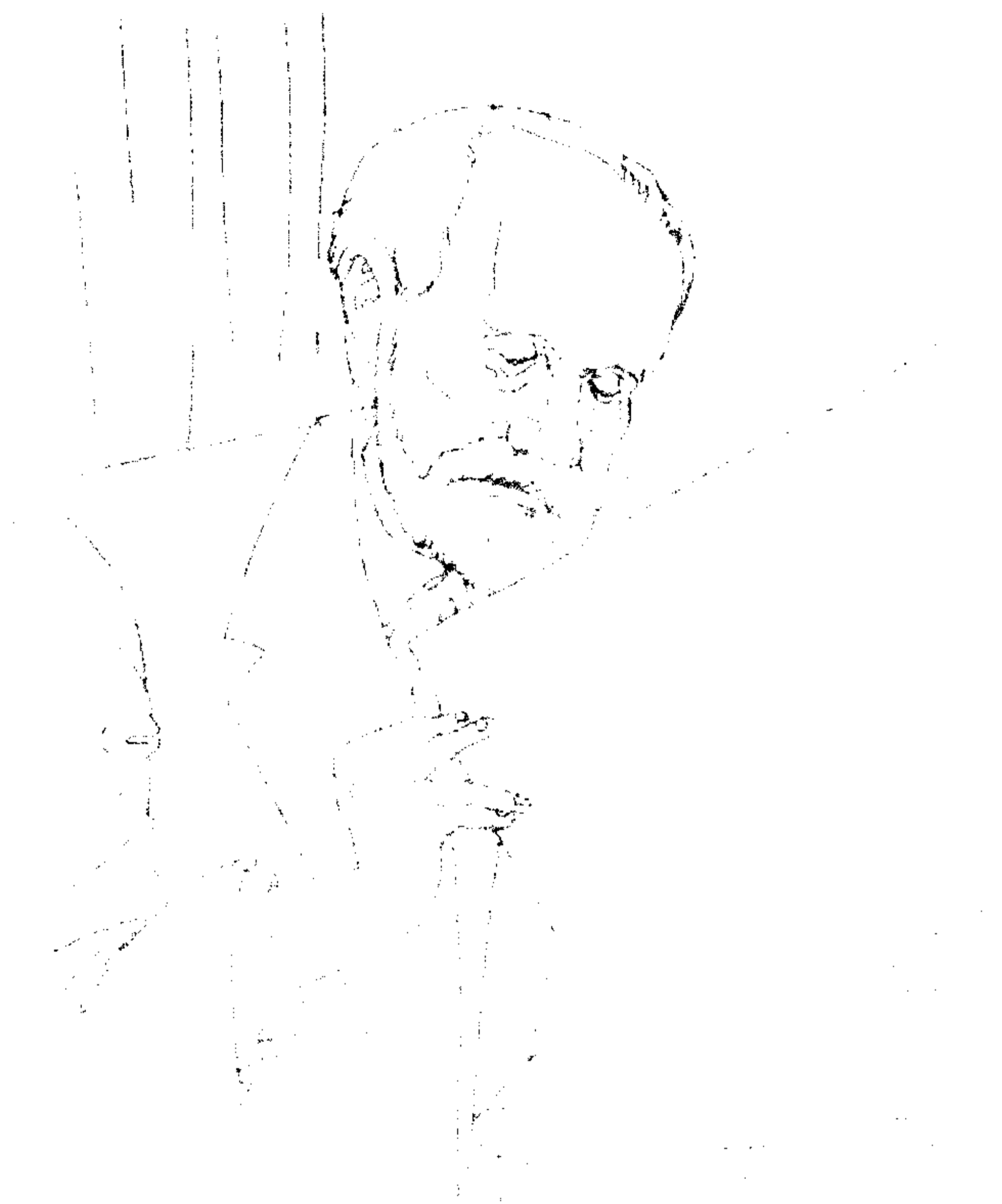
难道弗洛伊德就是这样一个好父亲，利用自己不合逻辑的荒诞想法使社会受孕，在百年之后又生下虚假记忆综合症这个怪物？那些记忆恢复治疗师通过暗示，操纵了柔弱的病人的心灵和记忆，引导病人搜索有关那些从未发生过的伤害的记忆，并坚信所有类型的心理问题都源于童年遭受的性虐待，并无可救药地坚持这些关于记忆并不准确的想法。难道弗洛伊德就是记忆恢复治疗师这一现代版本的始作俑者吗？或者，上述说法如此颠倒是非，完全没有事实根据，以致它本身也需要进行一下心理分析了？要想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看看弗洛伊德本人关于引发精神症状的缘由的观点、理论以及他关于记忆的看法。



这种说法是关于虚假记忆争论的典型言辞，它试图将弗洛伊德划归到“记忆恢复治疗师”的行列中。然而，这只是基于对于弗洛伊德和布洛依尔说法的想象，而非对其文本的研读，因为五个案例的历史纪录与童年遭受的性虐待所导致的问题并无干系。

弗洛伊德关于精神病理学的观点

Freud's Views on Psychopathology



弗洛伊德在工作。

弗洛伊德关于精神病理学的观点

弗洛伊德首部主要著作——《癔病研究》(*Studies on Hysteria*)^[7]是与乔瑟夫·布洛依尔(Josef Breuer)教授合作的，它标志精神分析的开端。在这部著作中，两位作者描述了一种当时尚属十分新颖的治疗方法——“谈话疗法”。

弗洛伊德和布洛依尔的发现是，如果病人被鼓励自由地谈话，常常有可能探寻到病症的根源，随后就能够在其人际关系和精神动力的背景下加以理解。这种理解可能引导我们找到消除这种病症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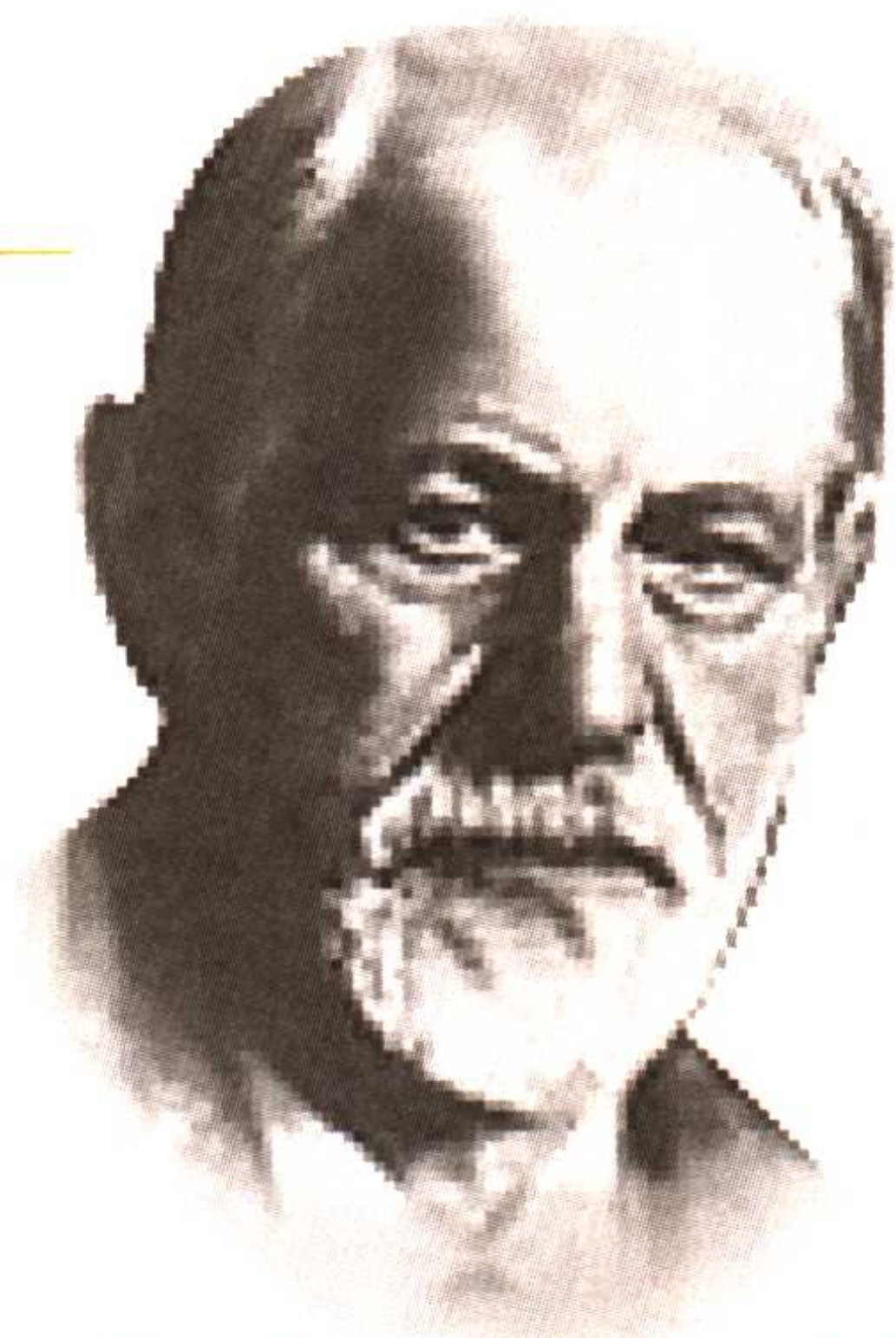
谈话本身可以治愈诸如癔病性麻痹这种身体功能性紊乱，这种观点在其最初公布出来的时候确实

非常令人惊奇。

不幸的是，对于这本书的某种误读在当今关于记忆恢复的争论中一再被散布和循环。例如，丹尼尔·沙柯特(Daniel Schacter)，一位著名的心理学研究者在其对记忆的研究中提到：

西蒙·弗洛伊德和乔瑟夫·布洛依尔关于癔病的经典研究描绘了这样一些病人，他们不能清楚地记起童年遭受的性虐待，却产生了诸如恐惧、烦躁、焦虑、唠唠叨叨、突发性狂想，或者是恐怖形象等症状，这些都反映出对创伤的模糊记忆。然而，因为通常缺乏独立的证据，对上述例子加以证明是很难的。^[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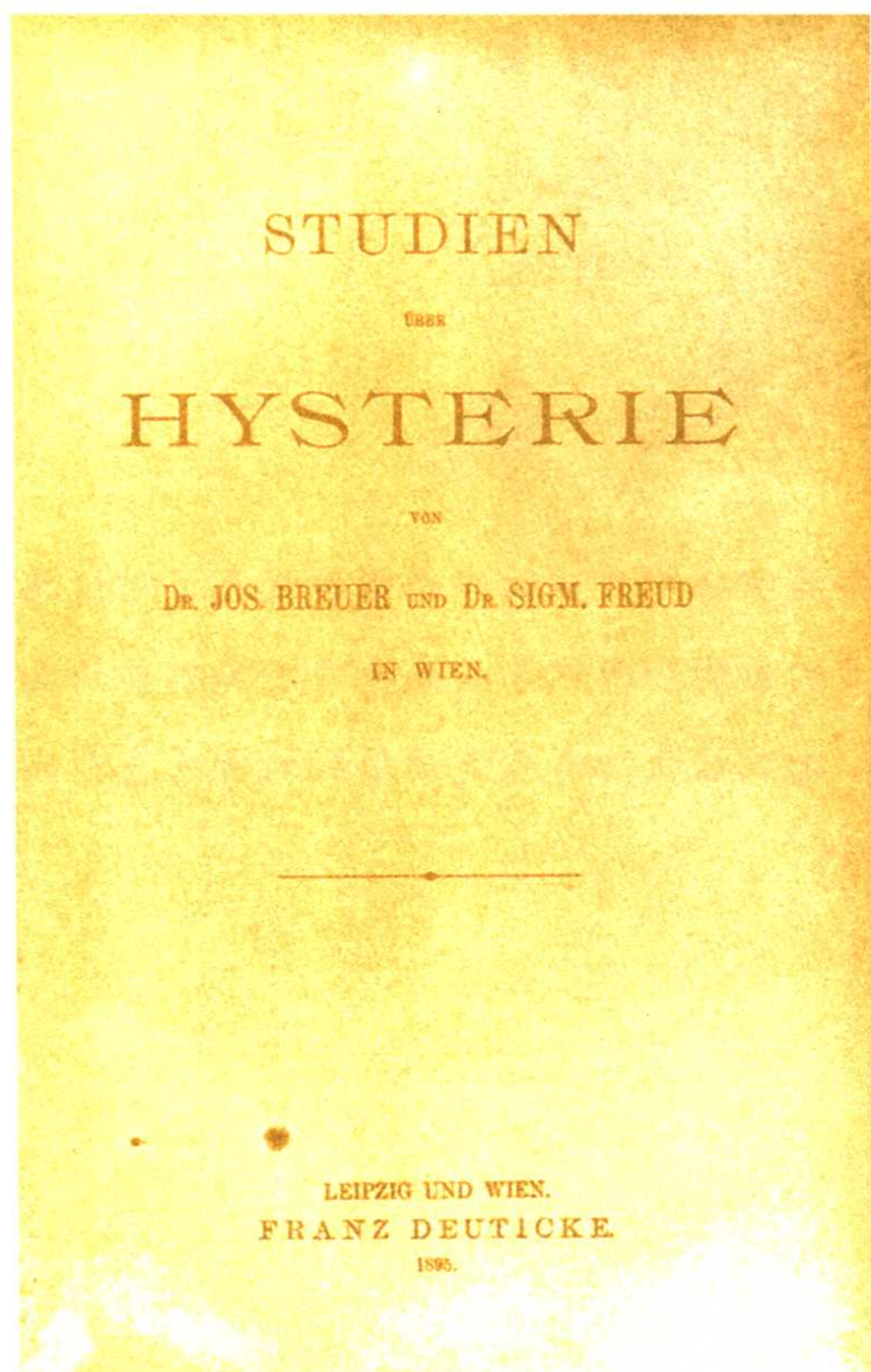
这种说法是关于虚假记忆争论的典型言辞，它试图将弗洛伊德划归到“记忆恢复治疗师”的行列中。然而，这只是基于对于弗洛伊德和布洛依尔说法的想象，而非对其文本的研读，因为五个案例的历史纪录与童年遭受的性虐待所导致的问题并无干系。



弗洛伊德与虚假记忆综合症

弗洛伊德所处理的四个案例代表了对情感或利比多的抑制和禁锢导致感情冲突和创伤的典型例子。癔病症状被看作是被禁锢的情感或利比多的转移。

癔病研究
The Studies on Hysteria



《癡病研究》(1895)书影

癔病研究

这些癔病研究案例中最著名的是关于安娜·欧(Anna O)的案例,而它恰恰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理论 and 冲突中的心灵模式毫不相干。实际上,这个例子阐释的是布洛伊尔的理论,即“催眠理论”是癔病分离症状的基础(自发性的自我催眠状态)。另外四个案例才是弗洛伊德的,并且没有一个与被遗忘的童年性虐待记忆相关,当然卡特琳的例子确实与她在十四岁时受到性侵害有关。

受压抑的利比多

在爱米(Emmy von N)的案例中,弗洛伊德列举了一些导致她癔病症状的成年创伤。例如,惧怕受到

不可预期的打击与她看到丈夫突发心脏病有关；害怕陌生人潜入她的房间与她进入仆人的房间时看到一个男人隐藏在黑暗中有关；害怕被活埋与她丈夫的尸体被抬出去时她还相信他并没有死有关。

弗洛伊德考虑上述焦虑持续的原因是由于她多年没有性生活。因此，他将爱米当作阐释他早期的神经衰弱理论的一个例子(后期则基本被放弃)，认为她的这种状态并没有心理上的内容，而是由于利比多受到压抑而产生的一种身心状态。

烤糊的布丁

露西(Lucy R)是一个女家庭教师，曾经患有抑郁症，并在幻觉中经常嗅到烤糊的布丁的味道。弗洛伊德鼓励她回忆第一次嗅到这种味道的情境。她说，两个月前，一封母亲的来信令她非常苦恼，她一时分心把炉子上的布丁烤糊了。

露西从那时起开始经历了一场冲突，她想离职回到母亲身边生活，部分原因是她觉得任教家庭里其他仆人背地里对她闲言闲语，可是她又觉得自己有义务继续照顾那些孩子们，尤其是因为在这些孩



子的妈妈临死前,她曾答应过要照顾他们。

随着弗洛伊德询问的深入,露西进一步袒露了她去职想法的另外一个原因。有一次她的雇主向她说了些心里话,使她以为他对自己有爱慕之意,并促使她产生欲望和幻想。然而随后发生了一个意外,一次她的雇主朝露西大吵大叫,并粗鲁地训斥了她,这样一来,露西的浪漫愿望彻底破灭了。这种羞辱伤害了她的自尊心,因此她想去职。

弗洛伊德推测,露西去职的愿望与她兑现照看孩子的承诺并不一致,因此去职的愿望被否定了,也即被“压抑”了。被压抑的去职念头或许由于母亲的来信进一步被激发,使她的意识中只有一个联想,即烤糊的布丁的味道,并强迫地持续进入她的意识之中。弗洛伊德这样向露西解释,她爱上了她的雇主。露西承认了这一点,但是又说:“我不知道,或者不如说我不想知道。我想将这个念头逐出大脑,不再想它,并且我以为我成功了。”弗洛伊德在一个脚注中这样评论:

对这种奇特的心智状态我可以做的最好解释就是,一个人同时既知道又不知道一件事

情。^[9]

这样一个分析，一个了不起的简短精神疗法的例子持续了九个星期，取得了令人欣慰的结果。露西的抑郁和幻嗅症状都消除了，并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她的雇主从来都没对她有意过。

令人不快的情境

卡特琳娜(Katherina)是一个 18 岁的女孩，弗洛伊德在山中度假时遇到了她。她患有焦虑症、呼吸急促并且经常在幻觉中看到一张可怕的脸。这些症状已经出现两年了。当弗洛伊德暗示她在两年前曾经历过某件烦恼的事情时，她说：“天哪！的确是这样，有一次我撞上我的姨父和我的表妹弗兰西斯卡在一起。”

卡特琳娜看到她的表妹和她的姨父的性行为后出现了呼吸急促和呕吐的症状。当弗洛伊德鼓励她继续说下去，她又谈到她的姨父还曾经在她 14 岁时想占她的便宜，但由于她当时天真无知，还没有意识到那是性侵犯。弗洛伊德得出结论，当卡特琳娜看到她的姨父和弗兰西斯卡之间的性行为时想到：“现在



他对弗兰西斯卡做的事情正是他那天晚上和其他时候想对我做的事情。”

卡特琳娜同意这种解释。因此，她受到的创伤是回顾性的，在意识到她姨夫行为的意义后又被唤起。后来，卡特琳娜把她看到的事情告诉了她的姨妈，这又导致了她的姨父和姨妈之间的“令人不快的情境”。她的姨父对她大发雷霆，结果她发现，出现在卡特琳娜幻觉中的那张“可怕的脸”就是她姨父。在1924年所做的一个脚注中，弗洛伊德大胆地说他“掀开了禁忌的面纱”，显露出卡特琳娜的姨父实际上不是别人，恰恰是她的父亲！

腿 疼

伊丽莎白(Elizabeth von R)腿疼，走路都很困难，被认为是癔病的症状。弗洛伊德通过追踪伊丽莎白的思想轨迹，使她回忆起了她照顾生病的父亲时的一段感情冲突。有一次她外出参加一个聚会，一个年轻的男人护送她回家，而对这个男人她心仪已久。但当她回到家中，她父亲病情加重了不少，于是自责疏忽了父亲。

随着分析的深入，几年后出现了另外一个相似的心理冲突。很显然，伊丽莎白对她姐夫很着迷，而她的姐姐后来因难产而死了。弗洛伊德认为，伊丽莎白有了“姐夫现在可以自由地娶我了”这样一个念头，但她又深深为这个念头自责，于是立刻否定和压抑了这个想法。弗洛伊德认为，在上述每个心理冲突的环境下，伊丽莎白都经历着性爱念头和愿望与她道德意识的不相容，并且性爱的念头受到了压抑，其影响转而显现为肉体上的疼痛。

通过分析，伊丽莎白被治愈了。她没有嫁给姐夫，而是别人。弗洛伊德说他后来参加了一个舞会，在那里他遇到了同样作为嘉宾出席的伊丽莎白，并且目睹了她“在轻歌曼舞中与他擦肩而过”。很显然，她的腿疾显然已经完全消失了。

评 论

与沙柯特的说法相左，上述研究中的案例与受到压抑的记忆、恢复记忆和童年遭受的性虐待都没有关系。相反，弗洛伊德所处理的四个案例代表了对情感或利比多的抑制和禁锢导致感情冲突和创伤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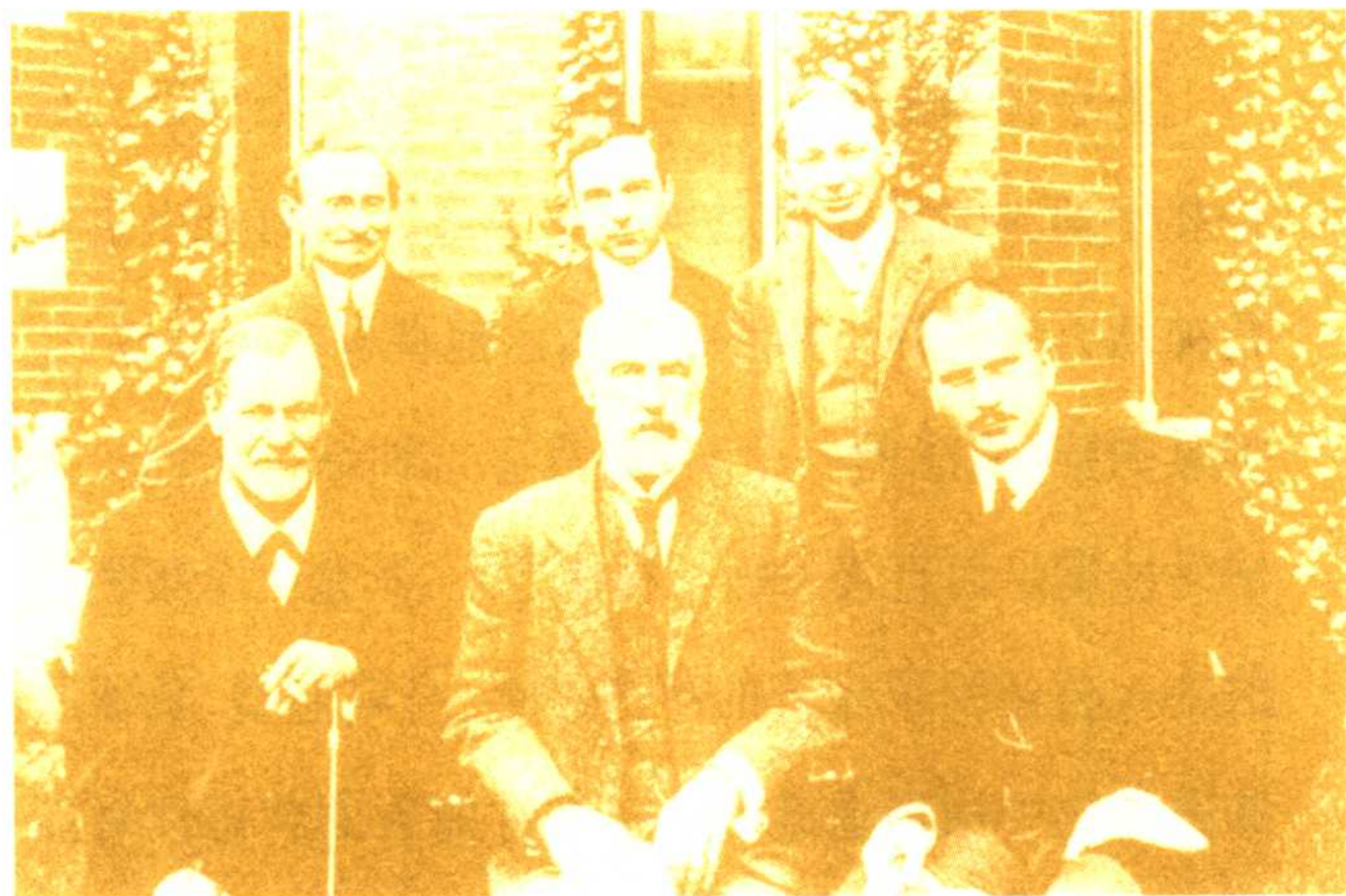
典型例子。癡病症状被看作是被禁锢的情感或利比多的转移。

因此爱米未释放出来的利比多源于她对性欲的压抑。露西忍受的痛苦源于没有结果的单恋,并且挣扎于回到母亲身边和继续留在任教家庭照顾孩子的冲突之间。卡特琳娜经历了目睹她的父亲与她的表妹之间的性事的打击,并且意识到若干年前她的父亲试图上她的床时就是想要做那样的事情。伊丽莎白因为她的姐姐去世后她想嫁给姐夫而有负罪感,并因此压抑了这个愿望。

关于爱米的案例研究看上去最令人不满意。她挣扎于何种情感冲突之中并不明显,因而难以进行精神动力学解释。弗洛伊德暗示他将爱米当作他“精神衰弱症”概念的一个实例,具有这种综合症的人因缺乏性满足而直接患病。相比之下,其余三个案例中的主人公经受了痛苦的感情冲突,身陷愿望、负罪感和羞愧之中而进退维谷——这种痛苦的状态读者能够轻易理解。不论是对自己还是别人,这些女人向她们自己或者别人倾诉自己内心冲突的机会可能非常有限。倾诉的道路被阻断,她们的痛苦就在肉体上寻

找出路，直至通过与弗洛伊德进行治疗性的谈话才得以解脱。

上述弗洛伊德所描述的例子中没有一个与对记忆的压抑有关，受到压抑的只是思想、感情和欲望。



弗洛伊德(前排左)1909年在克拉克大学



弗洛伊德的本意却是，在青春期之后童年的记忆被唤起，并产生了当时那个事件并没有产生的性觉醒。这种性动力，即利比多，并没有直接被体验为性欲，而是通过心理过程转换为焦虑。就其理论的这一点，弗洛伊德认为利比多被抑制，其正常的表达被阻断，从而导致利比多的转换，焦虑由此产生。这个时候，弗洛伊德还没有形成关于童年时期的性与孩子本身的性欲的理论。

弗洛伊德精神病理学中的性虐待理论

Freud's Sexual Abuse Theory of Psychopathology



弗洛伊德与妻子在一起

弗洛伊德精神病理学中的性虐待理论

弗洛伊德确实持有过这样一个理论，即癔病的病原是性虐待。这一观点包含在发表于 1896 年的两篇论文中。第一篇是《有关防卫性神经精神病 (Nero-psychoses of Defence) 的进一步评论》。在文章的开头他将一些精神方面的病态状况都冠之以“防卫性神经精神病”(the neuro-psychoses of defence)的术语,他解释道,它们都具有这样的一个特征:

所有这些症状都通过(潜意识状态下的)生理防卫机制出现的——也即,试图压抑某种与病人自我相冲突的、令人困扰的念头。^[10]

弗洛伊德以其早期的观点,即他在《癔病研究》中发表过的观点——癔病的症状可以被追溯到生理

创伤——为基础,进一步论证道:

那些性创伤一定是发生在童年时期(在青春期之前),并且一定包含对性器官的刺激(以及类似性交的过程)。^[11]

有趣的是,尽管弗洛伊德提及两例男性癔病病例,但是他仍然认为导致癔病的原因在女性中更为普遍,这是因为女性在童年时期更容易受到性侵害。

性创伤理论的两种类型

弗洛伊德在当时认为,对孩子的性侵扰本身并不一定产生伤害。他评论道:

对幼童的性侵害如此频繁,以至于并不具有任何病原学上的重要性。^[12]

弗洛伊德提出这样一个理论:童年时期性虐待的记忆,在后来(青春期之后)遭到某种伤害的刺激后又被重新唤起,这时候童年性虐待的影响就出现了。他认为癔病的发生需要对孩子性器官的直接刺激,而能够重新唤起早期受侵害记忆的后期伤害并不限于对性器官的刺激,而可以是各种类型的性虐待。



这些类型可以是真正的性强暴，也可以是性挑逗，或者只是目睹了别人的性行为，或者是接受了有关性过程的信息。^[13]

记忆本身受到了压制，其相关的影响就转化为癔病症状。更进一步，弗洛伊德在这一点上做出了假定：对于后来（青春期之后）遭受的性侵害的记忆，只有当这种经历激活了有关童年时期的创伤记忆后才会发生。

对商店的恐惧

后来的经历会重新唤起先前的经历，这种延迟的创伤行为将导致一些症状，这在弗洛伊德的《科学心理学方案》（*Project for a Scientific Psychology*, 1895）中被加以讨论。这一著作是他试图将心理学和神经学结合起来的早期尝试。他提供了一个临床学的病例——爱玛（Emma）。爱玛的症状是不能独自走入商店。她讲述了她12岁时的记忆：有一次她走进一个商店，看到两个男店员正在取笑她穿的衣服，而她对其中一个店员恰恰颇有好感。于是她焦虑不安地跑出商店。弗洛伊德经过深入研究，发现另一个记

忆：在爱玛八岁的时候，曾被糖果店的老板性侵扰过。在这两个情境之间的联系是，商店店员的嘲笑会使她记起当年糖果店老板抓住她的性器官时狞笑的嘴脸。另外一个联系是：她去这两家商店的时候都是单独一个人。弗洛伊德解释了第一个记忆(八岁时的记忆)被重新唤起时发生了什么：

当她的记忆被唤起时，她的性本能得不到释放，于是就转化成了焦虑。由于这种焦虑，爱玛害怕商店的店员可能会再次侵扰她，所以她逃走了。^[14]

弗洛伊德补充道，在爱玛 12 岁的第二个记忆中有一个细节，当时她觉得这两个店员中有一个很有魅力，这就预示了性的释放已经出现，并已进入她的意识之中，尽管这与她的第一个记忆并无关联。

延迟作用

在某种意义上，“延迟作用”这个术语和日常的临床观察相关，这对于那些治疗在童年受到性虐待的病人的医师而言是很熟悉的。在成年时只要某个事件与童年的创伤建立起了联系，焦虑等与性虐待



有关的感情就会因此被唤起。举一个普遍的例子：当一个人在童年时受到了性虐待，后来当他/她有了自己的孩子，或是当他的孩子也长到了当年他遭受伤害的年龄，就会想起自己当初受的创伤。然而，今天我们一般习惯以两种方式理解这种效应，而这两种方式都不是弗洛伊德的本意。

第一种方式是成年的事件直接唤起了童年的创伤经历，比如受到惊吓、过度刺激和困惑。

第二种方式是成年人利用其更丰富的性体验来观察童年的经历，并赋予其创伤的含义，尽管当年他/她并没有这种感觉。

然而弗洛伊德的本意却是，在青春期之后童年的记忆被唤起，并产生了当时那个事件并没有产生的性觉醒。这种性动力，即利比多，并没有直接被体验为性欲，而是通过心理过程转换为焦虑。就其理论的这一点，弗洛伊德认为利比多被抑制，其正常的表达被阻断，从而导致利比多的转换，焦虑由此产生。这个时候，弗洛伊德还没有形成关于童年时期的性与孩子本身的性欲的理论。

弗洛伊德还将他的防卫理论用于强迫观念性神

经病和妄想型精神分裂症。^[15]这两种病例的症状体现了受到压抑的情感以转移和伪装的方式得以反弹。被压抑的可能是一种情感,也可能是一个念头或记忆。对于强迫性神经病来说,病人进行的强迫性行为本身具有防护的功能,它有助于病人继续压制被压抑的情感。

睡觉前的仪式

弗洛伊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强迫——强制性防卫病例:在这个例子中,一个11岁的男孩在睡觉前要做以下事情:他要一五一十地向母亲仔细叙说一天里发生的事情的所有细节,确认地毯上没有纸片或其他垃圾,他的床一定要顶着墙放,三张椅子要在床前摆好,枕头要摆放成某种特别的样子,他还必须踢几下脚,方才侧着身子睡下。

弗洛伊德解释说,几年前一个女佣曾经在床上对这个男孩进行了性虐待,后来更近的一个事件重新唤起了他的记忆,这个事件

……在男孩的意识中以一种强迫完成某种仪式的方式出现。^[16]



由此看来，这个男孩并非真的有意识地记得最初的那次性虐待，而是强迫性地完成那些仪式，以保护自己免于再次受到性虐待。他的睡前仪式包含如下意义：摆在床前的椅子是为了防止有人上床；枕头之所以要特别地放置是为了要与当初他被侵害时放置的方式相区别；踢脚是为了推开压在她身上的女佣；侧着身睡是采用不同于当时被侵害时的姿势；详细叙述白天发生的事情是对那个女佣禁止他泄露当天发生的事情的反抗；他非常在意地要保持卧室地板的清洁是因为他曾因此受过母亲的责备——这反映出他害怕母亲会因性行为而责备他。

妄想狂的案例

弗洛伊德还将压抑理论和压抑回复理论应用于一个患有严重的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的女性病例中。32岁的P女士已婚，并有一个两岁的孩子。当她生下自己的孩子六个月后患上了精神病，变得内向多疑，总是抱怨别人在跟她作对。随着病情的恶化，她开始相信自己被监视，而且人们可以知道她在想什么。有一天，她开始形成这样一个念头：有人偷看她脱衣服

了。后来,她开始在幻觉中看到裸体的女人。再往后,当她在别的女人面前,就会想象她们看到了她自己一丝不挂的样子。同时,她还幻听到别人在谈论她的行为。

弗洛伊德运用他的研究方法来探寻这些症状的根源。她发现幻视女人裸体的症状出现在她被介绍去一家水疗机构接受治疗之后,在那里,她看到了许多洗浴之中的裸体女人。P女士说她一想到裸体就十分羞愧。弗洛伊德解释说,羞愧经历必然与一次更早的、与羞愧并不相关的经历有密切联系。P女士回忆起八岁时的一些情境。当她裸体出现在家人或医生面前,感到十分羞愧。然而,更早的回忆却是:她六岁时曾在她的哥哥面前脱光衣服,而没有一丝羞耻感。那时,P女士和她的哥哥在上床睡觉前有相互裸露身体给对方看的习惯。因此弗洛伊德解释说,P女士突然想到脱衣服时被人监视的念头实际上是

一段未经改变的早先记忆的片断,其中包含着自责,而现在她正在对当时作为一个孩子而忽略的羞愧感进行补偿。^[17]

渐渐地,更为深入的一些细节浮出水面。P女士



跟她的哥哥之间存在性关系，而且这种性关系至少从六岁就已经开始，并一直持续到十岁。P女士透露，当她后来结婚后，对性产生了很大的反感情绪，并十分担心和她丈夫做爱时发出的声音被隔墙的邻居听到。弗洛伊德解释道，婚姻的开始唤醒了她潜意识中有关童年时候她和她的哥哥装扮成夫妇“过家家”的事情，正是这个事情导致了她的自责，而这种自责一直是被她压抑着的。幻听到的声音只不过是对于她性经历的自责被压抑以后的伪装形式。尽管就内容而言看上去并无大碍，但是却微妙地传达出责备的意思。就此而言，幻听实际上是压抑的力量和被压抑的东西的反弹力量之间折衷的产物。

弗洛伊德对P女士的抑郁反应和妄想症的发作原因进行了具体描述。她的抑郁症是在她的丈夫和哥哥发生争吵之后发生的，那次争吵之后，她的哥哥就不再跟他们来往了。此后发生的一次谈话使她觉得每个人都在蔑视她——“这种情况再清楚不过了”。那次在谈话中，她的嫂子说了这么一番话：“如果有那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将心平气和地对待它。”

从那以后,P女士将这番话当作对自己的某种谴责,尽管她并不清楚这算是哪门子谴责。她的结论是,她的嫂子说那些话时的语气让她这么觉得。弗洛伊德要求P女士回忆她嫂子在说那些话之前又说了些什么,P女士记起当时她的嫂子说她在自己父母家里跟兄弟们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她接着说:“每个家庭中都会发生那些不愿张扬的事情。但是如果那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将不以为然。”

弗洛伊德解释道,P女士将先前关于兄弟的话压抑下去了,因为这有可能重新唤起关于她和她哥哥之间性关系的记忆,于是她就紧紧抓住第二句话不放。她受到谴责的感觉,本来是和她与哥哥之间的性关系有关的,此时却转而跟“要不以为然地对待之”的那句话联系起来——这就是“转移替代”的例子。由于她嫂子的话在内容上并没有包含任何明显的责备,所以P女士认为她说话的语调是谴责的语调。弗洛伊德指出,这是一个妄想狂精神病人如何基于压抑而进行曲折解释(misinterpretation)的实例。



极度令人厌恶

弗洛伊德得出结论，癔病、强迫性神经病和妄想狂都有相似的根源。

上述每一种病症，其心理机制的核心都是压抑，而被压抑的东西就是童年时期的性经历。^[18]

弗洛伊德说，这 13 个病例都十分严重，童年时遭受的创伤都包含“严重的性虐待”，而其中的一些则是“极度令人厌恶”的。那些实施侵害者包括：

育婴女佣、女家庭教师 and 家仆，而我们却十分大意地将照顾孩子的责任托付给他们。更有甚者，令人遗憾的是，教师也是其中之一，而且出现频率还很高。^[19]

然而，其中七个例子中实施侵害者却是无可指责的孩子，通常是哥哥和年纪稍小的妹妹做性游戏。在一些例子中，男孩子在早先的时候被某个女性性虐待过，这个男孩子以后就可能依照自己被伤害时的情形对她的妹妹实施性侵害。

弗洛伊德描述了性虐待如何在一个家庭内部反

复出现。在一个案例中，哥哥、妹妹和一个表哥都患上了精神病。对哥哥的分析表明，他深受自责之苦的原因是他对妹妹的侵害导致了妹妹的病症，而他本身则被表哥侵害过，而这个表哥又被照顾他的女佣侵害过。



精神分析学诞生之地——帝国时代的维也纳



毫无疑问,以我们今天对催眠术所拥有的具有倾向性的知识,那种在记忆缺失处插入虚构的情节,而不是可信的记忆,这种方法并不可取。然而,弗洛伊德经过深思熟虑,清楚明白地描述了他所采用的方法和基本原理。弗洛伊德强调,他也承认病人对回忆有抵触情绪,但这不过是癔病具有的防卫性质的表现罢了——他认为,医师的职责恰恰就是克服这种抵触情绪。

癔病病因

The Aetiology of Hysteria



安娜·欧(Anna O,即贝尔莎·巴朋海姆),她的案例是《癔病研究》中最有名的一例,但这个例子恰恰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理论无关,阐释的是布洛伊尔的理论。

癔病病因

“癔病症状源于在潜意识中起作用的记忆”。^[20]

在防卫性神经精神病论文发表几个星期之后，弗洛伊德在给精神病学家和神经学者做的一次演讲的基础上，又写了另外一篇论文——《癔病病原学》(*The Aetiology of Hysteria*)。这篇论文基于并又重新确证了此前的观察和结论，但弗洛伊德以其向听众演说时所惯有的独特方式预言，将会有很多人反对他、批评他。

记忆之链

弗洛伊德首先介绍了一个研究发现，并将其归

功于早期的同事乔瑟夫·布洛依尔：

癔病的症状取决于病人的某种经历，通常这种经历以创伤的形式起作用，并在病人的心理历程中以象征性符号的形式重新展现。^[21]

接着他论证道：要想把一个癔病的症状追溯到某个受到伤害的情境，这个情境必须具备如下两个特点：它必须适于充当决定性的因素，也就是说其内容与癔病症状的内容具有关联性；另外，它必须具有足够的伤害力量。

弗洛伊德进一步解释，通常发掘出来的那个最初受到伤害的情境看上去并不拥有上述两个特征。这就意味着分析工作必须更加深入，沿着联想的线索，去发现隐藏在第一个受伤害情境背后的第二个受创伤情境。他总结道，事实上癔病的症状从来都不由单个的事实经历造成，而是更早伤害经历的记忆被再次激活的结果。

弗洛伊德描述了连接各种症状的复杂的记忆之链。他将其比作家族的谱系树，家族成员之间相互通婚。然而，他提出了自己明确的结论：



不论我们将哪一个案例或症状作为出发点，最终我们都会绝对无误地追溯到性经验的领域。^[22]

弗洛伊德论证道：尽管后来发生的情境与性的联系很不相同，然而早先的受创伤经历总涉及孩子身体受到的性侵害。他声称：

如果我们坚持将分析深入童年早期，尽可能地达到人的记忆所能达到的最深处，我们会无一例外地使病人重新回忆起过去的经历。这种经历，无论就其特征而言抑或就其与后来的病症的关系而言，必须将其视为我们所寻找的精神病症的病原。这些婴儿期经历的内容同样是性方面的，但这些经历比我们早先发现的青春期的情境更具统一的类型。^[23]

排斥情境

预见到听众可能出现的厌恶和排斥的感觉，弗洛伊德率先谈出了自己对这种说法的厌恶和排斥，他说：

这些有关婴儿期性情境的观念对于那些在

性的方面正常的人来说,感情上实在难以接受。这些情境包括了所有性无能、性倒错的人所熟悉的虐待方式,比如他们采用了口交和肛交的方式。^[24]

弗洛伊德接着解释,一旦考虑到那些准备通过孩子来满足其性欲的人并不过于在意其性欲得到满足的方式这个事实,那种性行为的不正当性也就变得可以理解了。弗洛伊德认为性无能的人由于不能与异性成人正常性交,所以才采取那些性行为方式。就这一方面而言,他认为这些人就如同那些被虐待的孩子,在性方面同样是无能的。有趣的是,在弗洛伊德时代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口交被认为是放荡的。

弗洛伊德对性虐待会产生长期后果这一事实的理解与现今的认识是一致的。例如,关于孩子和施虐者之间不平衡的权力关系以及权威角色的扭曲,他写下了如下具有洞见的评论:

在所有并不匹配的性爱关系里,一方面是成人,在性关系中他们摆脱不了一种必然被赋予的相互依赖关系,然而他们却有绝对的权威和进行惩罚的权力。为了满足放荡不羁的情欲,



他们能够在各种角色之间转换。另一方面是孩子，他们无助地任由专横施暴者的意志摆布，他们过早地被刺激得容易兴奋和敏感起来，于是也就不得不过早地面对各种失望。他们所承受的、施加于其上的性活动，经常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自然需求尚控制不好而被打断——所有这一切奇异的和悲剧性的不和谐，揭示出他们后来具有形成精神病症的潜在可能，它们所具有的数不胜数的持久影响，都值得我们尽可能细致地去探寻根源。^[25]

性情境是真实的吗？

弗洛伊德描述了他所得出的结论的证据。他说，他所研究的 18 个“防卫性神经衰弱症”病例，都反映出了其病症的原因。“对每一个病例，都花费了近百个小时，有的甚至更多。”^[26]因此，弗洛伊德的结论不能被当作是“空想的结果”。^[27]

弗洛伊德还向听众介绍了关于“婴儿期性情境的真实性”的证据。事实上，他对这些情境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疑问高度警觉。预见到他的听众可能持

有的怀疑态度，他列举了一些因素来证明他的结论是可信的。

首先，弗洛伊德注意到不同病人的叙述中都有些共同的细节，而且他们事先并没有相互交谈过，因此既不存在群体压力，也不存在任何强调恢复受虐记忆的文化背景。

其次，病人们将那些自己并不认为重要的事件或轻描淡写的细节都描述为无害的，而这些事件或细节

只有那些在其生活中有过体验的人才会理解，才会体会到其真实性的微妙之处。^[28]

此外，性情境和所有病例史之间的关联也支持他结论的真实性。弗洛伊德拿七巧板游戏做类比——只有一块最合适填补空缺。然而，弗洛伊德认为还有另外一个证据，而且是“真正牢不可破的证据”——即另外一个人提供的证据证实被分析者材料的真实性。而这一点恰恰是今天持“虚假记忆理论”观点的那些人所要求的证明标准。

举例来说：有两个孩子曾经发生过童年性关系，后来其中一个孩子证实了另外一个孩子关于此事的



记忆。弗洛伊德说,在他研究的 18 个案例中,有两个就得到了这样的证实。

在一个案例中,哥哥证实了童年时期曾和他的妹妹有过性关系。另一个案例中,两个女性都曾经和同一个男人有过童年性关系,而且三个人曾一起有过性关系。这两个女人都有相同的症状,弗洛伊德认为其根源就在于那些童年事件。

童年性经历,如对性器官的直接刺激和“类似性交的活动”,是一种根本性的伤害,这种经历会在青春期期间或之后被某种伤害重新唤起,进而导致癔病的症状。弗洛伊德预见到,针对他的这种结论,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对意见。

一种意见是,儿童性虐待的例子非常罕见,根本不能被当作癔病这类如此常见的病症的决定性因素。

另外一种意见恰恰相反,认为童年性虐待的经历如此普遍,因此不具有病原学的价值,特别是不少人都有过童年受到过性虐待的经历,但并没有患上癔病,这样的例子并不难找到。

对于第一种反对意见,弗洛伊德论证道,儿童经常遭受性侵害,这要比一般人知道的多。他援引儿科

医师发表的报告，要人们注意护士和育婴医师对婴儿频繁的性侵扰。

根据实施儿童性侵害的主体，弗洛伊德将他研究的 18 个病例分为三组。第一组是成年陌生人。第二组是照顾孩子的成年人，例如托儿所的女教师、女家庭教师，有时则非常令人遗憾，是“很亲近的家人”。他们将孩子置于性关系中长达若干年。第三组中性关系发生在孩子之间，多数情况下在哥哥与妹妹之间，这种关系甚至延续到青春期以后。

弗洛伊德补充道，在很多案例中，两种或更多的病原共同起作用。他接着说：

在一些病例中，他们的性经历来自不同方面，这确实令人惊讶。^[29]

然而，弗洛伊德评论道，只有当人们充分意识到那些孩子的父母亲深受严重的精神疾病之苦，甚至威胁正常的生活，这些令人惊讶的发现才会更为理解。^[30]

弗洛伊德进一步给出了一个有趣的观察报告，在两个孩子之间曾有过性关系，而主动实施这一行为的男孩以前曾被一个成年女性引诱过，因此这个



男孩才对小女孩重复当时那个成年女性对他所做的事情。

弗洛伊德转而讨论第二种可能的反对意见。第二种意见反对弗洛伊德有关童年时期的性虐待作用的假设，他们说，童年的性虐待极为普遍，并非所有有过这种经历的人都患上了癔病。弗洛伊德论证说，即使许多有过性虐待经历的人没有患上癔病，但只要那些确实患了癔病的人都经历过类似的伤害，就足以说明第二种意见对他的理论假设并不构成反驳。他以天花病作类比：并不是所有接触过天花病人的人都会得天花，但是受到天花病人传染是我们知道的唯一致病原因。他进一步指出，有关童年性创伤的病原学意义的假设，并不仅仅根源于某种伤害曾经在患病孩子身上发生过这个事实，而是根源于虐待发生的情境和癔病症状之间的相关性和逻辑关系。

性侵害情境可能是虚假记忆吗？

弗洛伊德高度警惕另一种假设，即有关儿童性虐待的记忆是被某些权威的医师及顺从听话的病人

共同唤醒的虚假的记忆。弗洛伊德很巧妙地反问道：

要么是医生将这种情境强加给他那些顺从的病人，并宣称这都是病人的记忆；要么就是病人们将他们精心编造或想象出来的事情告诉医生，而医生们又信以为真。这岂不都极有可能吗？^[31]

弗洛伊德对此提出了一些针锋相对的论据：首先，在对病人进行分析之前，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有关童年受到伤害的记忆，这些记忆只是在“治疗的强大压迫”^[32]下才被唤起。在追忆中，病人们承受了痛苦和“剧烈的情感”以及羞耻感。而且，即便是在很真实地重新体验了那些情境之后，他们仍然拒绝承认其真实性。弗洛伊德问道，

不论病人们出于何种动机，如果那些情境本来就是他们自己想象出来的，他们何苦要断然向我宣称他们对此并不相信？^[33]

有种怀疑是：病人是在弗洛伊德的影响下想象出那些情境，并在暗示的影响下，病人相信那些情境就是他们的记忆。弗洛伊德承认上述怀疑不太容易反驳，但这些怀疑仍然站不住脚。他说，



我从来没有成功地强迫病人接受过一种我期待发现的情境，并且让病人好像真的亲身经历了这一切，而随之而产生的感情也非常恰如其分。^[34]

在这篇论文中弗洛伊德没有详细说明那种促使病人回忆起潜意识中的记忆的方法。他指出这些记忆并没有自由地显露出来，而且被唤起时要克服病人的抵抗。但在弗洛伊德与布洛依尔合著的书中，有一部分是弗洛伊德单独写的，在那里他描述了这种方法。他说他刚开始的时候与当时的癡病治疗师一样，首先对病人催眠，然后进行探究，但是发现这种方法并不是对所有的病人都有效。

于是，弗洛伊德发明了一种方法，即要求病人聚精会神地回忆癡病的第一次症状是如何出现的，然后再沿着线索继续向前追溯联想。同时辅之以一些技巧，比如告诉病人当被按住额头的时候，他们就会回忆起一些事情。通过这种方法以及其他有关手段，弗洛伊德努力帮助病人们放弃意识中的各种意志，让那些没有料想到的突然出现的念头、想象和记忆呈现出来。弗洛伊德注意到，那些至关重要的致病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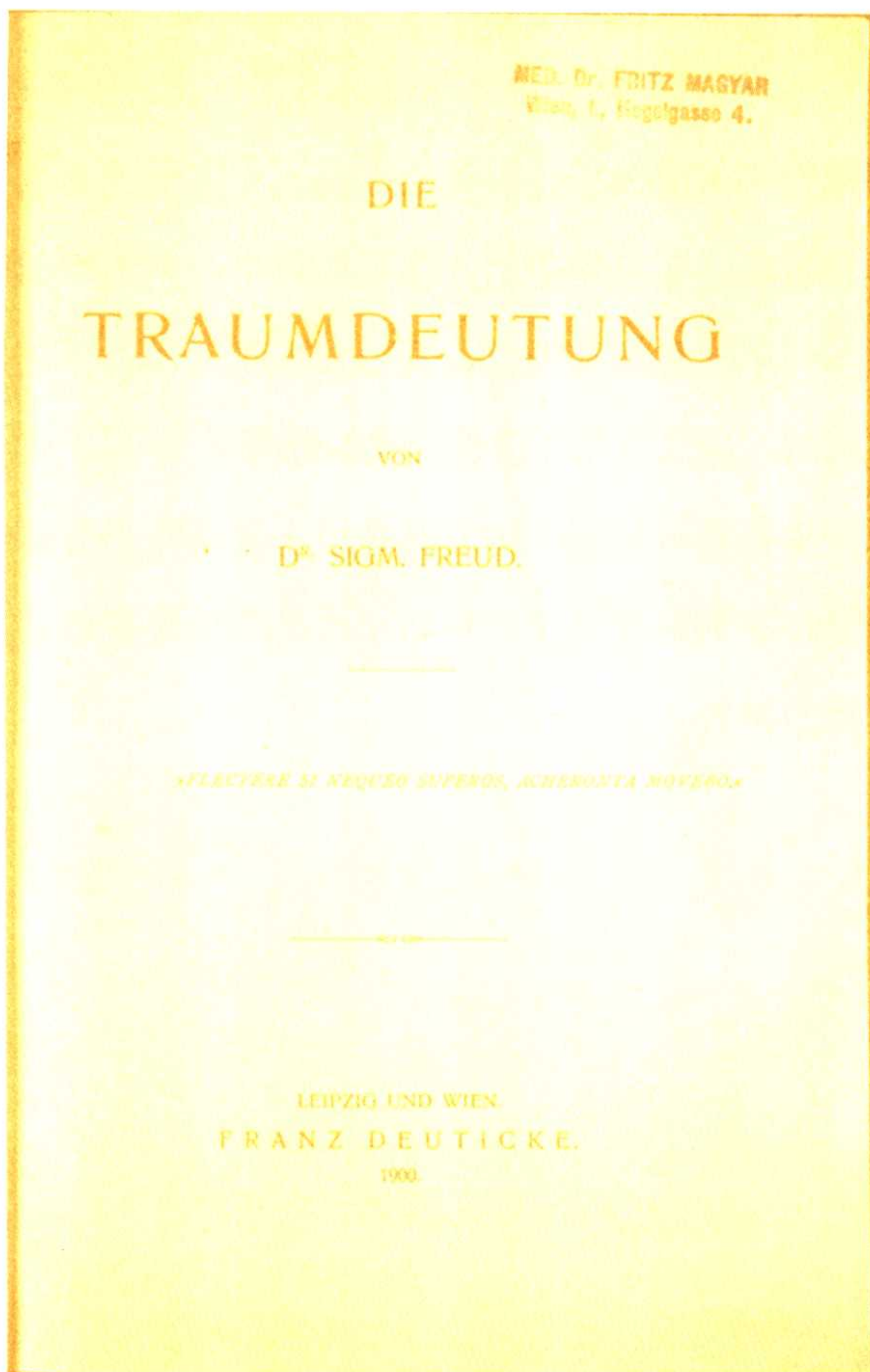
忆清楚而又轻易呈现出来的机会非常罕见。相反，通常所发现的只不过是联想与联想之间的中间环节——并且这些环节本身往往是断裂和破碎的。

在分析过程中，如果从后一个阶段往回看，我们经常会惊异于那些通过逼迫的过程从病人身上分离出来的念头和情境出现的时候是何等残缺不全。^[35]

这大概就是弗洛伊德在写《癔病病原学》时所使用的方法了。毫无疑问，以我们今天对催眠术所拥有的具有倾向性的知识，那种在记忆缺失处插入虚构的情节，而不是可信的记忆，这种方法并不可取。然而，弗洛伊德经过深思熟虑，清楚明白地描述了他所采用的方法和基本原理。弗洛伊德强调，他也承认病人对回忆有抵触情绪，但这不过是癔病具有的防卫性质的表现罢了——他认为，医师的职责恰恰就是克服这种抵触情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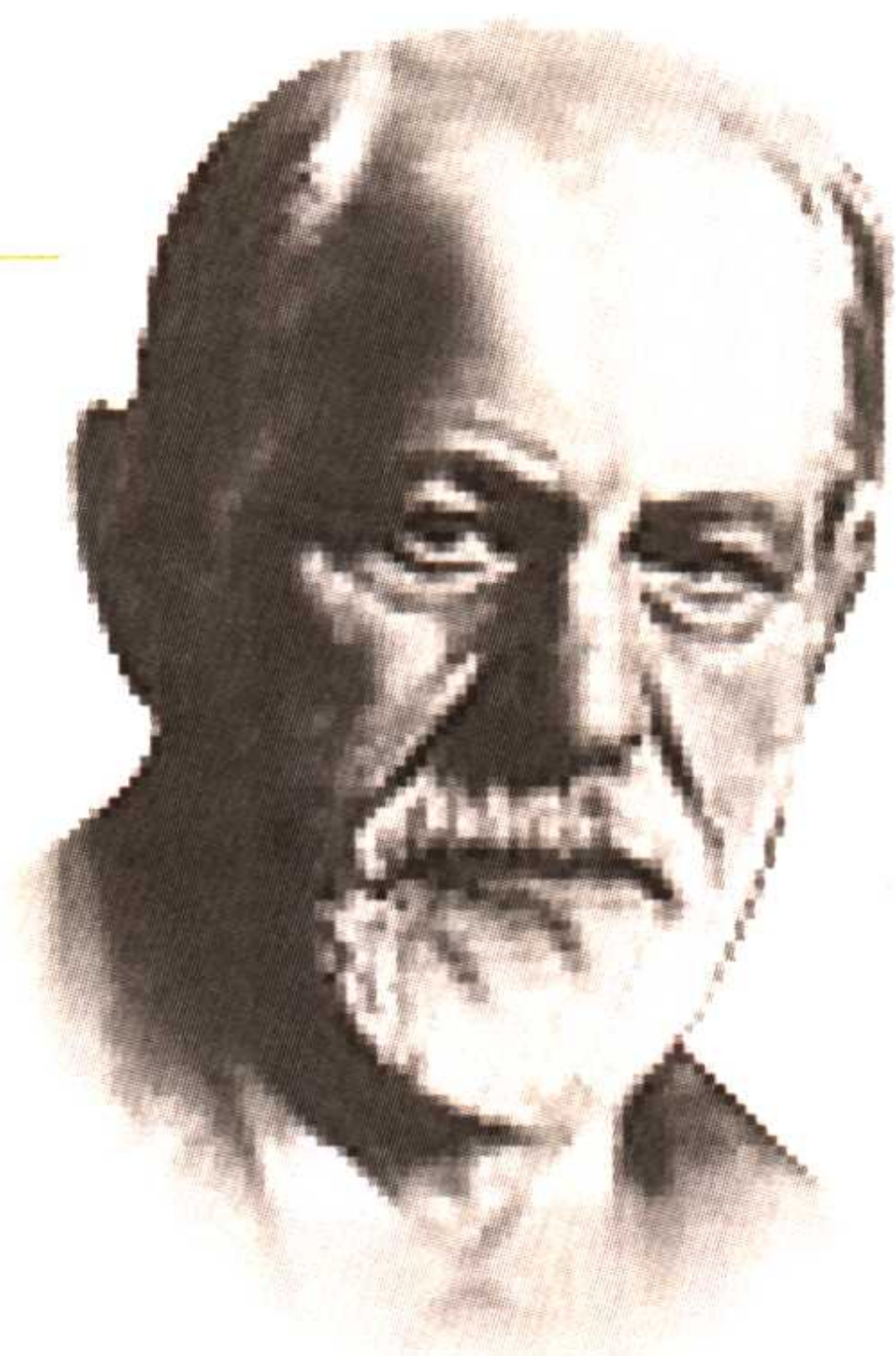
与当今观点的一致性

《癔病病原学》是一篇非凡的论文，睿智而富有洞见，却带有根本性的缺陷。在写这篇论文的时候，



《梦的解析》(1900)书影

弗洛伊德还没有足够地重视记忆的转换、误导和游移,以及常与幻想一道虚构故事的特性。但他关于儿童时期受到性虐待的普遍性、童年性侵害所产生的深远病理学影响、受虐者与施虐者同一化的现象(也即被伤害者变成了施虐者),以及成年人受到的创伤具有重新唤起早期受到的伤害而产生心理影响的作用等问题的理解和把握,都令人惊叹地和百年之后我们的一些观点相当接近。他的思想在 20 世纪大半时间里都没有得到认可,这是因为接受儿童性虐待普遍存在的事实以及对性创伤后果的逐步理解都是最近的事情。



如果在分析中呈现出的那些儿童时期的经历总是真实的,那么我们会觉得立足于一个坚实的基础之上;如果它们经常是虚幻的或显示出是臆造出来的,是病人的幻想,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抛弃这种不可靠的基础,而去求助其他的可能。但是上述两种情况都并非事实,情况可能是:在分析中构建或回忆起的那些儿童时期的经历有时可能是虚假的,有时又可能确实是真实的,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则同时包含着真实和虚构。

弗洛伊德对“性引诱理论”的否弃

Freud's Abandonment of the "Seduction Theory"



癡病患者

弗洛伊德对“性引 诱理论”的否弃

尽管弗洛伊德后来确实放弃了癔病的病原是性虐待这一基本理论,但是他没有完全放弃“儿童时期受到的性虐待是普遍的,并会产生一定后果”的认识。例如,1924年他在《癔病病原学》中加了一个脚注,并将其与他所描述的癔病患者克服抵触情绪、回忆起被伤害感觉的过程联系起来。他写道,

所有这些都是真的;但是要记住的是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没有从对真实性的过高评价和对幻想的过低评价中解脱出来。^[36]

弗洛伊德后来的立场在另外一个脚注中得到进一步详细阐释,这个脚注也是于1924年补充到《防卫性神经精神病评述》(*Further Remarks on the Neu-*

ropsychoses of Defence)一文中的：

这一部分主要是讨论一个我以前犯过的一个错误。对于这一错误，我曾经多次承认并加以纠正过。在那个时候我还不能将我的病人童年时期的幻想和他们的真实记忆区别开来。结果是，我将性引诱当作重要的和普遍的病原，而事实上它并不具有这样的重要性和普遍性。一旦这种错误被克服，就能够对《性学三论》(1905年)中描述的有关儿童性欲的自发性有所洞察。然而我们也没有必要完全否定我在上述文本中所写的内容。性引诱具有某种病原学的重要性，即便是在今天，我仍然认为那些心理学论点仍然非常中肯。^[37]

这个评价看上去相当公允，大多数从事心理分析的人也会认同这一点。对儿童的性引诱或性虐待在某些心理问题的发生上起着一定的作用，但是它却不具备本质和普遍的病原学意义。此外，儿童的幻想还可能被误认为真实的回忆。

弗洛伊德在《论心理分析运动史》(*On the History of the Psychoanalytical Movement*)这篇论文中(1914年)



再次谈到了他的“错误认识”。他指出,这个错误“对于新兴的科学而言有可能是致命的”。他解释道,通过分析可以从当前的症状回溯到过去某个事件,但他也犯了一个错误:他倾向于将最终出现的性引诱的情境接受为真实的、确实出现的,特别是当时他还没有发展出有关童年性欲的理论。弗洛伊德进一步指出,“迫于其自身的不可能以及在确定无疑环境下的自相矛盾”,有时他觉得必须放弃这种病原学假设,为此他觉得“茫然无助”,甚至会“很乐意放弃整个工作”,因为“坚实的现实基础已经消失了”。^[38]

然而,绝望之后,弗洛伊德认识到如果他的期望是错误的,那么他就必须修正它们,而这将会带来新的洞见。

如果癔病课题将其症状回溯到某些虚构出来的创伤,那么一个新的事实就出现了:这些虚构的创伤恰恰是在想象中制造出了这种情境。于是,伴随现实的真实性和心理上的真实性也需要加以考虑。^[39]

因此,弗洛伊德的理论开始走向童年性欲理论、俄狄浦斯情结、幻想的普遍作用、心理的真实性和精

神生活中的自我欺骗。

近期的一些评论家认为弗洛伊德不诚实地歪曲了他思想变化的真实情况。^[40]他们说,弗洛伊德首先强迫他的病人们编造出儿童性虐待的虚假情境,事实上那些情境是他自己的发明。接着,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他又宣称他的病人们是自发地将他们的性情境告诉他的。这样,他就得出了有关儿童的性观念以及俄狄浦斯情结的思想。

那些评论者进一步指出,弗洛伊德最初宣称那些性虐待者是育婴女佣、女家庭教师等,但后来又宣称他的大多数病人说被他们的父亲伤害——这种说法恰恰有利于解释他如何发现孩子在幻想中对其父亲或母亲产生迷恋的俄狄浦斯情结。

上述各种意见都没有多少实质意义。弗洛伊德在其文本以及后期注解中对这些问题都有解释。弗洛伊德从容地承认,在其早期的论文中,他低调处理了父亲所扮演的性引诱角色,因为这种念头令读者极为不安(对弗洛伊德自己可能也是如此)。弗洛伊德对于性虐待的重要性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这可以被作为一个更为广泛和一致的模式的一部分,而弗



洛伊德正是借此按照后期深入的临床实验和思想，不断修正自己的见解。

尽管他放弃了癔病的“引诱理论”，弗洛伊德仍不时继续援引童年性虐待在一些病例中的病原学作用。例如，在《摩西和一神教》中，他讨论了心理创伤的一般后果，并顺便发表了评论：

一个在儿童时期曾经被性引诱过的女孩可能在其后来的性生活中经常挑起类似的攻击。^[41]

在另外一篇发表于1940年的论文中(《自我的分裂》)，弗洛伊德给出了一个临床病例：一个男孩子相信被阉割的威胁真的存在。他解释道，这个三岁的男孩子“在被一个年纪稍大的女孩子性引诱的过程中，熟悉了女性的性器官”，并且在后来“热衷于通过手淫持续这种性刺激”，这又导致他的“精力充沛的保姆”威胁要阉割了他。^[42]

弗洛伊德给出这个例子的原因在于要说明这个男孩以前看到过女性的性器官，知道她们没有阴茎，再加上被阉割的威胁，就会使得这个孩子确信被阉割的威胁是真实的。然而，这个观点的有趣之处在于

童年性虐待的观念几乎是在不经意中被编织到这个阐释之中。

真实和虚构

弗洛伊德继而认为记忆包含着真实和虚构，在下面这段文字中明确有力地指出，真实和虚构之间的张力是与生俱来的，很难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加以解决：

如果在分析中呈现出的那些儿童时期的经历总是真实的，那么我们会觉得立足于一个坚实的基础之上；如果它们经常是虚幻的或显示出是臆造出来的，是病人的幻想，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抛弃这种不可靠的基础，而去求助其他的可能。但是上述两种情况都并非事实，情况可能是：在分析中构建或回忆起的那些儿童时期的经历有时可能是虚假的，有时又可能确实是真实的，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则同时包含着真实和虚构。^[43]



性虐待是“很常见的”

弗洛伊德在其最后一篇总结他的个人观点的论文中也指出童年性虐待的重要性。这篇题为《心理分析概述》(An Outline of Psycho-Analysis) 的论文发表于 1940 年,其中他评价某些经历的影响。这些经历虽然不是普遍的,却是“很常见的”,它们包括:

儿童受到成年人的性虐待,或是受到其他年纪稍长的孩子的性引诱(哥哥或姐姐),以及,也许我们预料不到,这些孩子因为看到或听到成年人(他们的父母亲)之间性行为的时候会被深深地刺激,因为我们通常不会想到,他们那时候不会关心、理解,或者今后也不会记起这些行为。^[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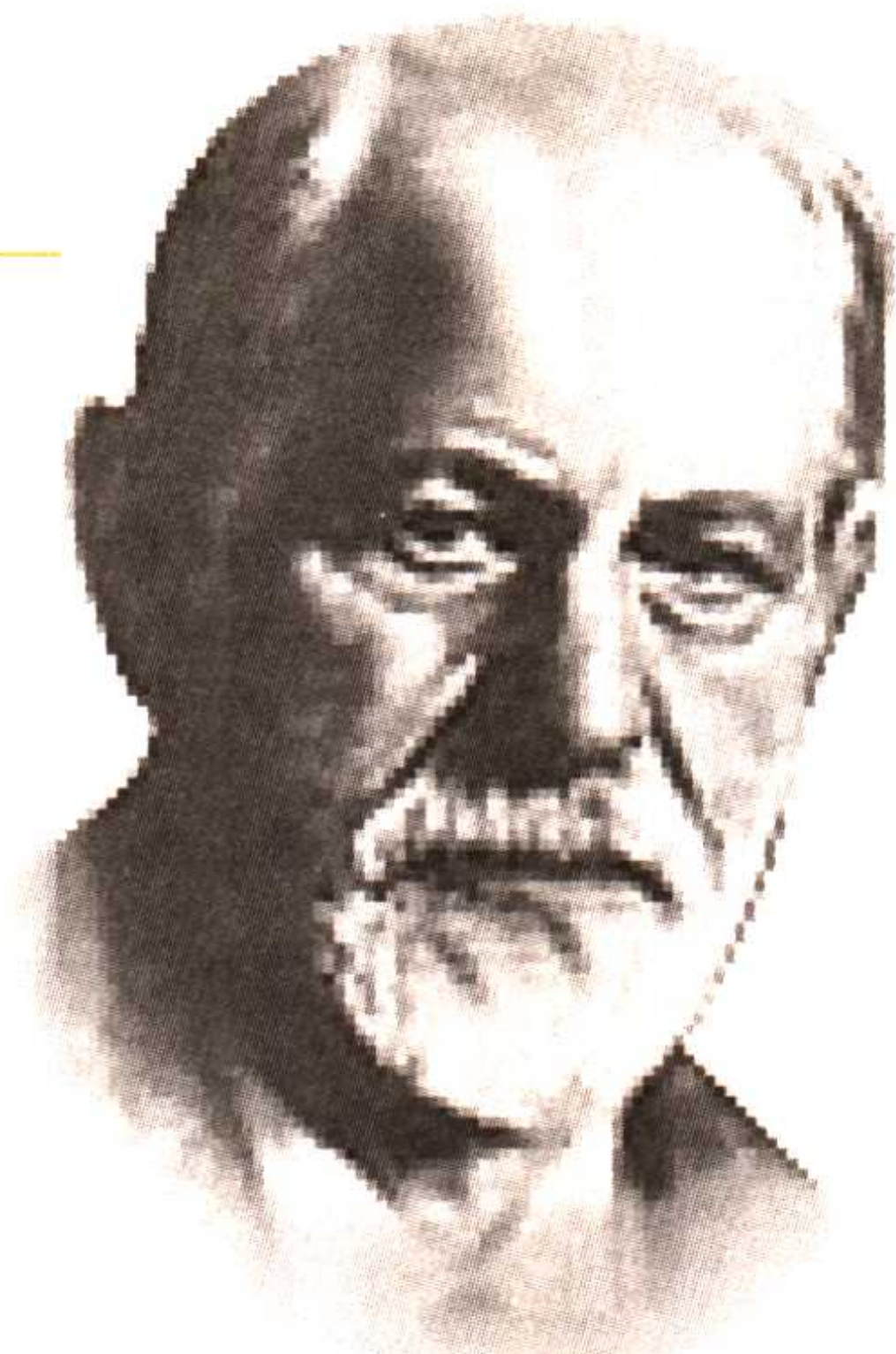
弗洛伊德说,这种经历

引发了儿童的敏感性,并且迫使孩子自己的性欲求进入某种今后他无法摆脱的渠道中。^[45]

弗洛伊德进一步指出,当这种早期伤害性的过度刺激的印象试图作为记忆反弹的时候,就会被压抑下去,从而导致“神经质的强迫症”,进而使自我对

性功能失去控制,结果要么是性压抑,要么是性变态。

当弗洛伊德接着对俄狄浦斯情结倾注更为大量关注的时候,只是附带地做出了上述有关儿童时期性虐待的简洁评论。然而,这样的评论出现在这篇晚期论文中说明,尽管有马森(Masson)的批评(1984),弗洛伊德还是在有些案例中依然坚定地相信性虐待的真实性及其可怕的发展后果。



因此弗洛伊德认为，童年记忆并不是表面上显示的那样——主观的回忆感受并不意味着记忆就是真实的。记忆就像梦一样，或者像虚构的小说，在心理冲突的基础上构建起来，起着实现愿望和自我欺骗的目的。记忆将来自不同源头的因素合并起来，并不考虑其事实和现实。弗洛伊德暗示，儿童的真实记忆也许根本无法获得，我们表面的记忆可能是后来臆造出来的。

弗洛伊德关于记忆的观点

Freud's View on Memory



弗洛伊德进行精神分析治疗用的沙发床

弗洛伊德关于 记忆的观点

有时人们宣称弗洛伊德认为一个人一生中发生的事件都被精确地储存在大脑中的某个地方，就像一部持续拍摄的录像机一样，只要这些记忆可以从被压抑的状态中释放出来，就能够被触及。有没有证据证明弗洛伊德这种观点呢？

梦中的记忆

《梦的解析》(出版于1900年，但主要部分在1896年前就完成了)可能是弗洛伊德最著名的著作，在那里他讨论了梦是如何利用记忆的。他评论道：

我相信，任何关注梦的人都会发现这样一

个常见的现象：梦可能提供某种知识和记忆的证据，而在清醒的状态下，做梦的人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拥有这种知识和记忆。^[46]

对此弗洛伊德提供了许多例子。他自己在梦中曾看到一个他认识的医生，这个医生住在他出生的小镇上，他的面容并不清楚，而且与他上中学时的一个老师相混淆。问过母亲以后，弗洛伊德才明白他小时候的确有这样一位医生，只有一只眼睛，而那个中学校长恰好也只有一只眼睛。是他的梦将这两者联系到了一起。弗洛伊德已经有 38 年没有见过这位医生了，因此在意识里对他并没有记忆。

然而弗洛伊德强调，尽管梦利用了从记忆中得到的各种原材料，并给人以所有那些最初记在心中的各种经历原则上都可以被回忆起来的印象，然而梦再现出来的却经常是一些残片，要么就是将一些经历的细节与另外一些经历的细节混合，全然不顾外在的真实性。

在这里弗洛伊德对梦的观察揭示出一个重要的问题。一生中从经历中产生的各种印象可能以某种方式储存在大脑中，并且为梦所利用。然而这并不意



意味着在意识中可以连贯而又准确地恢复起这些记忆。就整体而言,梦并不是复制,而是凌乱地拼凑。对弗洛伊德而言,梦就是对于愿望实现的一种伪装表达,由于内在冲突而引发的扭曲——“一种内在的不诚实”。^[47]

如果梦是对真实性的一种否定形式,从各种经历和印象中杂乱地获取材料,那么它就很难被当作发现某种历史真实性的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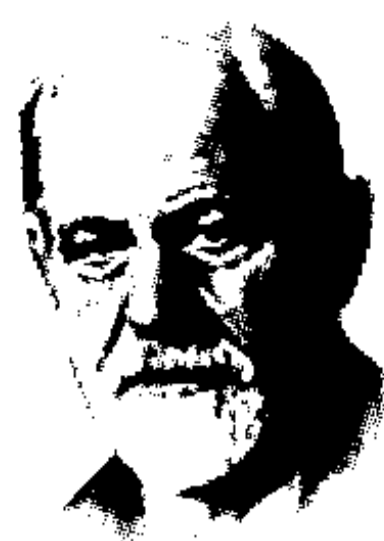
当弗洛伊德阐述记忆,特别是有关很久以前的某些事件的记忆如何可能被建构成梦的样子时,其令人惊奇的暗示就得到进一步推进。在发表于1899年的《屏蔽记忆》(*Screen Memories*)这篇论文中(这篇论文可能写于《梦的解析》之后),他就进行了这样的论述。

屏蔽记忆

弗洛伊德在这篇论文的开头指出,尽管早年产生的各种印象“在我们内心深处形成了不可磨灭的痕迹”,^[48]但是我们却不能在清醒的记忆中直接进入它们。而且,经常是在六七岁,抑或更晚一些,我们才

能记得我们的生活是各种相互联结的事件。他提出了“屏蔽记忆”的概念。也就是说,某种记忆表面上虽然没有多少情绪上的意义,但实际上替换了一个与之具有联想关系的更令人苦恼的记忆。这种记忆部分地被转换机制所决定,这个机制是弗洛伊德在对梦的研究中偶然发现的。

弗洛伊德举了一个关于记忆的例子,这个例子是一个38岁男人描述的(这个例子普遍被认为是自述性的)。叙述者声称看到了一个矩形的草坡,草长得又绿又厚,上面开着黄色的花,还有蒲公英。一个乡间小屋在草坡的一头,屋前有两个女人正在聊天,一个是孩子的保姆,一个是农妇。三个孩子在草地上玩耍。其中一个就是叙述者,有两三岁的样子。另两个孩子一个是比他大一岁的表哥,另一个是他表哥的妹妹,和叙述者同岁。这些孩子采摘黄色的花,每人都拿着一束。两个男孩子压在小女孩身上,抢她手中的花。小女孩哭着跑开了,农妇模样的人则给了她一大块面包。叙述者和他的表哥扔掉了黄色的花,急忙跑到小屋中也去要面包。农妇用一把长刀子将面包切开,给了每人一块。面包吃起来很



弗洛伊德关于记忆的观点

香甜。

这个关于记忆的描述确实有梦的特性，弗洛伊德采用了与对梦的解析相同的方法，探究各种细节的关联，并最终用被压抑的愿望和想象来解释它们。弗洛伊德对于这个梦的探究写得很长，然而其意义在叙述者的回忆中显露出来。叙述者记起 17 岁时爱上了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穿着鲜艳的黄色衣服，这就与花的黄颜色联系起来。这个女孩子家里很富有，住在乡下。最初这个叙述者也住在附近，旁边是美丽的森林。但后来他父亲破产了，被迫搬到镇上，过着相对贫困的生活。与那个穿着黄色衣服的女孩子相遇三年之后，也就是他 20 岁的时候，他拜访了他的姨父和另外两个曾出现在记忆中的童年伙伴。他的父亲和姨父提出一个计划，要他放弃深奥的学术研究，从事更为实际的职业，并娶他的表妹（即那个拿着黄花的小女孩）为妻，定居在他姨父住的地方。叙述者并没有接受这个计划，因为他更倾向继续他所选择的学术研究。

弗洛伊德对这个记忆的解释如下。叙述者想象，如果按照他父亲和姨父计划的道路，他将过上舒适

的生活。但他没有娶他的表妹为妻(正如父亲和姨父计划的),而是与那个穿黄色衣服的女孩结了婚。香甜的面包代表的就是这样一种愉快生活。从女孩手中拿走花代表“糟蹋”她,这种行为和最初遇到这个女孩子时的害羞态度形成了鲜明反差。扔掉花束代表这样一种意愿,即抛弃他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按照父亲的意愿过那种有“面包加黄油”的生活。这种充满期望幻想的记忆恰恰出现在这个叙述者为了糊口而苦苦挣扎的时期。

对于这种解释,叙述者评论道:

关于我将会过着何种舒适的个人生活有两种想象,看来我把它们弄混了。一种生活是‘黄色’和‘农家面包’所代表的生活,另一种则是扔掉花朵和相关的那些人。

弗洛伊德回答道,

是的,你将两种想象相互投射,并制造出一种童年的记忆……,我可以向你保证,人们经常在潜意识中制造出这样的事情,就像写小说一样。^[49]

因此,弗洛伊德推定,记忆是叙述者在当下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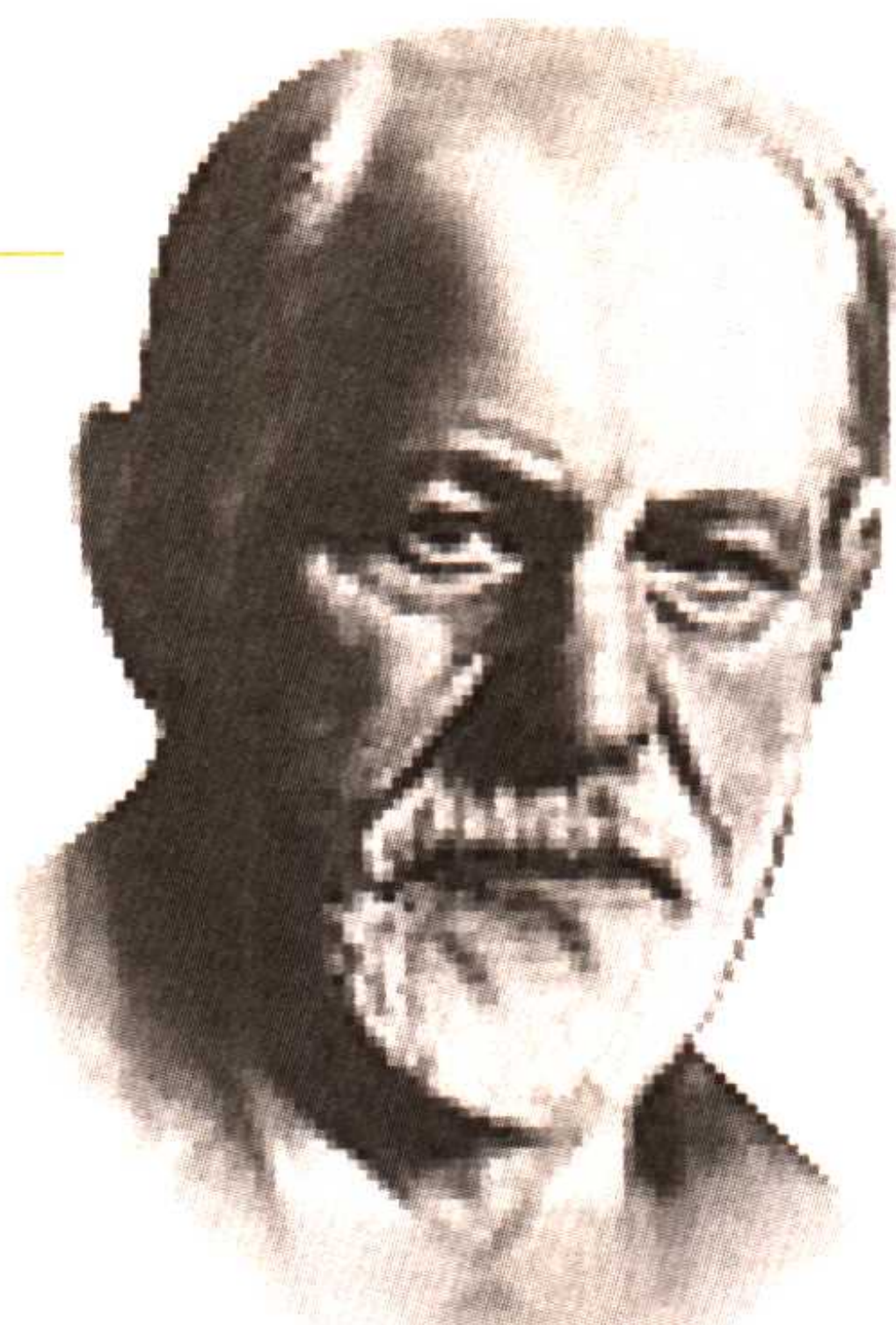
的各种困难的驱使下，由充满期待的幻想构建起来的，就像梦一样，通过隐喻和双关将来自不同源头的因素浓缩起来。这不仅意味着明显的记忆是欺骗性的，本质上就像是做梦，而且还意味着记忆的形成可能是对于当下各种困难的回应。

弗洛伊德总结道，屏蔽记忆和其他来自童年的记忆之间的区别可能并不明显，他作出了如下惊人的陈述：

我们到底有没有来自童年的记忆，这确实值得质疑：我们所拥有的也许只有那些与我们童年有关的记忆。我们的童年记忆所显示的早年生活并非以它们原本的形式呈现，而是显示后来记忆被唤起时感觉应该是那个样子的生活。在不考虑历史的准确性的前提下，做梦人的某些动机会影响到记忆的形成，而且还会影响到对记忆本身的选择。^[50]

因此弗洛伊德认为，童年记忆并不是表面上显示的那样——主观的回忆感受并不意味着记忆就是真实的。记忆就像梦一样，或者像虚构的小说，在心理冲突的基础上构建起来，起着实现愿望和自我欺

骗的目的。记忆将来自不同源头的因素合并起来,并不考虑其事实和现实。弗洛伊德暗示,儿童的真实记忆也许根本无法获得,我们表面的记忆可能是后来臆造出来的。



这种“心理对象”并不能被直接观察到，它永远不能被外部观察者所证实，但能够通过病人与精神分析学家合作，在对过去精神生活的残余如何持续侵入当下生活的理解中得到评价。通过问诊室内病人表白得出的线索，就可以推断出心理对象的存在。弗洛伊德描写的不是外在的事件，而是内在事件的重建，这在本质上是内省和移情的产物。

弗洛伊德论心理分析 中的重构

Freud on Reconstruction in Psychoanalysis



弗洛伊德和女儿安娜 1913 年在意大利度假。

弗洛伊德论心理 分析中的重构

弗洛伊德认为重构的过程就是分析者在病人自由联想和问诊室里的行为所提供的线索的基础上，通过推理建立起病人早期成长的一幅图景。他的这种评论有些也充当了下述观点的一种可能的根据，即，早期事件保存在记忆中，对于它的呈现就像是放电影一样，如果方法得当，就可以在意识中回忆起来。例如，在他的《分析中的建构》(*Construction in Analysis* 1937)一文中，弗洛伊德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考古学隐喻，他认为分析学家和考古学家都试图根据一切可以获得的线索重建早期结构的图景。然而心理分析学家是在更有利的条件下工作的，因为考古学家所处理的对象有可能遗失或受到损毁，而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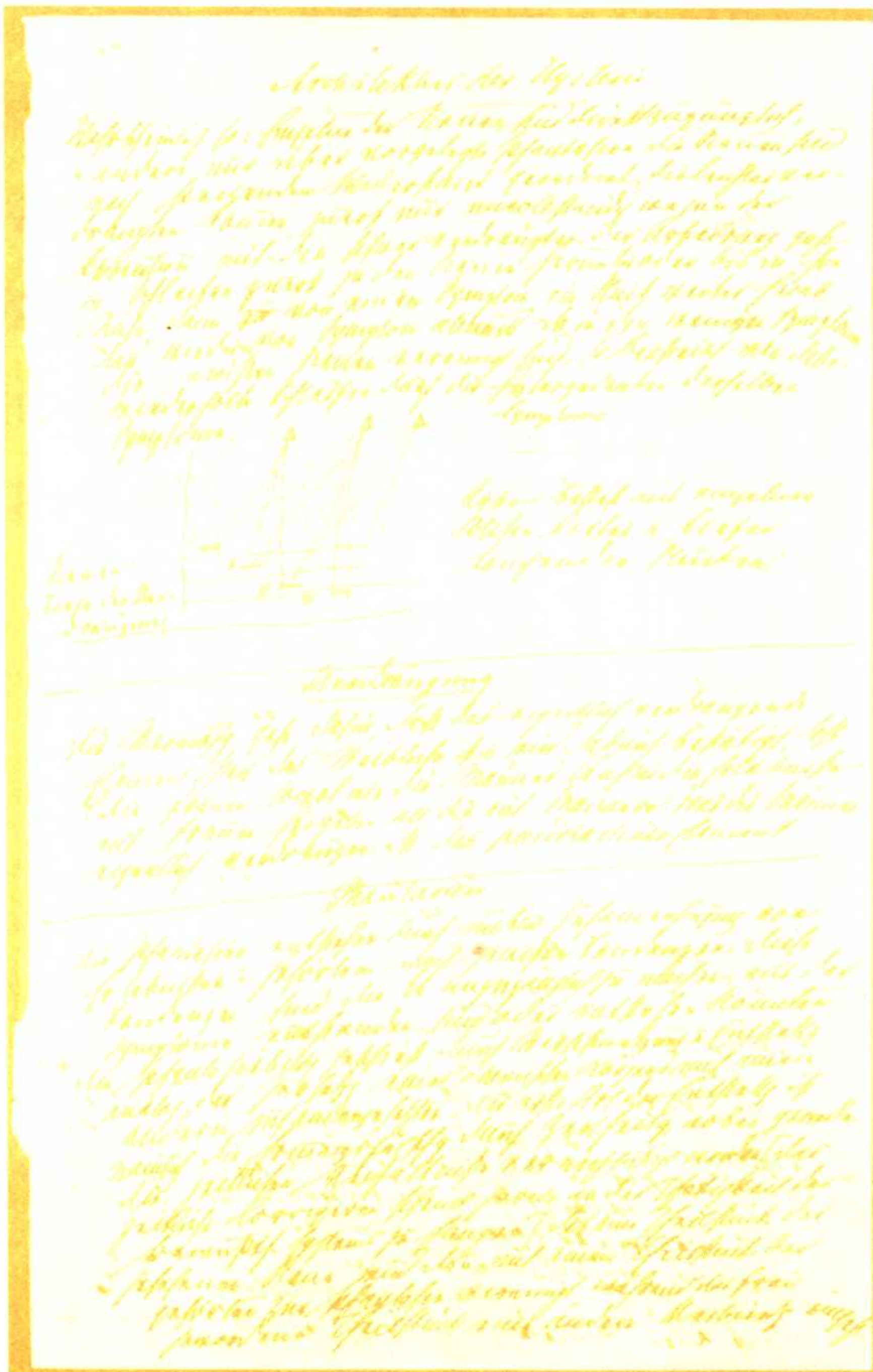
学家面对的“心理对象”(Psychical object)是不会被损毁的：

所有关键性的东西都被保存下来，即使是那些看起来完全被遗忘的东西也会以某种方式、在某个地方留存起来，它们只不过是掩盖起来而不被主体知晓罢了。^[51]

这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弗洛伊德认为心理学家的研究就是寻找被掩盖起来的“心理的对象”，例如关于某个事件的记忆，或某个性虐待引发的创伤。然而，弗洛伊德在下述这段话中却这样举例说明如何重建病人遗忘了的早期历史片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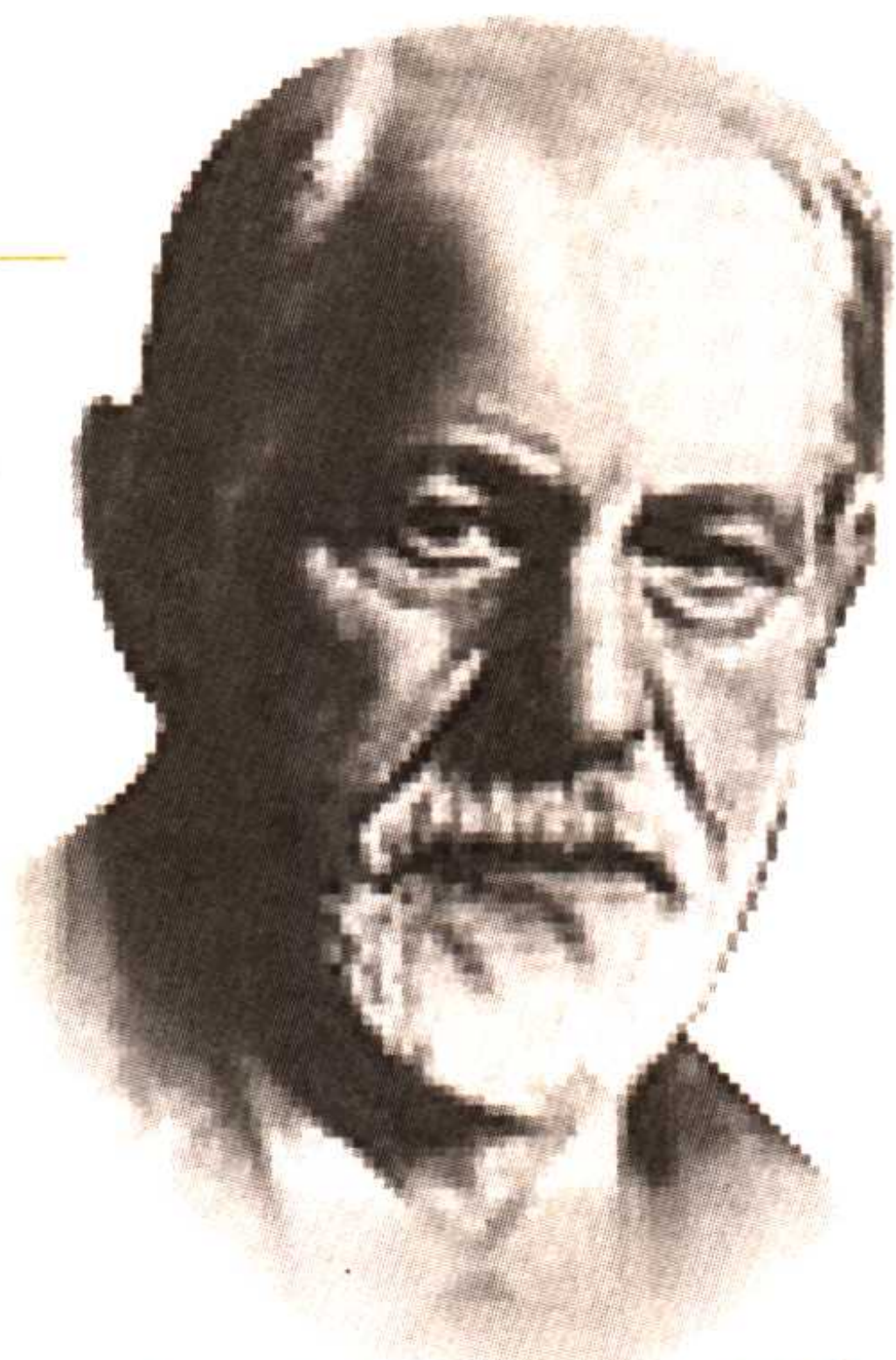
你一直认为自己是母亲的唯一和无限的占有者，直到某一年母亲又生了一个孩子。这时候你的幻想破灭了。你的母亲离开了你一段时间，但即便她再次出现，也不会只专注于你一个人。你对母亲的感情变得矛盾起来，于是父亲又获得了新的重要性……^[52]

就这样，尽管弗洛伊德在这里援引了一个可以证实的外部事件——一个孩子的降生，但是这个外部事件本身并不是重建的焦点。被重建起来的并不



弗洛伊德的手稿

是孩子降生这个“事实”。“心理的对象”是病人的感觉、想象和幻想，尤其是那种认为自己是母亲唯一占有者的感觉的复杂聚合体。这种“心理对象”并不能被直接观察到，它永远不能被外部观察者所证实，但能够通过病人与精神分析学家合作，在对过去精神生活的残余如何持续侵入当下生活的理解中得到评价。通过问诊室内病人表白得出的线索，就可以推断出心理对象的存在。弗洛伊德描写的不是外在的事件，而是内在事件的重建，这在本质上是内省和移情的产物。



这一点是重要的，因为一些参与到这起关于记忆的辩论中来的评论者们陷入了一种循环论证。他们说，并不存在能够证明压抑存在的证据，这是因为，设想一个人遗忘或不知道某件事情是由于他宁可不去知道或不去想某件事，这完全是没有理由的。

弗洛伊德的压抑概念

Freud's Concept of Repression



萨尔瓦多·达利 1939 年所作的弗洛伊德肖像

弗洛伊德的 压抑概念

尽管在当时有关虚假记忆的争论中,压抑作为弗洛伊德的核心概念成为讨论的焦点,但是这个问题一直被留到最后。因为从各个方面讲,这个概念是最简单的概念。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构架的奠基石在于他的这样一个观点”,^[53]即,某些心理内容是可以被否认的,或者可以从意识领域中清除出去。而后,它们只能以一种伪装的方式出现——如梦、身心方面的某些症状、说漏嘴、偶然事件或夸大了的性格特征。这种基本观念具有巨大的解释力量,但它是不是暗含着某种十分模糊、神秘或反直觉的过程呢?弗洛伊德在其1915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这样定义压抑:

压抑的本质就在于回避某些东西,并使之与

意识保持一定距离…… [54]

按照定义的说法,心理内容一旦被压抑就会变成潜意识的东西。尽管如此,弗洛伊德的定义并不意味着压抑过程从一开始就完全是潜意识的,而且压抑也并不会完全成功。它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指一个人尽力想忘记某种痛苦的东西,或是不去想它。这并不罕见或神秘。认知心理治疗师称之为“认知回避”。

这一点是重要的,因为一些参与到这起关于记忆的辩论中来的评论者们陷入了一种循环论证。他们说,并不存在能够证明压抑存在的证据,这是因为,设想一个人遗忘或不知道某件事情是由于他宁可不去知道或不去想某件事,这完全是没有理由的。 [55]

弗洛伊德的确进一步提出了“原初压抑”(primal repression)和“严格意义上的压抑”(repression proper)这样更为细微的区分,但这些并不需要我们过分担心。他提出在压抑中有几个力量结合在一起起作用:一种是某种排斥力,来自上方的意识(即严格意义上的压抑),另一个是某种吸引力,来自潜意识的向下牵引,由原初压抑发出。然而,弗洛伊德并没有提供任何临床资料来阐述他做出这种区分的根据——对于



弗洛伊德的压抑概念



弗洛伊德收藏的古董

本文作者而言,这一点从来都不具有任何临床意义。

压抑什么?

什么东西被压抑了? 弗洛伊德这样开始他的论文:

本能冲动具有的一种变化就是遭遇到一种试图使之不起作用的阻力……于是冲动就进入‘压抑’状态。^[56]

于是,到了 1915 年,弗洛伊德明显地主要关注的是本能冲动的压抑而不是记忆的压抑。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持续地寻求表达的本能不可能向外逃逸,因此需要,同时也必须保持压抑。然而,一旦受到了压抑,并且从意识的影响中撤回,冲动就会在较少干涉的状态下发展。

它在黑暗中不断繁殖发展,并采取极端的表达形式……^[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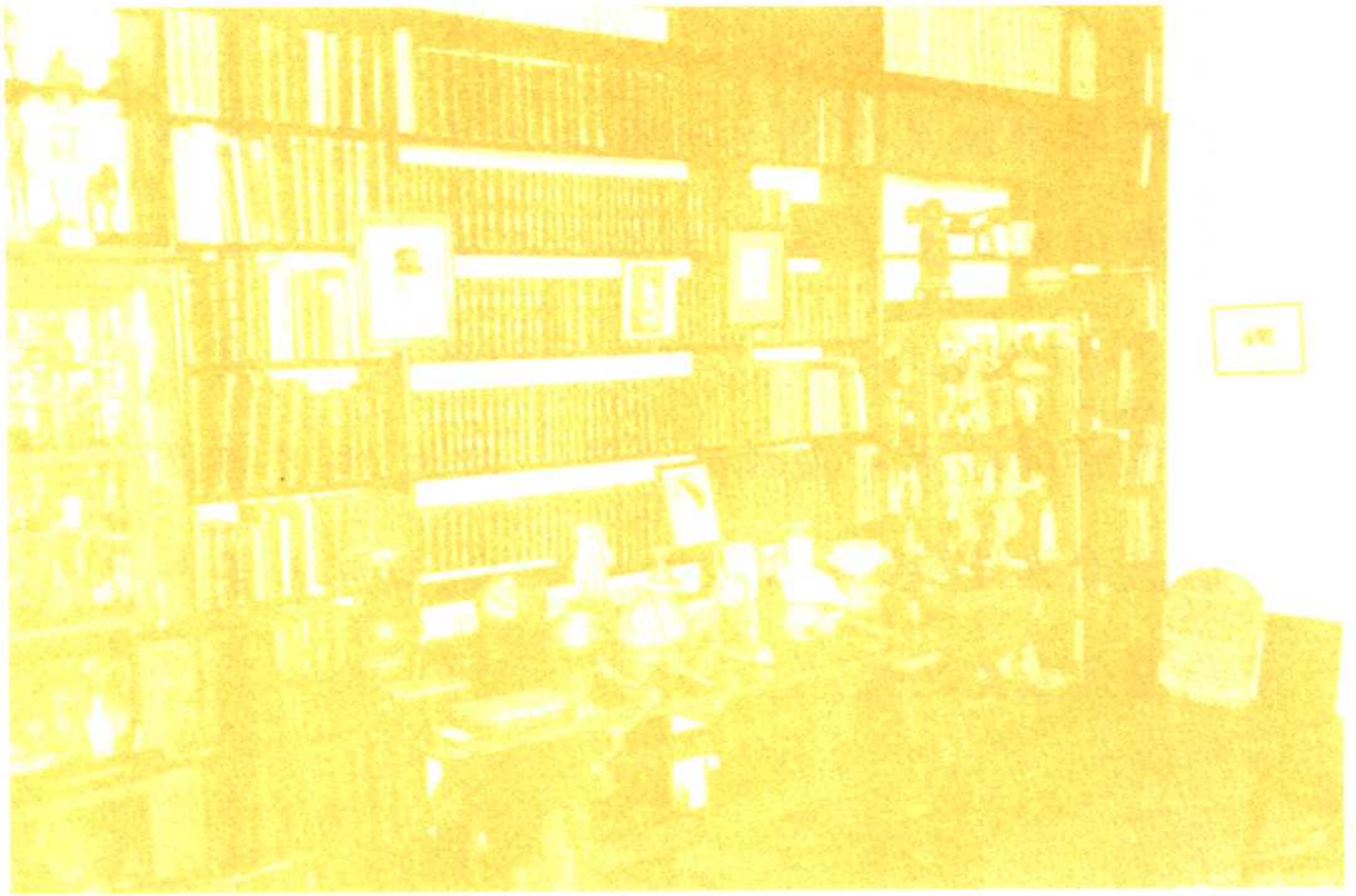
被压抑的派生物如果能够从原初压抑中充分地脱身,就会回渗到意识之中,在各种症状、梦境、自由联想和“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等数不胜数的形式中得到表达。这就是弗洛伊德理论的本质。



弗洛伊德关于记忆的看法以及对童年性虐待的影响的理解，看上去与今天的观点相当契合。而且，他使人们注意到表面的确定性和真实性之下的那些不可捉摸的东西。因此，与其将弗洛伊德看作是“恢复记忆狂热”之父，还不如看作是后现代主义之父。

结论：弗洛伊德论记忆和虐待

Conclusion: Freud on Memory and Abuse



弗洛伊德的部分藏书

结论：弗洛伊德论 记忆和虐待

弗洛伊德发现精神动力的冲突，即内心之中各种情感力量的对立可以导致精神病(癔病)的症状，其功能在于：它既可以掩藏也可以表达某种无法被接受的念头或冲动。他还发现这种冲突经常涉及到性，尽管表现的方式不尽相同。大约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他相信癔病根本上基于被压抑(被遗忘)的儿童时期的性虐待。他的分析方法在那个时候经常带有一种强迫性，企图努力说服病人服从他们的联想思路。他坚信，必须对抗病人的抵触情绪，扩展分析工作。今天，这种方法很可能会被认为会导致虚构的情境，并且让病人误以为是真正的记忆。

弗洛伊德对此并不是浑然不知，因为他的早期

论文包含对这种可能性的大量讨论。然而,经历了一番痛苦的内心斗争后,他很快就意识到他错了。并不是所有从压抑状态中恢复的记忆都是真实的。他开始转向注意“精神真实性”,本能的内心世界,愿望和幻想。在放弃“引诱理论”不久之后,弗洛伊德开始写关于梦的著作,阐述心灵如何与生俱来地包含着一种持续发生作用的自我欺骗的能力。他又写了一篇关于“屏蔽记忆”的论文,认为儿童的记忆可能完全是虚假的记忆,是后来所作的一些建构,只是以回顾的方式将其归属于久远的过去。他表明,记忆可能像梦或虚构的小说——而主观的回忆经验并不能担保记忆的真实性。

弗洛伊德指出,一般认为人的企图、知识都是有意识、有知觉的,这是一种错觉。他还进一步论述了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指出潜意识中的意愿以及思想如何通过说漏嘴、错误、偶然事件、遗忘等数不胜数的伪装形式得到表达。他表明,即使是最坚定和热忱的信仰,例如那些宗教信仰,也有可能建立在潜意识和被压抑的婴儿时期的基础之上。他曾经针对自己在工作中有过的困惑评论说,“真实性的坚固根



结论

弗洛伊德论记忆和虐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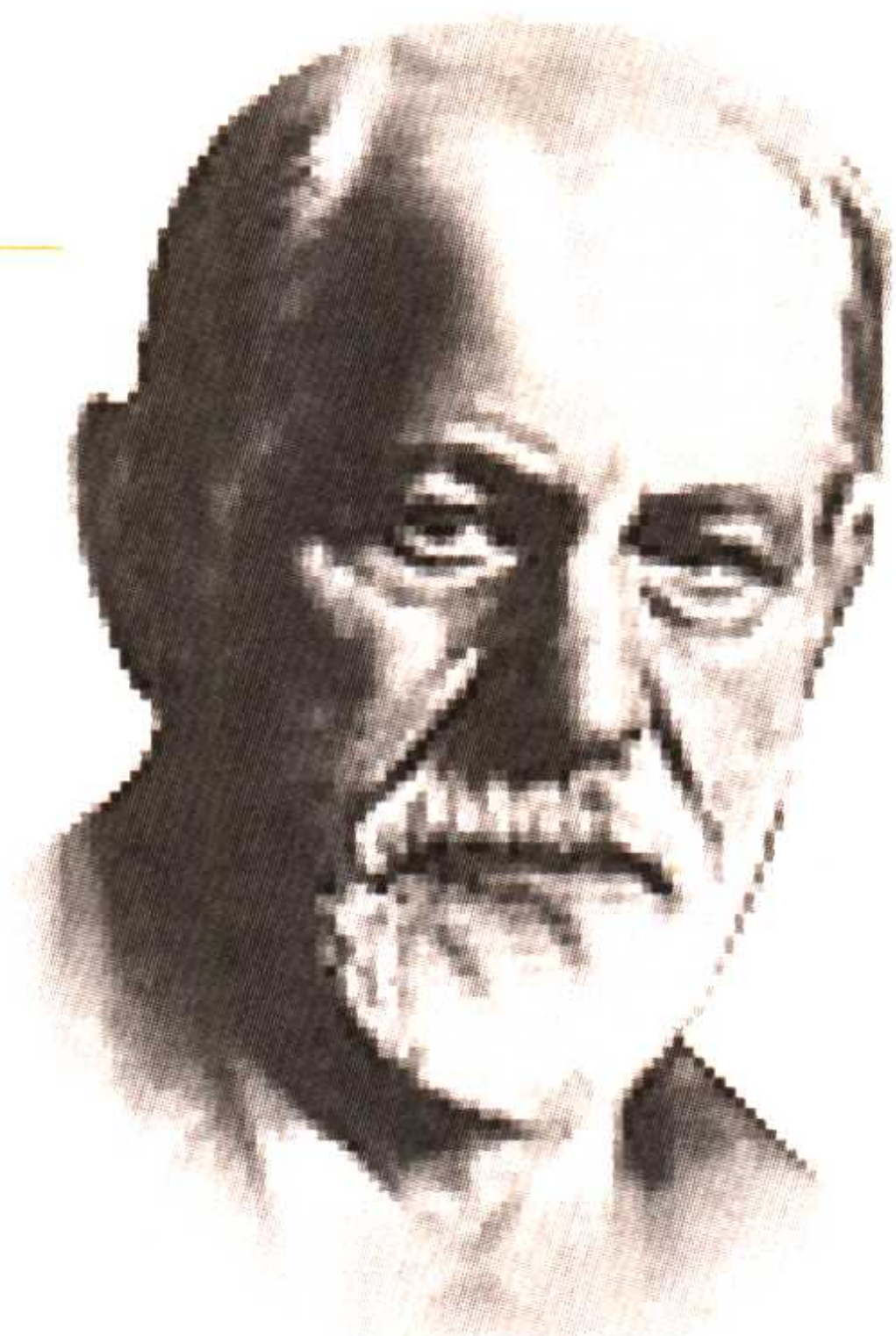
维也纳的弗洛伊德纪念馆

基已经一去不复返了。”^[58]

弗洛伊德确实找到了证据,例如在梦境中,不能为有意识的心灵所用的知识和记忆以某种形式在潜意识中被保存。然而,极为重要的是,他也强调了关于某些经历的记忆(特别是多年之前的经历的回忆)可能会遭受各种扭曲,把来源不同的因素混合起来,而很少被意识以连贯而精确的形式回忆起来。

因此,弗洛伊德关于记忆的看法以及对童年性虐待的影响的理解,看上去与今天的观点相当契合。而且,他使人们注意到表面的确定性和真实性之下的那些不可捉摸的东西。因此,与其将弗洛伊德看作是“恢复记忆狂热”之父,还不如看作是后现代主义之父。

从这个 19 世纪的维也纳神经科医生第一次开始撰写关于心理分析学的著作——即研究心灵欺骗自己的能力——至今,已经有一百多年了。如今,在 21 世纪之初,弗洛伊德仍然在困扰我们。



心理分析学家逐渐能够描述和理解那些发生在内心深处和人与人之间的、日益复杂和微妙的感情过程和想象。尽管全面的心理分析要求每周进行五次,持续多年的治疗,耗时而昂贵,但也有许多简易的心理分析治疗方法得到了广泛地应用。

对于心理分析结果的研究是复杂的,但是一项基于世界上 47 份研究结果的调查表明,在很多病例中,心理分析都收到了良好效果。

弗洛伊德之后的心理分析

Psychoanalysis since Freud



伦敦的弗洛伊德纪念馆

弗洛伊德之后的 心理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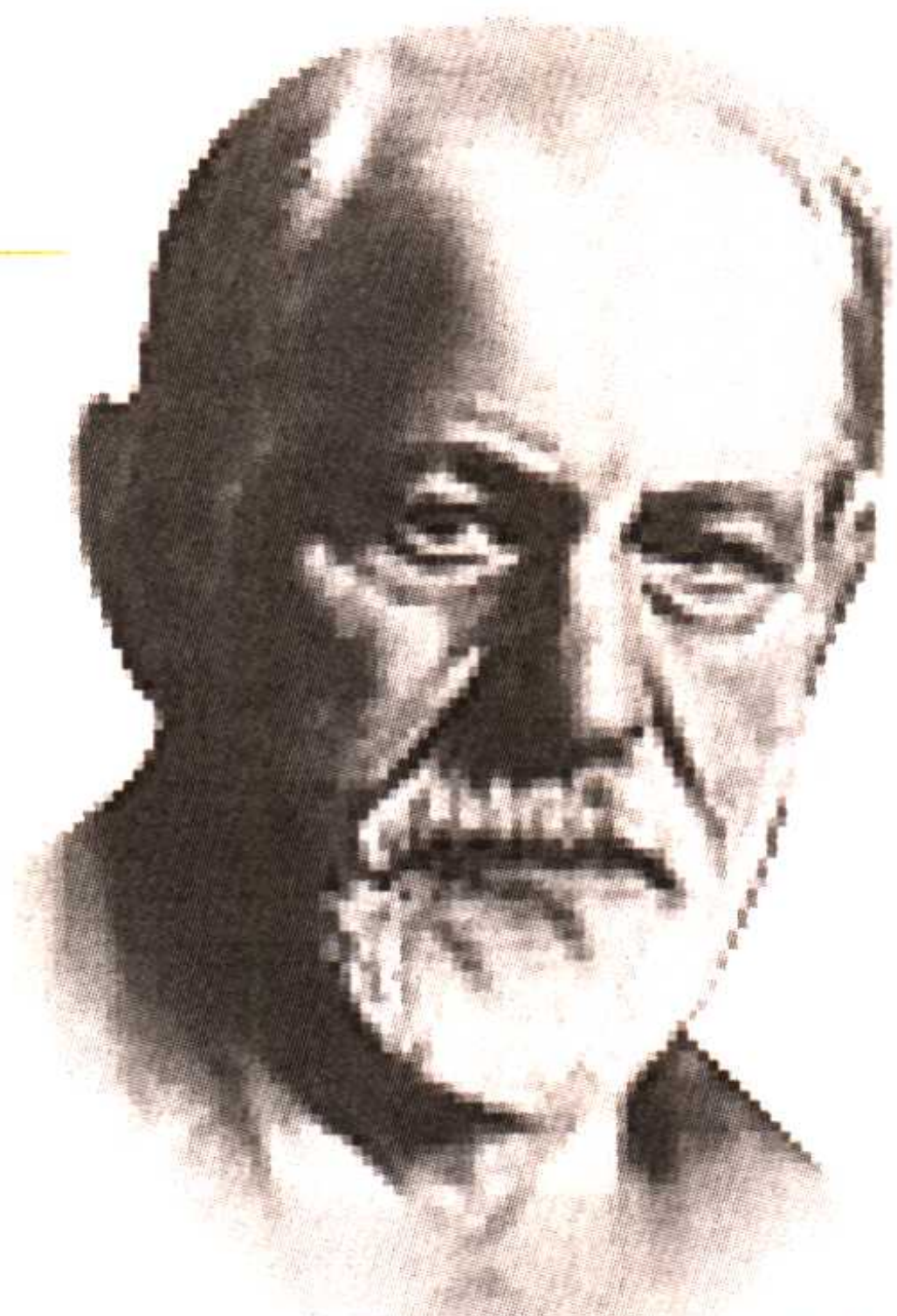
1939年弗洛伊德卒于伦敦。从那以后,心理分析一直是学者、临床医学家和科学家争论和探索的领域。探索研究领域的多样性丰富了精神分析学家的理解,例如,关于童年对成人的依恋及由之产生的心理波动的研究。如今在英国还有一些大学设有心理分析研究的系科。心理分析学家逐渐能够描述和理解那些发生在内心深处和人与人之间的、日益复杂和微妙的感情过程和想象。尽管全面的心理分析要求每周进行五次,持续多年的治疗,耗时而昂贵,但也有许多简易的心理分析治疗方法得到了广泛地应用。在英国,塔夫斯多克诊所(the Tavistock Clinic)多年以来一直是非常优秀的基于精神分析的临床研究

中心，并且致力于将心理分析治疗应用于英国国民医疗服务(National Health Service)。对于心理分析结果的研究是复杂的，但是一项基于世界上 47 份研究结果的调查(这个项目由国际心理分析协会[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委托)表明，在很多病例中，心理分析都收到了良好效果。^[59]

精神分析的训练是漫长的，一个人通常到将近 40 岁时才能接受这种训练。想要学习精神分析的人有各种不同的背景，包括医药、临床心理学、社会工作、人类学以及其他关涉到研究人和帮助人的职业。在英国，心理分析学家在心理分析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接受训练，与之联盟的伦敦心理分析诊所提供低收费的心理分析。

此外还有许多针对心理分析治疗的训练，这可以在英联邦心理治疗师登记册上查找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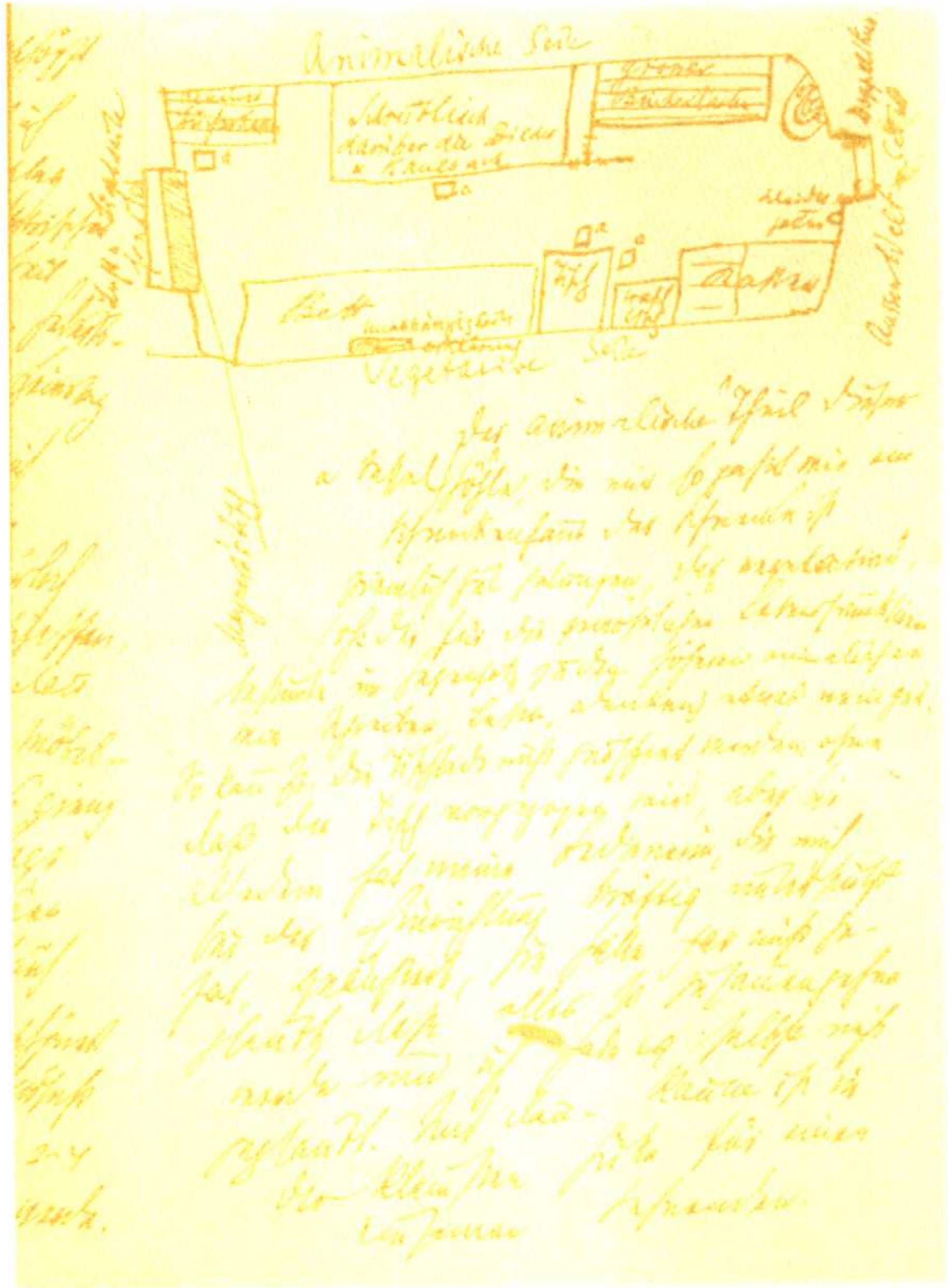
在美国，心理分析研究机构遍及各大主要城市。



心理分析应该采取的态度就是容忍不确定性,这样就可以制造出一种氛围,病人自我和经历的不同方面就可以自如地得到探究而不用急于得出结论。

心理分析的现状如何?

What Happens in Psychoanalysis Toda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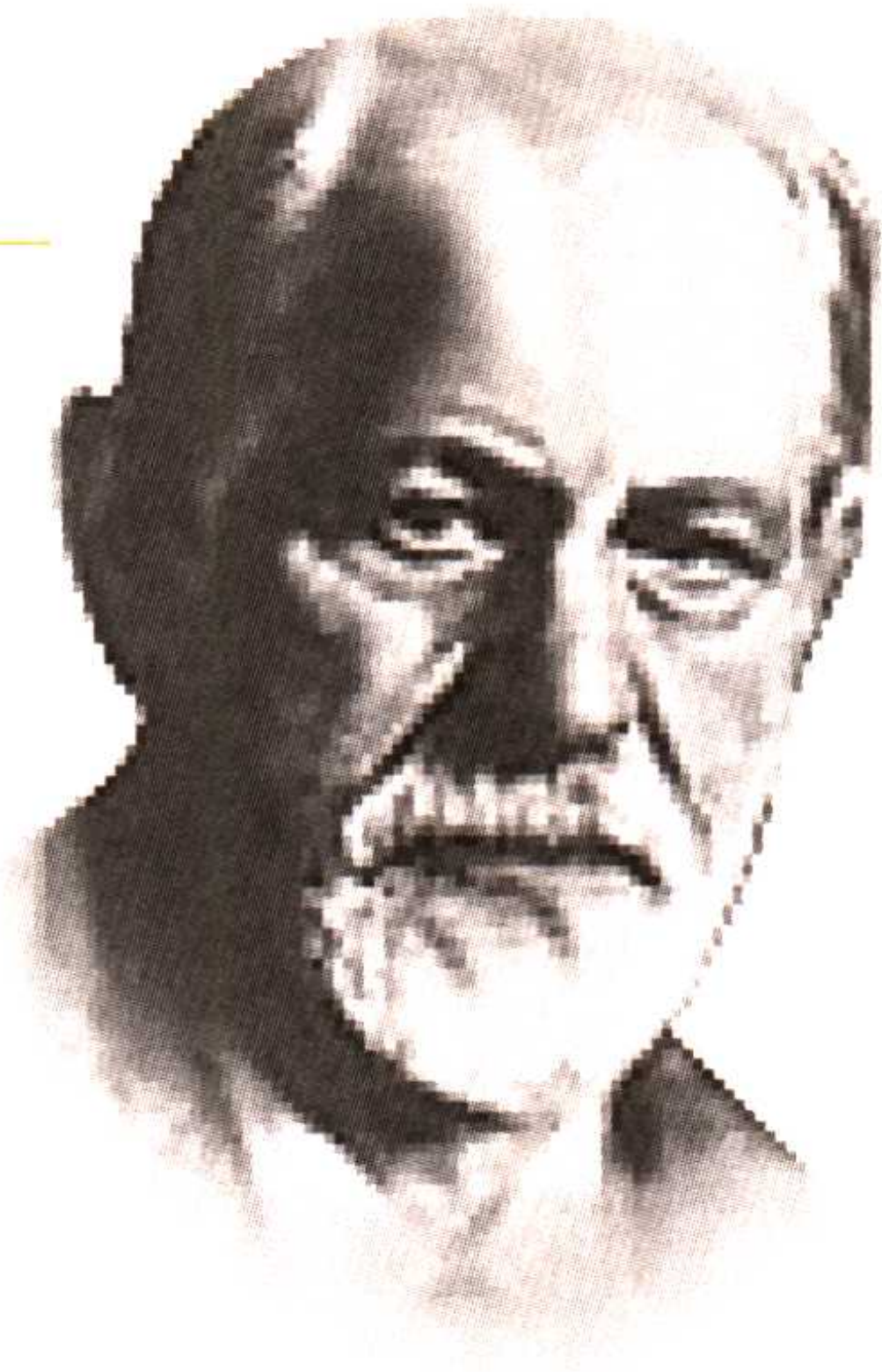
弗洛伊德绘制的房间草图

心理分析的现状 如何？

尽管世界上不同的心理分析学家所持的理论风格不同或具有微小的差别，但是一个打算接受心理分析的病人大致可以预见到这样的场景：病人可以选择躺在一张睡椅上（虽然也有座椅），而心理分析师就坐在后面。病人被要求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而分析师则全神贯注地仔细倾听。分析师从病人自由联想的谈话中，逐渐分辨出病人感情冲突的模式，然后将其系统化，形成尝试性的解释或假设。当病人的情感冲突在分析师看来变得清晰起来的时候，这种冲突就可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心理分析应该采取的态度就是容忍不确定性，这样就可以制造出一种氛围，病人自我和经历的不同方面就可以自如地

得到探究而不用急于得出结论。著名的英国心理分析学家威尔弗·贝恩 (Wilfred Bion) 把它和济慈 (Keats) “消极的能力” (Negative Capability) 概念相比：

……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一个人可以处于不确定、神秘、怀疑之中，并且并不急于寻找到事实和理由。^[61]



弗洛伊德与虚假记忆综合症

如果没有客观的证据,就不可能断定一个被恢复的记忆本质上是真实的经验,或者只是想象的结果。

有关虚假记忆的一个警示

A Caution Regarding False Memories



弗洛伊德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年(1939)。

有关虚假记忆的一个警示

目前尚无可靠的办法用以提高记忆力。如果试图去这么做，就会产生在记忆缺失处加入虚构情节或导致虚假记忆的风险。不应当采用催眠术以及相关的方法来得出“被压抑的记忆”。如果没有客观的证据，就不可能断定一个被恢复的记忆——即一个被忘得一干二净而后来又被记起的经历——本质上是真实的经验，或者只是想象的结果。



位于维也纳大学医学院旁边的弗洛伊德公园中的纪念碑,德文碑文为“知识分子的声音是平静的”。

注 释

- [1] E. Loftu, and Ketcham, *The Myth of Repressed Memory: False Memories and Allegations of Sexual Abus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4.
- [2] K.Pope, 'Memory, abuse and science: Questioning claims about the false memory syndrome epidemic', *American Psychologist*, September, 1996, pp. 957-74.
- [3] D.Brown, A.W. Schefflin and D.C. Hammond, *Memory, Trauma Treatment and the Law*, New York: Norton, 1998, PP.1-2.
- [4] P. Mollon, *Remembering Trauma: A Psychotherapist's Guide to Memory and Illusion*, Chichester: Wiley, 1998.
- [5] R. Ofshe, E. Watters, *Making Monsters: False Memories, Psychotherapy and Sexual Hysteria*, London: Andre Deutsch, 1995, p. 9.
- [6] F. Crews, *The Memory Wars: Freud's Legacy in Dispute*, London: Granta, 1997, p.9.

- [7] J. Breuer and S. Freud, *Studies on Hysteria*,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II*, London: Hogarth Press, 1893–1895.
- [8] D. Schacter, *Searching for Mem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6, p.274.
- [9] J. Breuer and S. Freud, *Studies on Hysteria*, p.117.
- [10] S. Freud, *Further Remarks on the Neuro-psychoses of Defenc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III*, London: Hogarth Press, 1896a, p.162.
- [11] *Ibid.*, p.163.
- [12] *Ibid.*, p.164.
- [13] *Ibid.*, p.166.
- [14] S. Freud, *Project for a Scientific Psychology*,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I*, London: Hogarth Press, 1895, p.354.
- [15] S. Freud, *Further Remarks on the Neuropsychoses of Defence*.
- [16] *Ibid.*, p.172.
- [17] *Ibid.*, p.178.
- [18] *Ibid.*, p.183.
- [19] *Ibid.*, p.164.
- [20] S. Freud, *The Aetiology of Hysteria*,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III*, London: Hogarth Press, 1896b, p.212.
- [21] *Ibid.*, p.193.
- [22] *Ibid.*, p.199.
- [23] *Ibid.*, p.202—3.
- [24] *Ibid.*, p.214.



注

- [25] Ibid., p.215.
- [26] Ibid., p.220.
- [27] Ibid., p.220.
- [28] Ibid., p.205.
- [29] Ibid., p.208.
- [30] Ibid., p.208.
- [31] Ibid., p.204.
- [32] Ibid., p.204.
- [33] Ibid., p.204.
- [34] Ibid., p.208.
- [35] J. Breuer and S. Freud, *Studies on Hysteria*,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II*, London: Hogarth Press, 1893–1895, p.204.
- [36] S. Freud, *The Aetiology of Hysteria*, p.204.
- [37] S. Freud, *Further Remarks on the Neuropsychoses of Defence*, p. 168.
- [38] S. Freud, *On the History of the Psycho-Analytical Movement*,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XIV*, London: Hogarth Press, 1914, p.17.
- [39] Ibid., p.17.
- [40] F.Crews, *The Memory Wars: Freud's Legacy in Dispute*, London: Granta, 1997; A. Esterson, *Seductive Mirage: An Exploration of the Work of Sigmund Freud*, New York, Open Court, 1993.
- [41] S. Freud, *Moses and Monotheism*,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XXIII*, London: Hogarth Press, 1939, p.75–6.

释

- [42] S. Freud, *An Outline of Psycho-Analysis*,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XXIII, London: Hogarth Press, 1917, p.367.
- [43] S. Freud,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XVI, London: Hogarth Press, 1917, p.367.
- [44] S. Freud, *An Outline of Psycho-Analysis*, p.187.
- [45] *Ibid.*, p.187.
- [46] S. Freud,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IV, London: Hogarth Press, 1900, p.14.
- [47] S. Freud, *On the History of the Psycho-Analytical Movement*, p.20.
- [48] S. Freud, *Screen Memories*,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III, London: Hogarth Press, 1899, p.303.
- [49] *Ibid.*, p.315.
- [50] *Ibid.*, p.322.
- [51] S. Freud, *Constructions in Analysis*,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XXIII, London: Hogarth Press, 1937, p.260.
- [52] *Ibid.*, p.261.
- [53] S. Freud, *On the History of the Psycho-Analytical Movement*, p.16.
- [54] S. Freud, *Repression*,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XIV, London: Hogarth Press, 1915, p.147.



- [55] H.Pope and J.Hudson, 'Can memories of childhood sexual abuse be repressed?', *Psychological Medicine*(25), 1995, p.121-6.
- [56] S. Freud, *Repression*, p.146.
- [57] *Ibid.*, p.149.
- [58] S. Freud, *On the History of the Psycho-Analytical Movement*, p.17.
- [59] 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An Open Door Review of Outcomes Studies in Psychoanalysis*, London: IPA, 1999.
- [60] Further information can be gained by visiting website: <http://www.psychoanalysis.org.uk>
- [61] W.R. Bion, *Attention and Interpretation*, London: Tavistock 1970, p.125; reprinted by Karnac, London, 1984.

注

释

参 考 书 目

- Bion, W.R., *Attention and interpretation*, London: Tavistock 1970;
reprinted by Karnac, London, 1984.
- Breuer, J. and Freud, S., *Studies on Hysteria,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II*, London:
Hogarth Press, 1893-1895.
- Brown, D., Schefflin, A.W. and Hammond, D.C., *Memory, Trauma
Treatment and the Law*, New York: Norton, 1998.
- Crews, F., *The Memory Wars: Freud's Legacy in Dispute*, London:
Granta, 1997.
- Esterson, A., *Seductive Mirage: An Exploration of the Work of Sig-
mund Freud*, New York: Open Court, 1993.
- Freud, S., *Project for a scientific Psychology,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I*, London:
Hogarth Press, 1895.
- Freud, S., *Further Remarks on the Neuropsychoses of Defenc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III*,



- London:Hogarth Press, 1896a.
- Freud, S., *The Aetiology of Hysteria*,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III*, London: Hogarth Press, 1896a.
- Freud, S., *Screen Memories*,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III*, London: Hogarth Press, 1899.
- Freud, S.,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IV*, London: Hogarth Press, 1900.
- Freud,S.,*On the History of the Psycho –Analytical Movement*,*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XVI*, London: Hogarth Press, 1914.
- Freud,S.,*Repression*,*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XVI*, London: Hogarth Press, 1915.
- Freud, S.,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XVI*, London: Hogarth Press, 1917.
- Freud,S.,*Constructions in Analysis*,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XXIII*, London: Hogarth Press, 1939.
- Freud, S., *Moses and Monotheism*,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XXIII*, London: Hogarth Press, 1940.
- Freyd, J.J., *Betrayal Trauma: The Logic of Forgetting Childhood Abus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An Open Door Review of*

Outcomes Studies in Psychoanalysis, London: IPA, 1999.

Loftus, E. and Ketcham, K., *The Myth of Repressed Memory: False Memories and Allegations of Sexual Abus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4.

Masson, J., *Freud: The Assault on Truth*, London: Faber & Faber, 1984.

Mollon, P., *Remembering Trauma: A Psychotherapist's Guide to Memory and Illusion*, Chichester: Wiley, 1998.

Ofshe, R. and Watters, E., *Making Monsters: False Memories, Psychotherapy and Sexual Hysteria*, London: Andre Deutsch, 1995.

Pope, K., 'Memory, abuse and science: Questioning claims about the false memory syndrome epidemic', *American Psychologist*, September 1996, pp.957-74.

Pope, H. and Hudson, J., 'Can memories of childhood sexual abuse be repressed?' *Psychological Medicine* (25), 1995.

Sandler, J. and Fonagy, P. (eds.), *Recovered Memories of Abuse: true or False?*, London: Karnac, 1996.

Schacter, D., *Searching for Mem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6.

Sinason, V. (ed.), *Memory in Dispute*, London: Karnac, 1998.

Wakefield, H. and Underwager, R., *Return of the Furies: An investigation into Recovered Memory Therapy*, Chicago: Open Court, 1994.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
目录
正文